

引 言

出版社让我写一本《史沫特莱传》，我深感惶恐，因为我没有赶上史沫特莱生活和战斗过的那个年代，也无缘受教于与史沫特莱相处过的前辈，我只能从不多的材料中去认识史沫特莱。但即便是这样，在我心中也足以树立起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崇高形象。逝去将近半个世纪的史沫特莱，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是无穷的；也可以这样说，史沫特莱本身就是一座宝库。这座宝库中最璀璨夺目的瑰宝，就是她那一颗热爱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心。

史沫特莱对中国人民的热爱是无比真挚而深沉的。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她就被“扑面而来的亚洲的贫困”惊呆了。她亲眼看到中国警察和外国巡捕殴打码头工人，看到“血汗工厂”的缙丝童工被烫坏的双手，看到共产党人被反动当局在大街上砍首示众的惨像！她愤怒地说：“这是中世纪！这种制度必须改变！”在上海，她到工厂里劳动，到农村考察，深入体验中国人民的生活。在西安事变中，她走上街头救护受伤的红军俘虏和农民，给他们洗涤肮脏肿胀满是脓血的脚，然后细心地包扎起来。老百姓惊讶地看着她，不懂这“发了疯的洋鬼子”怎么在做一般中国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史沫特莱对中国人民的热爱，源于她与生俱来的阶级意识。她从小生活在美国中西部贫困的农村矿区，父亲是一个干粗重活的工人，终年劳累而一无所获，母亲积劳成疾，中年早逝。在煤矿上遇到瓦斯爆炸的时候，矿主总是悍然下令封井，不顾矿工的死活，因为他们觉得工人的生命不如煤炭值钱。童年的史沫特莱曾经看见过遇难矿工的尸体被人们抬着经过她家门口。中国的现实，使史沫特莱的阶级意识超越了国界，成为她忘我地为中国人民献出一切的思想基础。

史沫特莱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片真情更是感人至深。1928年底她到中国以前，已经在纽约和柏林投身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为此，她被当作“国际间谍”蹲了半年监狱。她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也接触过不少具有各种不同观点的团体和政党，包括美国和德国的共产党。这两国的共产党都希望史沫特莱成为他们的一员，但她始终独立于他们之外。在中国，她在了解中国和为中国工作的同时，也升华了自己的灵魂。她说：“我只有两种忠诚，一个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被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忠于中国正在实现的革命。”为了全身心投入这个伟大的革命，史沫特莱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可是党组织认为她应该留在党外，当一个非党的作者和记者。史沫特莱开始并不理解这一点，竟然伤心痛哭，周围的同志都被她的毫无矫饰的真情感动了。后来在实际的工作和斗争中，她终于理解了并且真正发挥了一个非党记者所能发挥的作用。在回到美国以后的10年中，她仍然时刻不忘发挥这种作用。

史沫特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做了许多工作。在上海，她把鲁迅视为良师，以能与鲁迅一起战斗为最大的光荣。鲁迅的不少匕首投枪式的文章，都是通过史沫特莱向世界传播的；也就是说，鲁迅铸造了匕首投枪，然后史沫特莱把它们投向敌人。在抗日战争前线，史沫特莱是一位出色的战地记者，又是一位勇敢的战地救护员。一遇敌机轰炸，她就冲出去抢救伤员；敌机扫射，她就扑到伤员身上。由于有了深切的体验，她写的战地报道总是内容充

实而又具体，充满了真挚动人的感情。史沫特莱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争取国际医药援助。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和印度医疗队的来华，都得力于史沫特莱的奔走。在国内，史沫特莱募捐的成功更是出了名的，国民党政府的大人物宋子文和孔祥熙都被她征服了，给抗日部队捐了大笔的钱。无论什么事情，史沫特莱只要认准了目标，就会一往无前地走下去，从来不承认“不可能”。

史沫特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她把自己的一生无条件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她看来，只有中国人民的事业，能够寄托她的理想，实现她的人生目的。她毕生追求一个合理的、新的世界，在那里，贫苦的、受压迫的民族能够站立起来，妇女能够有机会充分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史沫特莱有着劳动者的家庭背景，四分之一的印第安血统，又是一个妇女，她对新的社会的渴望特别迫切。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里，她看到从将军到士兵都是善良朴实、可敬可爱、赤心为人民谋解放的好同志。她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社会的雏形，找到了她一生追求的革命理想之物化的现实世界，找到了她可以寄壮志、托生死的精神的家园。所以她经常爱说这样的话：“我一直忘记了我不是一个中国人！”“要是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中国籍的公民，那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耀。”朋友们说，她是那样“不可救药地”热爱中国。

这就是我们的史沫特莱，中国的史沫特莱，有一颗如璀璨的宝石一般的中国心的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是最深邃的哲理，最壮美的诗篇，国际主义的杰出战士。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已经离开了我们，飘然远行了，当我提起笔来写不朽的史沫特莱时，总觉得斯人宛在，从深层的现实意义上说，她没有死，她的精神内涵和性格魅力是永存的。愿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像史沫特莱热爱中国那样热爱我们自己的祖国。

作者

1996年10月14日

第一章 走自己的路

密苏里州北部的奥斯古德镇，坐落在一片乱石嶙峋的贫瘠的土地上。镇上一条两个街区长的街道，街道两边全是古老的、西部风格的木结构平房。镇东边有一条铁路，跨过铁路，沿着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走两英里，就到了坎普格龙德镇，这是19世纪30年代第一批白人开垦者首先到达的地方。按照当时美国政府鼓励垦荒的土地政策的规定，最初的垦殖者可以成为被开垦土地的主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母亲曾祖父摩根·罗尔斯就是最早到来的拓荒者之一。1879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父亲，当时只有16岁的查尔斯·史沫特莱跟随姐姐玛丽和姐夫雅各布·阿姆斯特朗一家人从堪萨斯州迁到奥斯古德，成了罗尔斯家的邻居。

1888年，第一列载客火车开到了奥斯古德，大大改变了小镇的面貌。可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部移民的浪潮已经逐渐平息，新开垦的土地已经不能轻易被开垦者所占有。当时美国的农业，正逐渐向机械化的大农场经济过渡；而在奥斯古德，这片乱石滩地却成了被耕作机械遗忘的角落，贫苦的农民依旧胼手胝足，弯腰弓背，在石头缝中讨生活。最初的开垦者纷纷离去，许多年以后，火车已经不再经过奥斯古德，甚至邮局也不再为它服务了。

1885年，查尔斯·史沫特莱和邻居罗尔斯家17岁的女儿莎拉结婚，他们生了五个孩子：奈莉、艾格尼丝、默特尔、约翰和萨姆。

关于艾格尼丝的出生年月，她自己长大以后也说不清楚。H.W.威尔逊公司出版的《传记年鉴》记载着她生于1894年，史沫特莱研究者麦金农教授夫妇经过反复调查论证，证实了她出生于1892年2月23日。

史沫特莱一家住在奥斯古德郊外两个山丘之间的一栋用圆木筑成的小屋里，周围是一片起伏不平的、布满乱石的田野。房子很小，只有两个房间，一间是厨房兼起居室，另一间是卧室。卧室里只有两张床，大床上睡着父亲查尔斯、母亲莎拉、幼小的弟弟约翰和萨姆，小床上奈莉、艾格尼丝和默特尔三姐妹侧着身子挤在一起。这个房间实在是太小了，小艾格尼丝曾经在半夜醒来时窥见父母的隐私。她害怕极了，觉得母亲在忍受着父亲暴虐的欺侮，她想哭，却用手紧紧地捂着嘴，不敢发出一点儿声音。

母亲莎拉是个勤劳善良的农妇，她每天弯着腰在瘦瘠缺水的小块耕地上拼命干活，提着两个大水桶，赤着脚到一英里外的山下去提水，一天到晚像牛马一般苦苦挣扎着过日子。孩子们半饥半饱，衣衫褴褛。只有到了秋天，当母亲把地里收获的谷物和果类藏到地窖里。从那儿逸出一股阳光的气息和甜甜酸酸的味儿的时候，一家人的心里才稍微踏实了一点儿。

父亲查尔斯是个有流浪癖的不大顾家的男人。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模样潇洒，能歌善舞。每当镇上欢庆秋收的节日来临，广场中央铺上打了蜡的木板，查尔斯就穿上在城里弄来的鲜艳的衣服，领着大家又唱又跳，一直闹到天亮。平时他到镇外去打零工，只要手里有了一点钱，查尔斯就泡在酒馆里消磨时光，他不愿意像妻子那样在地里苦熬。当时正处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大批大批的人涌到中西部去寻找财富。查尔斯没念过书，一字不识，但他的感觉告诉他，这是一个天上有可能掉下黄金的时代，他憧憬着一片新的生活天地。他要想法子发财致富，不能过这种拼命劳动而收获甚少的穷日子。于是，时刻想从土地上逃走父亲和执着地依附土地的

母亲之间，就经常发生争吵。父亲喝了酒就打母亲，把母亲撵得满屋子躲藏。

其实，当年查尔斯和莎拉原是深深相爱的一对。莎拉的父亲罗尔斯老爹嫌史沫特莱家有一位老祖母是切罗基印第安人，他不能容忍一个有印第安血统的女婿。查尔斯和莎拉私奔到附近的一个小镇，在教堂里举行了婚礼，躲到已经搬到这个镇的玛丽大姐家里。罗尔斯老爹怒气冲冲找到玛丽大姐家里兴师问罪，要夺回女儿。岂料事情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罗尔斯老爹竟对刚刚守寡的玛丽大姐一见钟情。罗尔斯老爹的妻子正身患重病，很快就死去了。罗尔斯老爹和玛丽大姐结了婚，一场风波骤然平息，史沫特莱家和罗尔斯家也就成了双料亲家。想起这些往事，查尔斯总觉得有点对不起妻子。有一次不知怎么的手头宽裕起来，给妻子买了一块绸子衣料。莎拉用粗糙的手在光滑的绸子上抚摸着，眼里噙着泪，茫然不知所措。

“莎拉，难道你不能对我说声谢谢吗？”查尔斯说。

“多漂亮的料子啊！”莎拉只说了一句，眼泪就簌簌地落了下来。

小艾格尼丝热爱母亲，同情母亲的艰辛和屈辱，她害怕自己将来也会像母亲那样生活，于是时时处处把自己装扮得像个男孩子。她学射击，学骑马，蹦蹦跳跳，跟男孩子们打架，她嘲笑一切女人气的行为，为自己身体的柔弱和缺乏力气而感到羞涩。她认为流露感情就是脆弱，她虽然爱母亲，但很少吻她，她不好意思让别人看见她吻母亲，或者在母亲怀里撒娇。穷人家的孩子没有什么玩具，小艾格尼丝只有一个小小的布娃娃，但她不像别的女孩那样整天抱着它，给它做衣服穿。她不喜欢这种小丫头的玩意儿。

艾格尼丝也爱父亲，父亲的歌声和舞姿给她留下了一辈子忘不了的印象，父亲对生活的种种幻想也使她觉得有吸引力。但她也不吻父亲，她记得只吻过父亲两次，其中一次是父亲喝醉了酒的时候，因为她读过一本带图画的书，书里那个小女孩在父亲喝醉了的时候吻了他，父亲从此改悔，再也不喝酒了。

凭着母亲的辛勤劳动，小艾格尼丝在七岁那年终于能够上学读书了。她到离家一英里多的诺布山小学念书。上课的时候，孩子们背课文，学习计算和拼写。艾格尼丝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她总是能够很出色地完成功课。母亲为了让孩子们读书，除了干自己地里的活以外，还到别人家里去干活，整理花园，摘果子，做果酱罐头，给一家人换取食品。才三十出头的母亲，头发稀疏，身体干瘦，脸上已经有了皱纹。

1904年春天，父亲抱着一定要挣下一份家业的决心，带着全家坐火车迁移到科罗拉多州东南部矿业区的特立尼达。特立尼达是一座美丽的小城，它坐落在费希尔山下，周围遍植红松，在城里可以望得到远处白雪皑皑的落基山脉。城里有歌剧院、天主教修道院、犹太教堂，还有很多古老的维多利亚式建筑 and 一所外形像城堡的学校。孩子们从荒凉冷落的奥斯古德来到特立尼达漂亮的街道上，高兴得又跳又蹦。特立尼达是维克多美国燃料公司和洛克菲勒的燃料公司的准封地，在这里，繁华确实存在，但只属于居住在城里白色楼房中的有钱人家。矿工大多数是外来人，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都等同于农奴，他们每天下了矿井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再上来，本地的白人是不会做这样的苦工的。

繁华也不属于史沫特莱一家，他们在城外的珀加特利河岸上架起帐篷居住，查尔斯在帐篷外面盖了一间木头小屋作厨房。他和别人一起搞了一个给人装运河砂和砖块的包工组，弄到一匹马和一辆排子车。他很得意，觉得自

己时来运转，已经混到了比矿工和运煤杂工稍好一点的地位。每天可以挣到三美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孩子们又可以上学读书了。艾格尼丝每天放学回家，就在家门口盼望劳动了一天骑马归来的父亲。父亲把她抱上马，肩上挂着真刀真枪，像她所羡慕的西部牛仔一样纵马奔驰。这是小艾格尼丝最喜爱的游戏。

父亲自己不识字，对女儿读书也不以为然，他嘲讽道：“读书是花花公子闲得发慌才干的无聊事。”最希望艾格尼丝学到本领的是母亲莎拉。母亲曾读到小学毕业，她在家里最自豪的是会算账。父亲当了运输组的承包人后，常为不会算账而犯难。

“喂，莎拉，你来算算看。”

母亲用围裙擦了擦手，很快就把账算清楚了。只有这时，父亲才会用尊敬的目光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母亲。

母亲希望小艾格尼丝长大成为一个有本领的人。艾格尼丝12岁了，渐渐懂事，肯努力学习，她的成绩超过了班上有钱人家的孩子，总是全班第一。但尽管如此，她还是明显地感觉到穷人孩子和富人孩子之间的差别，感受到富家孩子的盛气凌人的压力。小艾格尼丝穿着褪了色的、母亲手工缝制的粗布衣服去上学，经常受到富家孩子的嘲笑。

一个穿着缀满缎带和花边的连衣裙的女孩问艾格尼丝：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在铁路外边，珀加特利河对岸。”

在特立尼达，铁道以内是中产阶级的住宅区，铁道以外，珀加特利河岸的山坡上，全是住窝棚、搭帐篷的穷人。

“哎呀，那么脏的地方？”女孩惊讶地叫道，“我爸爸是律师，你爸爸呢？”

小艾格尼丝感到受了侮辱，大声吆喝道：

“我爸爸是运砖的，劲儿可大了，你们谁的爸爸也比不上他。”

艰辛的生活磨练了艾格尼丝的性格，她十分倔强，争强好胜，一旦受了屈辱，就会像父亲那样粗声粗气地吆喝，大胆地挺身反抗。她不仅要保护自己，还要保护妹妹默特尔、弟弟约翰和萨姆。

漫长的冬季十分寒冷，北风夹着雪花透过帐篷的缝隙往里灌。父亲手里有了几个钱，往酒馆里跑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矿区里到处是煤，可是史沫特莱一家连买煤取暖的钱也没有。小艾格尼丝每天放了学，就背着背囊，带着默特尔、约翰和萨姆沿着铁路线捡拾机车上掉下来的煤块。一列客车呼啸而过，衣着华贵的旅客喝着酒，大声地说笑；孩子们揉着冻僵了的小手，羡慕地望着，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坐上火车去到那未知的远方。

这时候史沫特莱家里增加了一位亲人，就是莎拉的大姐，孩子们的姨母蒂莉。蒂莉姨是一个又漂亮又能干的女人，她在密苏里已经和一个农场主的儿子订了婚，却一直不愿意出嫁。她在附近一个农场里做帮工，自己养活自己，还可以买时髦的衣服。罗尔斯老爹很不赞成。在那个年头，西部的农村妇女是不出去做工的，就算要做，也是做一些别人家里的家务活，否则就会被人看作不正经，找不到好丈夫。罗尔斯老爹的妻子、蒂莉和莎拉的后母玛丽偏偏又是一个不愿意依靠男人的敢说话的女人，对大女儿的做法很支持。一家人常为了这事吵得不可开交。莎拉一家在特立尼达住安稳了，就写了一封信，叫蒂莉到特立尼达来一起生活。

蒂莉到来以后，不愿意跟莎拉一起在家里和地里干活，她选定了洗衣房的工作，在碾压机上工作每周可以挣到 7 美元，升到浆洗机上就可以拿到 11 美元了。蒂莉把大部分钱都交给了莎拉，还给艾格尼丝三姐妹买好看的衣服。艾格尼丝后来在《大地的女儿》这部自传文学著作中回忆道：“好多年，我们大部分好看的衣服，都是蒂莉姨用各种方法挣来的钱买的。”艾格尼丝崇拜蒂莉姨，因为她是一个独立的女人，她在家里用不着看妹夫查尔斯的眼色，遇到查尔斯欺侮莎拉，她就挺身而出保护妹妹；查尔斯气得说不出话来，但拿她没有办法。

大约一年以后，有一天艾格尼丝放学回家，父亲正在对蒂莉大叫大嚷。原来蒂莉看到家里怎样精打细算都入不敷出，就当起了女招待。有人告诉查尔斯，说蒂莉为了钱跟男人睡觉。查尔斯觉得受了侮辱，怒不可遏，骂蒂莉是妓女。蒂莉反唇相讥，说查尔斯只知道喝酒，不顾老婆孩子的死活，她干这些事情，全是为了这个家。查尔斯举起一把斧子。蒂莉终于离开了史沫特莱家。

史沫特莱一家在特立尼达艰难度日。一年春天，突然一场暴雨带来了洪水，横扫了他们支帐篷的珀加特利河岸。真是雪上加霜。他们损失了所有的财产，包括全家最值钱的东西，从密苏里州奥斯古德带来的一只钟和一台缝纫机。查尔斯只好到山里和煤矿签合同，搞他当初不愿意干的运煤工作。从这年 5 月到 11 月苦干了半年，将要得到工钱的时候，莎拉倾尽所有，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宴请矿上的老板。老板吃完饭，拿出查尔斯签订的合同，说查尔斯六个月的工钱已经一个子儿也没有了。查尔斯不识字，吃了老板的哑巴亏，只好自认倒霉。

这以后，查尔斯到另一个矿业镇特西奥去找工作，莎拉用家里所有的钱在珀加特利河岸租下一间房子，开了一间包伙食的寄宿旅店。可是房租和饭钱收不回来，经营又失败了。而查尔斯在特西奥，酒喝得越来越多，给家里带回来的钱越来越少了。

艾格尼丝已经 13 岁，为了继续读书，她放了学就到别人家里去干活，把微薄的收入全数交给母亲。小姑娘毕竟年纪太小，摇着别人的孩子睡觉，自己也支撑不住睡着了；别人的孩子哭了，哄着哄着自己也忍不住哭起来。由于饥饿难耐，她把牛奶瓶面上的一层奶油喝了。她被解雇了，在路上走了好几个小时不敢回家。倒不是怕母亲打，而是怕看母亲那绝望的眼神。

莎拉去给人家当洗衣妇，天不亮就要起床，去洗那堆得像座小山的脏衣服，直洗到晚上 8 点钟，一天工资只有 1 美元 30 美分，只够孩子们吃土豆面糊汤。艾格尼丝放了学就去帮母亲洗衣服。母亲疲惫不堪，人也越来越消瘦，一双手皮包着骨头，青筋暴突，乱蓬蓬的头发随随便便地在脑后绕成一个发髻。莎拉终于病倒了，可是从没想到要请医生，因为医生只给有钱的人看病。小艾格尼丝守在母亲床边，不断地用火把砖头烤热，用毛巾包好，放在母亲的背部和头边。

艾格尼丝无法继续上学了，她退了学到一家烟厂去做工，把烟叶从烟梗上撕下来，卷成雪茄。她跟着烟厂的女工学会了骂人，说粗鲁的话，可是心里仍然想着上学念书。工厂里又潮湿又阴暗，她干得很慢，不久就被解雇了。

查尔斯在德拉瓜签订了运输合同。1907 年，也就是艾格尼丝 15 岁那年，史沫特莱一家移居德拉瓜。这是一个位于路德洛峡谷里的矿业小镇，是维克多美国燃料公司的产业，矿工们在这里受到极端残酷的剥削，他们的生命安

全毫无保障，井下经常发生瓦斯爆炸，引起大火，矿主竟不顾矿工死活，下令关闭通风口。因为他们认为，煤炭比矿工的生命更值钱。艾格尼丝经常看到人们用门板抬着死难矿工的尸体从她家门口经过，矿工的孤儿寡妇们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不绝于耳。这种悲惨的情景，在艾格尼丝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矿工们工资很低，领不到现钱，领到的是一种公司内部发行的通货，只能在公司开的镇上惟一的一家商店里购买大大高于市价的生活必需品，在公司开的酒店里喝酒。要是拿这种通货到银行去换美元，就会有很大的亏损。工人们忍无可忍，多次举行罢工。公司的官员对罢工工人毫不留情，地方行政长官动用武装警察进行残酷镇压。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延续了好几年，最后是1914年轰动全国的路德洛大屠杀：当时国民警卫队袭击了罢工者居住的营地，制造了杀死六个男工人、两个妇女和十一个小孩的大惨剧。

十多年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大地的女儿》中提到她的父母对待罢工的不同态度：

我记得她(母亲)本能而且毫不犹豫地同情矿工。她仇恨有权有钱的人和矿业公司。那些年来，她已从一个贫穷的农妇变成了不自觉的无产者。但是我父亲就不那么明白，他是一个“生在美国”的美国人，希望能有一天成为老板，他试图和地方长官、营地官员一起对付罢工者，他们是外国人……但是，像我母亲一样，他逐渐知道，做工最多的肯定不是挣钱最多的，看来似乎是有钱人的过错，但究竟怎么回事，他也不知道。

查尔斯的包工组在矿上干活，他们的食宿由莎拉和孩子们照顾。这时候艾格尼丝已满了15岁了，她身材高大，青春焕发，一头浅金色的头发，一双灰蓝色的大眼睛流露出又天真又倔强的神情。包工组里有个从新墨西哥州来的牧场牛仔爱上了她。他送给她一条金表链，说只要艾格尼丝答应嫁给他，就给她一匹小马、一枝好枪和他在新墨西哥州的牧场的一半。艾格尼丝还太年轻，不知道出嫁是怎么一回事，但一匹马和一枝枪却是她梦寐以求的东西。一天晚上，她的父母把她叫到跟前，对她说：“你还小，婚姻的事你还不懂。”求婚者被拒绝，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德拉瓜。

1908年初，16岁的艾格尼丝头一次有机会独自出远门。一位小学教师鼓励她到新墨西哥州参加一个县的教师资格考试。艾格尼丝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就借了这位小学教师的衬衣和裙子，骑上马去参加考试。她及格了，被派到一所山里的学校任课，每月有40美元的工资。就这样，从1908年到1910年2月，艾格尼丝一直在新墨西哥州东北部科尔法克斯县的拉顿镇教小学。新的工作，新的生活方式，使艾格尼丝感到由衷的欢乐，她终于可以自立，不必害怕像母亲那样成为田里和家里的奴隶了。

1910年2月的一个下雪天，艾格尼丝突然接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她立即动身回家。医生说，母亲严重营养不良，加上操劳过度，患了肺结核。一个靠吃土豆面糊而拼命干活的女人，不可能不得这种病。母亲只有42岁，可是满脸皱纹，满嘴的牙齿只剩下一颗。艾格尼丝在母亲床前守了三天三夜，紧紧地拥抱着母亲，为过去没有充分地对母亲表露感情而无限内疚。生活的极端贫困和艰辛，妨碍了亲子之情的表达，现在，她要用一颗火热的爱心去温暖母亲的病体，可是这已经太迟了。三天以后，母亲用微弱的声音呼唤着：“我的女儿，我亲爱的女儿！”在艾格尼丝怀里安详地咽了气。

父亲用枪把母亲的箱子打开，拿了钱，泡在小酒店里不回家。

现在，18岁的艾格尼丝实际上成了一家之主。大姐奈莉已经在两年前出嫁，在母亲去世前两周死于难产。艾格尼丝只好辞去教师的工作，回到家里照料弟弟妹妹 16 岁的默特尔、14 岁的约翰和 12 岁的萨姆。

艾格尼丝找到了一份按日计算工资的工作，她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用母亲一直收藏着的、蒂莉姨走的时候给的 45 美元，买了新窗帘和新床单，希望让父亲高兴，留在家，不料父亲却生了气：

“艾格尼丝，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艾格尼丝只好把钱的来历告诉父亲。

“这个婆娘，竟敢欺骗我，临死还藏着私房钱！”父亲勃然大怒，一把夺过剩下的钱，跑得不知去向，过了几天，才烂醉如泥地回到家里。

这个家使艾格尼丝失望了。母亲赤着脚弯着腰在贫瘠的土地上，在一无所有的家里操劳了一辈子，受尽了种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而父亲始终相信穷人能够发家致富的美国神话，到头来还是成了愚昧和贫困的牺牲品。艾格尼丝不能像父母那样生活，她要走自己的生活道路。她不愿意结婚，她要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她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尽量争取多读书，多受教育。她终于硬起心肠离开了家，到丹佛去找蒂莉姨妈。

蒂莉出钱让艾格尼丝到速记短训班学习，学成以后，先后在两家杂志社给主编当秘书。这是艾格尼丝最感兴趣的工作，她极想学会怎样给杂志写稿。可是事与愿违，这两位上了年纪的主编都不约而同地想方设法对年轻的姑娘进行种种骚扰和侵犯。办公室里坐不住了，她要求去当杂志推销员，上街去征求订户。这种抛头露面的工作可不是年轻姑娘干的。为了推销杂志，艾格尼丝经常要坐火车到处跑。在火车上，妇女们都友好地跟她坐在一起交谈，得知她干的工作后，都转移到别的座位上去；男人们却相反，都纷纷凑到她跟前。理由是相同的，大家都认为干这种工作的必定是个不规矩的女人。在那个时代，妇女是不能挣钱养活自己的，男人不会找这样的女人做妻子。

在 1911 年，艾格尼丝干了半年推销员工作。她一心向往的仍然是上学读书，她有一股不可抑制的冲动：要充分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要通过学习开拓自己的未来。她大胆地向当时的坦佩师范学校，也就是现在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提出入学申请，被允许作为旁听生入学，因为她没有中学毕业文凭。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艾格尼丝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她替别人作速记，做过集体宿舍的清洁女工，当过食堂的女招待员，只要能够维持生活和缴纳学费，她什么工作都干。她干得最出色的一项工作是当受学生爱戴的生物化学教授艾里什的实验室助手。

艾格尼丝用尽了最大的力量，还是筹措不到足够的学费。这时候她想到了一个人，这是一个胡子拉茬的、骠悍的牛仔，名叫大巴克。史沫特莱一家在科罗拉多时，他跟艾格尼丝的父亲一起干活，一有空就教小艾格尼丝打枪、骑马、套马，用大折刀玩各种花样。艾格尼丝最喜欢这些男孩子的玩艺。后来在《大地的女儿》中她这样回忆大巴克：

大巴克的记忆对我是很亲切的，我不知道有比他更接近西部精神的男子。他干的一切事都带着一点讽刺意味的幽默；他对拥有的或是他挣来的一切物质的东西都慷慨大度。

一筹莫展的艾格尼丝觉得大巴克是可以帮助她的人，她给当时在克利夫顿铜矿当机修工的大巴克写信。他很快就回了信，给她寄来了钱，答应负责她半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那年夏天，在庆祝国会批准亚利桑那建州的跳舞会上，大巴克和艾格尼丝见了面。大巴克说，他妒忌那些跟她跳舞的人，他爱她，请求她答应嫁给他。艾格尼丝很惊讶，她相信他的诚意，但他已经 42 岁，对她来说，是叔叔一辈的人；再说，艾格尼丝这辈子不打算结婚，她要做一个独立自主的女人。大巴克很失望，仍然答应继续供她上学，希望她毕业以后会回心转意。半年以后，他从克利夫顿给艾格尼丝写信，他对求婚彻底绝望了，他要到墨西哥去参加革命。以后艾格尼丝再也没有得到过他的音信。艾格尼丝有一张大巴克的照片，她把它珍藏了一辈子。

坦佩是亚利桑那州铁路和盐河交叉点上的一个安静的小镇，坦佩师范学校里集中了各个阶层的年轻人，学生大部分是附近的摩门族姑娘，也有墨西哥和西班牙裔的青年。艾格尼丝是最贫穷的学生，穷得只有两件连衣裙，但她以自己出众的才华和辩论能力博得了同学们的友好情谊。

艾格尼丝是校刊《师范生》的固定撰稿人，1912 年 3 月，又当选为总编辑，经常在校刊上发表社论和短篇小说。她在她的第一篇社论里，要求她的同学们“受了教育要更好地理解那些境况不如自己的人们”；短篇小说《罗曼史》写一个母亲向她的孩子们叙述她如何克服种族偏见，嫁给一个印第安人。小说发表以后，艾格尼丝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印第安血统，叫大家用一个印第安名字称呼她：阿雅呼·史沫特莱。在校刊上，艾格尼丝初露锋芒，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思辨能力和文学才能，她自信将来能够成为一个记者和作家，她要用自己的笔杆和心灵，为生活在黑暗中、生活在远离知识的地方的人们说话。

第二章 创伤

在坦佩师范学校学习的第二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结识了对她终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的两位朋友——布伦丁姐弟。

布伦丁一家是瑞典移民，居住在纽约。姐姐索伯格 25 岁，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取得了学士学位，是坦佩附近的菲利克斯中学的教师。在坦佩师范学校举行全州的辩论比赛上，索伯格被邀请为评判员，在女学生的宿舍里住了一个星期。辩论的题目是“在亚利桑那州必须实行妇女参政”，艾格尼丝首先作支持这个观点的发言，反方持原教旨主义立场，反对妇女参政。艾格尼丝的发言有理有据，说服力很强，索伯格给她打了高分，两个姑娘因此互相认识，成为好朋友。

乍看起来，两位女友之间的差别真是太大了，索伯格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受过完整的教育，举止高雅，衣饰大方得体，极有风度，人也长得漂亮，正是艾格尼丝所羡慕的那种见多识广的女性。而艾格尼丝自己呢，来自西部矿区的贫苦家庭，书读得少，讲话口音不正，常出语法错误，说话做事直来直去，咋咋唬唬的，待人非常热情但往往有失分寸；穿一条褪了色的牛仔裤，一件很旧的衬衫，有时候甚至腰里还挂着一把匕首，还有一个那么怪里怪气的印第安名字，在索伯格眼中她完全是一个粗鲁的乡下丫头。

但是，她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谈妇女独立，谈生活理想，彼此都感到观点一致，有许多共同语言。索伯格的弟弟，24 岁的厄恩斯特·布伦丁在山里水电站的大坝上工作，每周都来跟两个姑娘一起吃巧克力冰淇淋，一起度过周末的时光。

厄恩斯特高高的个子，浅黄色头发，眼睛却是黑的，跟他的姐姐一样。不过他的生活道路却没有姐姐那么顺利。高中毕业以后，他先在纽约市测绘局工作了一年，然后上了缅因州立大学学工程。学了一年，不幸染上了肺结核。在疗养院休养了一年以后，却想换一种活法，跑到新泽西州办了一个养鸡场，但是很快就失败了。1910 年他到亚利桑那州找工作，给人家放牧马群。又过了一年，才在坦佩以东的山里，属于罗斯福水坝工程的盐水河源头找到了一份测量工作。他打算积蓄一些钱，到旧金山去进加利福尼亚大学。厄恩斯特心地善良，待人诚恳，是艾格尼丝从来没有见过的有教养的优秀青年。她知道，这样的小伙子不会欺侮女孩，不会看不起她这个贫穷家庭的姑娘，他会把她当作一个地位平等的朋友。

总之，姐弟俩都是艾格尼丝在愚昧落后的中西部没有见到过的有学问、有修养、懂得尊重别人、闪耀着文明光彩的人。更重要的是，姐弟俩都信仰社会主义，他们带艾格尼丝去参加社会主义者的集会，听以雄辩著称的出生于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的演说。他们像许多美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那样，还没有看出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而且他们本身就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因此，埃玛·戈德曼成为早期社会主义者崇拜的偶像，是并不奇怪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政治活动给艾格尼丝开辟了一个思想认识的新天地。艾格尼丝从小就看够了人间的不公平，她知道有些人不劳而获，有些人辛勤劳动却一无所有，她对周围的社会罪恶满怀着正义的愤怒，但她还没有遇见过任何一个人能够对这一切作出一个理性的答案，设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现在，她觉得自己终于遇到了能够这样做的人。

渐渐地，厄恩斯特和艾格尼丝两个人谁也离不开谁了。艾格尼丝表面上

装得若无其事，心底里却泛起了温柔细腻的情感波澜，她知道，这就是爱情，少女的初恋来临了。与爱情同时来到心里的是恐惧和不安，她害怕迷恋会导致屈从，爱情会使她变成心爱的男子生儿育女的家庭奴隶，会丧失了人格的独立。在那个时代，独立的美国妇女大都牺牲爱情，抛弃婚姻。献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简·亚当斯，从事妇女参政运动的苏珊·安东尼，全国消费者联盟的弗洛伦斯·凯利都无一例外地是“老姑娘”。艾格尼丝憧憬着的婚姻是罗曼蒂克式的：绝不要孩子，甚至连性生活也不要；不作家庭主妇，出外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夫妻完全平等。她决不能重蹈母亲生育过多一辈子困于家庭的覆辙。

但是，艾格尼丝所设计的生活模式，厄恩斯特能够接受吗？

在一个月光如水的夏夜，厄恩斯特和艾格尼丝骑着两匹快马，在城外的峡谷和沙漠之间奔驰。他们满怀激情，相拥热吻。风在耳边呼啸，因此他们的情话不是喁喁细语，而是高声叫喊，向着天空和大地，高喊出爱情的誓言：

“我爱你，艾格尼丝！”

“亲爱的厄恩斯特，我害怕，我想起了我那可怜的母亲。”

“不，艾格尼丝，我们将过一种全新的生活。”

艾格尼丝把自己关于婚姻的设想告诉厄恩斯特，深爱着艾格尼丝的厄恩斯特毫无保留地全部接受。她对未来的憧憬将要成为现实。

此后不久，布伦丁姐弟移居旧金山。一双情侣洒泪惜别。厄恩斯特在给艾格尼丝的信中正式提出求婚。艾格尼丝离开坦佩，来到旧金山。1912年8月24日，在厄恩斯特接受加利福尼亚运河工程的聘请，动身去英庇里尔峡谷工作前几个小时，他们在旧金山市政厅登记结婚。艾格尼丝为了显示自己引为自豪的印第安血统，在登记时用了“阿雅呼”这个名字。

结婚以后，艾格尼丝搬到英庇里尔峡谷的小镇艾尔珊特罗，在一家旅馆里当秘书，这里生活费用较低，可以积蓄一些钱，将来重返学校读书；再说，这里离厄恩斯特工作的运河工地也靠得很近。

1912年，也就是艾格尼丝结婚那一年，威尔逊当选美国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大谈社会正义，说：“美国引以为自豪的产业成就是由长时间内，悲惨地背负死亡重负的无数男女和儿童们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肉体以及精神方面的牺牲所带来的。从煤矿、工厂和不断发生纠纷的家庭传出的呻吟和叹息声是严重地剝割人心的生活噪音。在此之前，我们却对这种声音一直充耳不闻。”这一痛彻的倾诉，出色地象征着传统的人道主义精神，威尔逊总统很快就成了美国人民心目中的20世纪的理想主义的骑士。威尔逊入主白宫时期，社会改革达到了顶点，工会运动也在“人的价值高于财富”的呼声中崛起。

本世纪初，美国就成立了社会党，这个党以工人运动为基础开展自己的活动，到了威尔逊当总统的时候，社会党以革命的工会为出发点组成的国际产业工人联盟已经在工人中有了广泛的影响。国际产业工人联盟是超越国籍、种族和性别的以一切工人为对象的组织，它迅速地吸引了一大批在贫困和饥饿中挣扎的不熟练工人。这个组织否定资本主义，热衷于激烈的革命行动，而不仅仅是宣传革命理论。而另一个工人组织美国劳工联盟则是一个事务性的工联主义组织，主要以熟练工人为对象，是一个只考虑眼前利益的保守派别。

厄恩斯特用在运河工地工作挣来的钱，支持艾格尼丝到加利福尼亚的圣

迪戈师范学院继续读完最后一年。1914年艾格尼丝完成了师范学业，被任命为教师秘书及师范学院中专部打字教师。她在坦佩时形成的对学习和工作的高度自信心和对周围的人吸引力又复活了，她精力充沛，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她创办了校刊《师范新闻》，组织校园戏剧演出活动。据校刊报道，艾格尼丝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扮演过安东尼奥。

艾格尼丝有着极端贫穷艰辛的个人生活体验，很自然地就被国际产业工人联盟所吸引，不久就成为这个组织的一个成员，以后又参加了社会党。这段时间，艾格尼丝有了革命生涯的最初体验。

平民诗人乔·希尔创作了国际产业工人联盟之歌《天国的馅饼》，这首歌用的是赞美上帝的圣歌《哈里路亚》的旋律，嘲弄了“我们在天国会吃到馅饼”一类的宗教欺骗，表达了民众的叹息、不满、尖锐的嘲讽和强烈的愤怒。这首歌在社会上很流行。艾格尼丝也很喜欢唱这首歌：

来吧，工人同志们，
来参加反叛的行列。
来吧，愤愤不平的工人同志们，
来伸出救援之手。
让我们向着寄生虫进军，
把它们从这国土上清除出去。

这段时间最有意义的事件是印度改革者克沙瓦·夏斯德里博士和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的演说。圣迪戈师范学院打算把他们请到学院里来，但有些教职员认为戈德曼观点过激，夏斯德里反英倾向过于明显，害怕引起纠纷。因为三年前戈德曼到圣迪戈时引发的一次爆发性事件人们记忆犹新。当时一部分保守的市民反对让戈德曼演说，有些人一哄而起，把戈德曼的经纪人兼情人赖特曼捉住，往身上涂抹柏油，贴上羽毛，这是一种很严重的侮辱行为。于是几千名国际产业工人联盟的会员和戈德曼的支持者冲进市镇，要求维护言论自由。警察抓了国际产业工人联盟的人，一时监狱爆满，社会上进步力量和保守势力之间展开了剧烈的争论。最后，维护言论自由的一派终于占了上风。三年后的这一次，由于政治气氛有所改变，戈德曼和夏斯德里的演说终于能够顺利进行。

戈德曼在圣迪戈师范学院公开演讲了三次：关于易卜生作品的社会意义，关于尼采的哲学和关于玛格丽特·桑格的节制生育运动。艾格尼丝对她的演说很感兴趣，她第一次听到了关于节制生育的理论，认识了在美国有一位节制生育运动的创始人玛格丽特·桑格夫人。桑格夫人认为多产多育是造成妇女脱离社会成为家庭奴隶的决定因素，她提倡妇女节制生育，特别是贫穷的劳动妇女更应如此。艾格尼丝深受感动，觉得戈德曼的演说解决了一个她长期郁积于心未能找到答案的问题。当时提出节制生育的观点如石破天惊，没有多少人能够接受，但是艾格尼丝接受了，并且认定这是妇女是否具有独立人格的关键。许多年以后，当艾格尼丝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时，她才真正认识到，妇女的解放是与民族的解放、阶级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节制生育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一个迫切而又实际的问题。

夏斯德里的演说使艾格尼丝第一次接触到英国殖民主义的问题，她同情印度人民在殖民主义压迫下遭受不幸的悲惨命运。觉得他们就像她所熟悉的

西部矿工和贫苦农民一样。史沫特莱家有一位先人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跟英国殖民者打过仗，她为此感到自豪。夏斯德里的反殖民主义理论打动了她的心弦。她去找夏斯德里，请他提供在演说中提到的在美国的印度流亡政治领袖莱帕特·拉伊的信息。后来在纽约，艾格尼丝成为拉伊的助手，帮助他从事印度民族解放斗争。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被誉为理想主义的骑士的威尔逊总统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抛弃了不参加欧洲战争的承诺，把美国卷入了巨大的战争中，美国青年不断地被送往欧洲战场，国内劳动人民也被推入了苦难的深渊。史沫特莱一家在科罗拉多更加生活无着。艾格尼丝接到家里的来信，说父亲和两个弟弟约翰和萨姆都在一个农场主的庄园里干活，活很重，吃不饱。艾格尼丝心里非常内疚，她想办法把妹妹默特尔接到自己身边，进圣迪戈师范学院读书。后来默特尔回到家乡当了一个小学校长，成为家里唯一有固定收入的人。可是默特尔的到来却增加了艾格尼丝的烦恼。这时候艾格尼丝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的见解，认为彻底改变工人阶级的现状是可能的。默特尔和姐姐一样性格倔强，却认为要改变社会的根本结构是愚蠢的、浪漫的幻想，是一定要失败的。艾格尼丝不能理解，为什么默特尔不谴责这种容许财产两极分化、公民机会不均等、富人们胡作非为的社会制度；为什么默特尔对母亲一生操劳过度、死于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不像艾格尼丝自己那么气愤？终其一生，姐妹俩感情亲密，互相牵挂，但这种分歧却始终没有得到统一。

结婚四年以后，艾格尼丝和厄恩斯特的婚姻的裂痕越来越深，终于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结婚的头半年，厄恩斯特在英庇里尔峡谷的运河工地工作，艾格尼丝留在旧金山和姐姐索伯格住在一起，夫妻俩书信往来，两地相思，充满了浪漫色彩。半年后艾格尼丝搬到英庇里尔山谷的艾尔珊特罗镇，在一家旅馆里当秘书，夫妻俩才真正开始住在一起。艾格尼丝对性生活没有兴趣，甚至十分反感。也许是由于小时候看到了太多的苦难，她不相信世界上有健康的两性生活，不相信性可以具有爱情的内涵；她只相信妻子一旦生儿育女，就会变成丈夫的奴隶，失去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她的母亲不就是父亲的奴隶吗？母亲被父亲殴打得到处躲藏的情景，她终身难忘。她甚至想，跟许多男人睡过觉的蒂莉姨妈，尚且可以对敢于打她的男人喝一声“滚出去”，而母亲却从来没有过这种权利。爱与性的激烈对抗，使她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矛盾。于是她对夫妻生活抱着一种病态的戒备心理，用抑制的鞭子抽打自己内心的自然欲望，令人吃惊的幼稚和无知使她紧抱着自己的偏见不放。

1913年6月初，艾格尼丝早晨起来觉得发晕要呕吐，她知道她最害怕的事情将要来临，她怀孕了。她深信，一旦有了孩子，她就会无法工作，更不能继续完成学业，她和厄恩斯特将不能成为在学识上和经济上都独立的伴侣，等待着她的将是彻底依附于男人的家庭妇女的命运。她感到极端恐惧。当时厄恩斯特在运河工地上，艾格尼丝自己到药房里买了能引起流产的药吃了下去。厄恩斯特回家，发现艾格尼丝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厄恩斯特大惊失色，急忙把她送到医院，请医生把流产手术做完，否则艾格尼丝会把自己弄死。艾格尼丝清醒过来时，厄恩斯特坐在床边向她微笑，显然是想使她放心和得到抚慰。可是艾格尼丝一见他笑，气就不打一处来。后来她在《大

地的女儿》中描述了当时的心情：

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厄恩斯特正笑眯眯地坐在我床边。我恨他的笑脸——我恨，我恨！我的身上还有一个没有复原的伤口，我曾经面对着死亡，怎么他还敢笑！从我身体里刚刚取出了一个胎儿，我现在全身心地需要这个胎儿，他怎么胆敢微笑！我在这茫茫的空间感到寂寞无依，他怎么敢笑……他怎么敢……他，是一个男人，他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懂！

艾格尼丝不让厄恩斯特付手术费。她说，她自己身体上的事情，不让任何男人付钱。

索伯格为弟弟的婚姻的前途担忧，也对这对夫妻不要孩子的约定不能理解。她为弟弟抱不平，她知道厄恩斯特是多么希望要一个孩子。她还觉得艾格尼丝和厄恩斯特两个人在气质上很不协调。她坦率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弟弟。厄恩斯特只是微微一笑，并不当作一回事。这次流产后不久，他就把艾格尼丝送到圣迪戈师范学院继续读书。

1915年6月，当艾格尼丝在圣迪戈中专部当教师的时候，她第二次怀孕了。她又一次作出了绝望的决定：人工流产。厄恩斯特陪着艾格尼丝在医院里做完了手术，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就坐电车回家。艾格尼丝无法忍受身体的痛苦和疲惫，躺倒在电车后排的座位上，大声地呻吟起来。车上的乘客都围了上来，询问她需要什么帮助，有的人还怀疑这女人是不是喝醉了。厄恩斯特窘得满脸通红，他是个讲礼节要面子的人，在大庭广众中出丑使他受不了。他生气地冲着艾格尼丝喝道：

“艾格尼丝，快起来，成何体统！你没看见大家都在看着你吗？”

他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语调对她说过话。就在这一瞬间，她与他之间的鸿沟变得难以填平了。他只想到艾格尼丝举止失礼，缺乏教养，引人注目，没有想到一个女人做了人工流产以后肉体上的痛苦和负担。他本来应该抚慰她，却竟然对她吆喝起来。艾格尼丝失望了，她断定，厄恩斯特原来与一般把妇女当作家庭奴隶的男人并没有多大区别。而在厄恩斯特这方面，他固然珍爱艾格尼丝的独立精神和上进心，佩服她的坚强意志，全力支持她的求学和工作，但他怎样想也想不通，为什么她就不能同时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他需要一个安安稳稳的幸福家庭，渴望享受夫妻厮守、子女绕膝的乐趣。这本来是很自然、很正常的。而艾格尼丝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统一起来。两次了，她就是不要孩子，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这使厄恩斯特受不了。他们的爱情的绚丽的罗曼蒂克色彩一天天地消失，两个人之间的裂痕也一天天地加深了。厄恩斯特终于看出，艾格尼丝作为妻子永远也不会快活，而自己作为丈夫也是永远无法使她快活的。

这年秋季，艾格尼丝回到圣迪戈去继续工作，厄恩斯特离开了运河工地，在圣迪戈开了一家加油站，买了一辆汽车，艾格尼丝很快就成了一个熟练而大胆的驾驶员。艾格尼丝参加了一个名叫“自由论坛”的组织，并且成为这个组织的秘书。自由论坛的工作成了她课外社交活动的主要内容。她请了许多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到学院里来演说，包括印度民族主义者和诗人拉宾南特拉德·泰戈尔，主讲墨西哥形势的林肯·斯蒂芬斯和主讲爱尔兰民族运动的科内林·利汉，还有1916年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阿伦·本森。艾格尼丝和厄恩斯特的家成了社交活动的中心，艾格尼丝在家里接待西部牛仔老乡，和他们一起弹吉他，唱民歌。

可是艾格尼丝的心里充满了痛苦，要维持和厄恩斯特的婚姻是越来越困难了。厄恩斯特离开运河工地到圣迪戈来，原是想有更多的时间跟妻子在一起，现在他也发现两颗心已经无法靠近了。厄恩斯特终于首先提出了离婚。他对艾格尼丝说，他们的友情将保持到永远，如果艾格尼丝遇到困难，他一定会去帮助她，无论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

艾格尼丝孤零零地留在了圣迪戈。这时候，命运跟她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她丢失了钱包，钱包被人交到圣迪戈师范学院院长爱德华·哈代手里。他打开钱包想知道失主是谁，发现了一张粉红色的社会党党员证，上面是本学院中专部教师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名字。他把她叫来，辞退了她的妹妹，默特尔·史沫特莱，明年毕业了就不可能得到教师的职位。

艾格尼丝决定离开圣迪戈到纽约去找工作。与厄恩斯特的婚姻使她难忘，但没有怨恨。后来她在一封给好友的信中写道：

我脱离低水平的思想、生活和文化，靠的就是他的力量，他是我惟一的支持。如果没有他，我不知道我是否会认识世界上还有另一种生活。我没有遗憾，但我很难过他受到了创伤，而他是爱我的。只有一个能为我受苦的、爱我的男人才能帮助我。我欠厄恩斯特的比他所能设想的要多得多。

厄恩斯特后来跟一位名叫埃莉诺的姑娘结了婚。埃莉诺温顺、善良，家庭生活十分和谐、幸福。厄恩斯特一家与艾格尼丝一直保持着真挚的友谊。艾格尼丝在《大地的女儿》中曾经以深情的笔调回忆道：

我紧紧地抱着自己的顽固不放，使厄恩斯特吃尽了苦头，尽管如此，他不但没有责备我，还从心里安慰我。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男子汉。他的妻子也是一位与其相配的热心肠妇女。我深深感到，生活在他们的友情当中无限幸福。我们能以好朋友相处是我的幸运。

第三章 渴望

1916年底，离了婚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她第一次从中西部的原野和小镇投身到这个被高楼大厦挤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阴暗冷漠、没有一点生命绿意的灰色的大城市，孤独和无所适从的感觉紧紧地缠绕着她。她可以投奔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在纽约当中学教师的索伯格·布伦丁，虽然她不知道索伯格和厄恩斯特的父母会对她采取什么态度。

慈祥善良的布伦丁妈妈像接待出远门归来的女儿一样接待了史沫特莱，安顿下来以后， she就把大城市里待人接物的礼节一样一样地教给她，还送给史沫特莱一顶大方得体的帽子，要她在申请工作跟雇主面谈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

史沫特莱不久就找到了一份秘书工作。

她没有住处，只好跟索伯格一起住在小公园旁边的格林尼治村。格林尼治村是一个小小的住宅区，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数是社会党及其外围社团组织的成员们。索伯格也是个社会党员。史沫特莱通过她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包括简·亚当斯、玛格丽特·桑格和亨利埃特·罗德曼，她们都是当时最出色的女性，妇女解放运动的领油。她们的妇女解放观点和史沫特莱在坦佩师范学校时形成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史沫特莱和这些中产阶级出身的朋友在一起总觉得自惭，因为她不像她们那样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每当史沫特莱流露出这种情绪的时候，索伯格就安慰她，说学校也不一定教给人有用的东西。史沫特莱反而生了气，觉得她们这种出身富裕家庭的人，自己有了足够的受教育的机会，书读够了，反而不了解穷苦而无权的人们的需要。

史沫特莱在纽约白天当秘书，晚上在纽约大学上夜校，生活忙碌而艰辛。但史沫特莱已经习惯了拼搏，她意志坚强，虽然这是一种未经雕琢的粗糙的坚强，但她只要认准了目标，就会毫不退缩地干下去。此刻她坚信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和作家，她既自信，又充满着把信念化为行动的热情和勇气。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已经打了两年多，美国公众时刻担心美国被卷入战争。这年威尔逊总统正在争取连任下一届美国总统，他在竞选演说中许诺排除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危险性，提出“美国不参加欧洲战争”的口号。史沫特莱也像许多社会党人及其支持者那样，投了威尔逊的票，但她很快就后悔了。威尔逊再次当选以后，对大军火商言听计从，参战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史沫特莱和她的中产阶级朋友们一起，投入了反战运动。她比她的朋友们更清楚，被卷进残酷的战争机器变成炮灰的，正是那些年轻的劳动者，是像她自己一样的穷苦人。

反战的宣传和参战的宣传，反战的游行和参战的游行同时走上了纽约街头。社会党人、工会和国际产业工人联盟是反战的中坚。占统治地位的参战势力得到政府的支持，用美国所特有的捏造和诬陷手段对反战派的领袖进行迫害。以《天国的馅饼》等歌曲闻名世界的诗人乔·希尔被投入明尼阿波利斯的监狱并被处以死刑。在旧金山，有人向参战游行队伍投掷了炸弹，工会活动分子托姆·穆尼被诬为杀人犯，遭到逮捕，被判处终身监禁。（后来由于社会各界的抗议，穆尼在1939年恢复了自由。）

1917年4月6日，威尔逊总统下了对德宣战的命令，无数群众在风雨中集合在纽约联合广场高呼反战口号，史沫特莱也参加了。游行队伍从纽约行

进到周围的城镇，到处都有支持反战的人群。史沫特莱第一次看到了组织起来的群众的伟大力量；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也是充满了力量的，她很自豪。她第一次在街头向群众发表了反战演说。关于这第一次演说，后来史沫特莱在她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中有一段描述：

有人把我推到前面去，叫我跟他们讲话……我听人讲过也在小说里读过，一个普通男人或女人如果突然面对大的责任会变得高大起来，他们讲的或做的多么雄辩，多么光辉灿烂，于是听众狂热地鼓掌欢呼。似乎从这一刻起，他们就成为名人了。但是我可不是小说里的人物，我站在汽车的挡泥板上，惊异地看着工人们往上看的脸。我明白我既无知心里又乱，说了几句话，我就下来了。

这次演讲是不成功的。史沫特莱知道，她要讲的她心里都明白，至少比她的中产阶级朋友们明白得多，但是她胆怯，她讲不好，毕竟这是第一次。

这时候，史沫特莱接到家里的来信，说弟弟约翰为生活所迫，偷了别人的一匹马，坐了牢。史沫特莱生气极了，要是他偷的是面包，那还情有可原，因为他饥饿；可是他偷的是一匹马。史沫特莱写信把弟弟狠狠地责骂了一顿，她气得都不会选择词语了：“你怎么这样混账，竟偷起东西来了！”不久，小弟弟萨姆来信了，他说约翰出狱以后，在俄克拉荷玛做苦工，被阴沟塌方压断了颈椎，很快就死去了。现在家里生活无着，如果艾格尼丝不能支持他到技工学校去读书，他准备到欧洲去打仗。这封信对史沫特莱无异于晴天霹雳，她心里的痛苦无法形容，深深的自责比悲伤更剧烈地撕裂着她的心，她恨自己没有给家里更多的帮助。她回了信，给家里寄了钱，劝萨姆不要去当兵，她答应一定尽快寄钱帮助他上学。可是妹妹默特尔却跟姐姐不一样，她是个主战派。她在圣迪戈做支持战争的工作，说这是为了国家。史沫特莱激动地写道：“谁的国家——那个会让我们像母亲一样地死去，像蒂莉姨妈一样当妓女，像约翰弟弟一样死得像只老鼠的国家——是谁的国家？”

1917年3月，史沫特莱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听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莱帕特·拉伊的一次演讲。他在演讲结束时说的一段话使史沫特莱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你们美国人——你们的制度，你们创造文化的闲暇是建立在别人受强权奴役的身躯上，这时候你们能够心安理得吗？难道你们这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律是你们生活中的法律吗？若果如此，你们是没有灵魂的机器，我们印度人正在为自由努力工作，难道你们也像英国人一样以为你们自己才配享有自由？你们说，你们的战争是为了民主，我对此表示怀疑——你们的原则不包括亚洲，而亚洲人却占人类的四分之三。”

史沫特莱被莱帕特·拉伊的演说深深地打动了。一个星期天，她去拜访莱帕特·拉伊。这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肤色黝黑，头发里夹杂着一绺白发，相貌丑陋，神情严厉，脸的一边有一条伤痕，一只眼睛几乎已经瞎了。1913年拉伊被印度国民大会党派遣到英国去陈述他们的立场，由于战时英国入境限制而被滞留在美国。拉伊在美国已经逗留了将近五年。拉伊是一位有丰富经验和组织能力的政治家，也是一位研究印度民族问题的学者。在美国，他在自由主义杂志上发表文章，使美国人了解印度，吸引尽可能多的美国进步人士支持印度民族解放事业。爱尔兰裔的美国人弗朗西斯·哈克特是一位爱尔兰民族运动的斗士，认识拉伊以后，他把从事爱尔兰民族运动和支持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给了拉伊有力的支持。《民族》杂志的发行人奥斯瓦尔德·维拉德也是拉伊的事业的热情支持者，他把《民族》杂志作为发

表鼓吹民族解放的文章的园地。新妇女运动联盟的创始人亨利埃特·罗德曼也是莱帕特·拉伊的崇拜者。史沫特莱通过索伯格的介绍认识了她。可惜她在 20 年代初期就过早地逝世了。1917 年，美国印度自治运动联盟建立，莱帕特·拉伊是这个组织的领袖。这个组织以纽约为活动基地，它的宗旨是运用非暴力手段使印度实现自治，成为英联邦内的一个自治领。拉伊认为，印度在英国殖民者的长期统治下，极端贫弱，文盲充斥，一旦完全脱离英联邦，很可能会落入另一个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魔爪。

像小草一样幼稚而本色的史沫特莱，对莱帕特·拉伊产生了一种像对父亲一样的崇敬和信赖的感情。史沫特莱从小看惯了生活中的种种不公平，种种以强凌弱的残酷事实，她憎恶强权，痛恨压迫，总是自然而然地、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命运同像自己一样的被压迫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拉伊的事业吸引了史沫特莱，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与拉伊的会见改变了史沫特莱的生活道路。几个星期以后，她放弃了她原有的秘书工作，搬出了和索伯格·布伦丁一起居住的格林尼治村，在靠近拉伊住所的威弗利普莱斯租了一个房间，白天给拉伊当秘书，晚上仍然上纽约大学夜校学习。

过了不久，史沫特莱接触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另一个派别，这个派别比莱帕特·拉伊的印度自治运动联盟规模小得多，但却对她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这就是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争取印度完全独立的卡达尔党。卡达尔党的成员大部分是本世纪初移民加利福尼亚的印度锡克族自耕农和工人。他们使史沫特莱想起了自己家乡的矿工和农民，产生了一种亲切自然的认同感。卡达尔党的领导层主要是孟加拉人，拉姆·钱德拉是个没有政治经验的年轻知识分子。萨林德朗那斯·高斯和塔克拉纳斯·达斯也是孟加拉人。高斯在孟加拉时就是一个带有劫富济贫的游侠色彩的年轻大学生，1916 年他 22 岁的时候，被孟加拉民族主义组织派到美国，目的是加强孟加拉民族主义组织和卡达尔党之间的联系。达斯是美国籍公民。他们都参加了卡达尔党，成为这个党的核心成员。他们向史沫特莱描述用革命暴力争取印度独立的前景，使出身西部贫穷家庭的史沫特莱十分动心。

卡达尔党人不像莱帕特·拉伊那样把民族运动停留在宣传和学术活动的领域，他们急切地要把革命付诸行动。他们认为，世界大战给印度国内的武装斗争带来了一个好时机。他们通过一个在柏林的民族主义委员会接受德国政府在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援。达斯 1917 年春还去了一趟日本，打算从那里把武器和人员运回印度。高斯在美国也作着同样的准备。正在这时候，在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卡达尔党人受到极大的精神鼓舞，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以革命暴力推翻反动政权的范例。卡达尔党人的活动更加积极了。

莱帕特·拉伊曾经会见过卡达尔党的成员，他拒绝跟他们合作，理由很明显：第一，拉伊反对用暴力手段彻底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他认为这完全是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会使印度陷于更大的灾难；他不赞成印度完全脱离英国，主张用和平的方式争取印度在英联邦内实现自治。第二，他反对卡达尔党人和德国建立联系并接受德国的帮助。莱帕特·拉伊生气地警告史沫特莱，不让她和卡达尔党人在一起。史沫特莱从未到过印度，对印度的国情毫不了解。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她越来越信服卡达尔党的观点，她不听从拉伊的劝告，认为拉伊只代表印度的上层阶级和地主。她也像达斯和高斯那样满腔热情而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她只知道，卡达尔党人是被从自己的祖国土地上驱赶出来，浪迹世界各地的志士，他们在绝望的深渊中挣扎着、斗争

着。史沫特莱认定他们的目标是正义的，她并不认为他们的做法脱离实际。她当了达斯和高斯策划武装斗争的纽约代理人，把她在纽约威弗利普莱斯的住所作为卡达尔党人聚会的场所和书信往来的传送站。

史沫特莱认识的印度人多了，家里也经常有印度人来来往往。人多了什么样的都有，有时候就免不了产生一些麻烦。按照印度的传统观念，一个女人，只有当她嫁了丈夫，用上丈夫的姓，称为某某夫人的时候，才会社会上被人承认。史沫特莱是个离过婚的独身女人，一个开放的、纵情的美国女人，而且是这个群体中惟一的女人。于是史沫特莱有时候会受到一些无聊的同伙的骚扰。这使她很烦恼，也使她悟出了一个道理，原来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并不是互相等同的一码事，即使民族获得了独立，也还不等于妇女就获得了解放。妇女的解放是更加任重道远的问题。

史沫特莱虽然和莱帕特·拉伊在观点上和行动上有着很大的分歧，但她仍然十分尊敬拉伊，把他当作父辈，感到跟他在一起没有任何压力，不像跟她那些中产阶级朋友在一起那样拘束，那样自惭。史沫特莱具有把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的博大胸怀，可以说是从莱帕特·拉伊的影响开始的。

卡达尔党的活动受到了美国军事情报官和移民当局的注意，他们开始截留和检查高斯和达斯的信件。史沫特莱的住所也受到了便衣警察的监视。

1918年3月19日，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天昏地暗，警察闯进了史沫特莱的住所。因为他们认为，此地已经成为处境危险的印度人的联络站和避难所，还可能藏有秘密信件和名单。军事情报官和司法部的人毫不理会史沫特莱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强烈抗议，把她的住所翻得乱七八糟，接着就把她带去审讯。便衣警察在她的公寓附近监视了两天以后，抓到了从旧金山回来的高斯。

史沫特莱被单独囚禁起来，经常提出去受审讯。很明显，官方的目的是要得到一个记载着卡达尔党人秘密通信名单和黑色的笔记本，而这个笔记本正是由史沫特莱保管着。

史沫特莱后来在《大地的女儿》中记下了当时的过程和感受：

里面的一扇门终于打开了，经过室内走廊我被领到一间长长的房间里去。

我说了姓名，父母何人，国籍。不，我不是德国出生的，我父母也不是。十分，十分肯定。我父亲有印第安人血统，我母亲也是老美国了。从印度来的印度人？不是，是美洲的印第安人。

别的人进来了，带着我房间里的一切东西——我的书，衣服甚至脏衣服。我看着他们，一言不发。他们把书擦起来，成了一小堆——我恐惧地发现其中有我那黑色笔记本。

我瞥了这房间一眼——一个吃得很肥的男人，角落里的英国人，薄嘴唇的审问者，然后看了看桌子上的黑色笔记本。我又坐下了。

“对了，慢慢来，然后谈谈。”其中一个人说。

我抬头看了看。“别麻烦我，我跟你们无话可说。”

“年轻的女士——这是战时，跟美国玩游戏是很危险的！”

“美国？我就是美国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并不比你的那一部分来得少——比角落里那个英国口音的德国人多得多！”

“你要无礼，不会对你有好处！我知道你自以为了不起，保护那些跟你在一起出出进进的黄狗。”

“黄狗？”

“亚洲佬——你知道我的意思。”

“什么亚洲佬？”

“这里是前几天写给高斯的一封信，告诉他怎么从这个国家逃出去。你知道他是犯了法的在逃犯！你作为公民的责任是报告警方，这个人在哪里？”

我注意角落里的英国人——我作为公民的责任，真是！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回答。

“你在说谎！我们可不想同一个德国间谍浪费时间！”

“你说谁是德国间谍？你说！你们才是肮脏的英国间谍！”

夜里，史沫特莱躺在冰冷的铁条床上发抖。天好像永远也不会亮起来，她的思绪集中到那本黑色的笔记本上：要是他们发现了笔记本的内容，后果将会不堪设想，同志们就得认为是我出卖了他们！

史沫特莱被囚禁在曼哈顿的托姆斯监狱。一个个排成一行的极小的铁格子窗子就像一块块墓碑，整座监狱就像层层叠叠的坟场，阴森得叫人毛骨悚然。“托姆斯”这个词，就是“坟墓”的意思。

史沫特莱在牢房里和四位女难友朝夕相处，出狱以后，她根据自己在狱中的生活体验，创作了短篇写实小说《铁窗难友》，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四位女难友的形象。在史沫特莱笔下，监狱生活反映出人生百态，是当时美国社会生活的缩影。《铁窗难友》后来发表在美国社会党的机关报《召唤》上，被认为是史沫特莱最成功的文学作品之一。

四位同监女囚都是来自社会底层，奈丽为生活所迫沦为娼妓，她因为用榔头敲了一个男人的头而被关进监狱。审讯她的道貌岸然的法官正是她的一个“客户”，她当庭给了他一顿辛辣而幽默的揭发。法官判处她缴纳一笔罚款，奈丽执意要那位法官替她付钱。奈丽每天在监狱里嬉笑怒骂，什么话都敢说，“她把满腔怒火都化为诅咒的暴风雨，向着男女看守和典狱官劈头盖脸地泼去”。奈丽对史沫特莱说：“你是个好人，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方来？我觉得你是对的，我也曾是个好姑娘。”奈丽出狱的时候，没有人来接她，她破旧的皮鞋在水泥过道上咯咯地响着，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再次向黑暗险恶的社会走去。

梅是一个48岁的妇女，为了一个心爱的男人，成为职业的伪造文书的罪犯。她年轻时当过演员，后来年纪大了，只好到工厂去做工。史沫特莱问她：“你为什么不在工厂里干下去？”她回答：“你到工厂去干一阵子就会明白了。”除了伪造文书她什么也干不了，难道上街去拉客？她老练地告诉史沫特莱，监狱方面一定会在她这种政治犯身边安排一个暗探，以便从她嘴里套取情报。为了嘲笑史沫特莱的幼稚，她说，她本人可能就是暗探。梅是一个被罪恶的社会扭曲了善良本性的女人。

莫莉·斯泰纳是一位出生于乌克兰的俄罗斯少女，她因散发反对武装干涉俄国的传单而被判15年监禁的重刑。她出身于工人家庭，家里非常贫困。狱中的苦难生活没有磨灭她的意志，也不能动摇她的信仰。她在牢房的墙上贴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约翰·里德的照片，在石墙的上方，用红色的印刷体字母写了一条标语：“社会主义革命万岁！”莫莉在法庭上向检察官描绘她一直向往着的世界：“那将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下，不会发生一个集团统治其他任何集团的现象。人人都有平

等的发展权利。任何人都不能依靠剥削别人的劳动成果生活，每个人都必须各尽所能，而分享他需要的一份。他将有时间掌握知识和文化……而我们全世界的工人将以人类的同胞情谊结成一个整体。为了实现这样一种秩序，我已保证：奋斗终生。”检察官以嘲讽的口吻问道：“世界上有你所说的那种地方吗？”莫莉答道：“我相信那些代表俄国的人，是由工人而且完全是由工人选出来的。在布尔什维克的政府里，没有寄生虫的代表。”莫莉在狱中以自己不屈不挠的意志鼓舞了史沫特莱，直到几十年以后，史沫特莱还时时想起她。

第四位女难友凯蒂·马里昂的遭遇更富于戏剧性。她是一位职员，节制生育运动的死心塌地的支持者。有一天，一位叫布兰伯格的先生来到她的办公室，向她诉说贫穷和多子的烦恼，害怕再增加人口。凯蒂给了他一份节制生育的资料。这一下可就闯祸了，想不到此人是臭名昭著的所谓“风化维护协会”派来骗取凯蒂从事“有伤风化”的节育工作的“罪证”的。凯蒂被判监禁30天。在监狱里，凯蒂被罚洗地板，每天提着水桶在过道里来来往往，见到任何人，包括女看守和女囚徒，都用这样一句话打招呼：“为节制生育三呼万岁！”囚徒们也答道：“为节制生育三呼万岁！”离开监狱的时候，凯蒂说，她进来时不过是一颗火星，而现在出去时，已燃成了一簇熊熊的烈火。后来，她成了玛格丽特·桑格夫人倡导的节制生育运动的一员主要干将。

史沫特莱遭逢意外变故，无法支持弟弟萨姆上学，萨姆无可奈何，决定去当兵。在被派往欧洲战场时路过纽约，他来到托姆斯监狱，请求让他见姐姐一面。监狱官员一口拒绝，大声呵斥道：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个卖国贼，而你，一个为国家去打仗的战士，你绝对不可能见她！”

萨姆蹲在托姆斯监狱门口，悲伤地放声大哭，他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姐姐。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史沫特莱，她听了，两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用力地咬着嘴唇，仍然没有控制住眼泪。

《纽约时报》在史沫特莱被捕的第二天报道了这个消息：“昨天当局逮捕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小姐，得到了关于印度反对英国统治的一个叛乱阴谋的重要证据。”据报道，高斯是“主谋”。报道最后说：“希尔德警长向史沫特莱小姐建议，她要是揭露阴谋就能帮助自己的国家，她拒绝了。她拒绝提供情报以换取宽大处理。”她的罪名是：试图煽动印度反英叛乱，以帮助英国和美国共同的敌人德国；还有一项罪名是违反了不许扩散节制生育知识的法令。鉴于列宁的苏俄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史沫特莱这个所谓“德国间谍”就有了保释出狱的可能，但要交纳保释金一万美元。

节育主义者玛格丽特·桑格赶来为史沫特莱辩护，惟一神教派牧师霍姆斯牵头为她募集保释金，史沫特莱离了婚的丈夫、她的终身好友厄恩斯特·布伦丁当时正在向埃莉诺求婚，也放下自己的事情去为史沫特莱奔走。1918年夏天，史沫特莱终于被保释出狱。

这时候的史沫特莱，用她自己在《大地的女儿》中的话说，是一个单纯的，渴望在正义的斗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年轻人。一个美国青年，却以印度民族解放斗争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怕艰难险阻，甚至不怕坐牢，这是多么感人的热情和勇气。多少年后，史沫特莱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依托，把一颗火热的心交给了中国人民，也正是她在为印度人民的解放斗争中诱发出来的自觉。因为她觉得，在血和泪中痛苦挣扎的

亚洲人民是她的父母兄弟，也是她自己。

史沫特莱的坐牢使她在纽约的自由主义的左的社团里成为知名人物，也使她有了成为一名真正的新闻记者的机会。首先是玛格丽特·桑格聘请她负责《节育评论》的日常管理工作，然后又在社会党的机关报《号角》当上了一名新闻记者。为了当一个出色的记者，史沫特莱以着力揭露社会黑幕的厄普顿·辛克莱、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和以雄辩著称的政论家埃玛·戈德曼为榜样，努力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把笔杆子当作向强权和黑暗势力作斗争的武器。

史沫特莱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渴望了解俄国革命的进程，她的一位朋友帮助她达到了这个目的，这位朋友就是著名的记者和漫画家罗伯特·迈勒。迈勒跟史沫特莱一样出身于中西部劳动阶级家庭，在纽约的记者群中，这种出身的人是很少的。罗伯特·迈勒自称无政府主义者。1919年初，他作为《号角》的特派记者进驻莫斯科，亲自去观察和评价俄国革命。几个月以后，罗伯特·迈勒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无政府主义立场有了转变，他开始赞成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认为为了对付外国的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颠覆阴谋，实行暴力专政是完全必要的。迈勒发回纽约的每一篇报道史沫特莱都认真研读，这些报道为史沫特莱打开了一扇通向新世界的窗子。

可是这时候在美国，威尔逊总统在战时许下的种种诺言都成了泡影，国内通货膨胀，失业率急剧上升。1919年1月21日，发生了美国工人运动史上影响重大的西雅图船厂工人罢工，3.5万名西雅图造船厂工人为争取缩短工时和提高工资举行了罢工。2月6日，当地工会组织了6万工人声援罢工，使经济生活陷于瘫痪。报道罢工的刊物被官方视为从事“非美”活动，进步记者受到迫害。史沫特莱非常愤慨，在给《号角》写文章时，她学会了列举证据，使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令人信服，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写文章总是把自己放进去，从不试图表现得“客观”和“中立”。这是史沫特莱新闻报道的一个大特点。20年代以后，新闻报道开始强调客观，强调只让事实说话的时候，史沫特莱仍然坚持这种带主观感情色彩的独特风格。

1919年1月，华盛顿州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一切战争时期被关押的印度人统统直接驱逐回印度。移民总局局长卡米纳塔否认驱逐是由于政治原因，他自欺欺人地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被驱逐是因为他们神经有毛病或者道德堕落”。史沫特莱和她的朋友们很清楚，把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驱逐回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这意味着什么。他们迅速地发起了反击，史沫特莱组织了“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由支持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芝加哥大学英语教授罗伯特·洛维特任主席，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任秘书。他们为受到驱逐威胁的印度人组织辩护，争取美国知识分子和劳工团体的支持。当时即将被驱逐的移民集中在艾利斯岛，等待出境。史沫特莱扮作移民，来到岛上深入实地采访。以后她在《号角》上发表了一篇感情充沛的报道，指出印度人民在大战中为英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印度经常闹饥荒。她收集了大量的数字和事实，充分地阐述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文章有很强的说服力和震撼力。由于史沫特莱和她的朋友们的努力，与史沫特莱同时被捕入狱的卡达尔党领导人塔拉克纳斯·达斯终于获得释放。1919年10月29日，在纽约十七大街三马路的阿莱尔餐厅，印度自由之友协会举行宴会，庆祝斗争的胜利。

也是在 1919 年，社会党内部发生了分化，它的左翼公开宣告世界正处在危机之中，资本主义制度的分崩离析过程已经开始。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却声明它的信仰是用民主的、渐进的方式达到党在国内的目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宣布开除号召立即发动全国革命的左翼。9 月间，被开除的左翼分成两派：一派是由约翰·里德、本杰明·吉特洛和威廉·B·劳埃德领导的共产主义劳工党；另一派是以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的美国共产党。两个左翼派别都邀请史沫特莱参加，但她都拒绝了，她继续为《号角》工作。她欢迎俄国十月革命，她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更可能给贫苦的劳动阶级、妇女和少数民族提供均等的机会。她向往俄国革命，希望能有机会亲自到俄国去看一看。

1916 年到 1919 年这三年，是史沫特莱在政治上从幼稚到逐渐成熟的三年；这三年，她写了很多内容新颖、富有创见的文章，也是她在写作上技巧逐渐成熟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的三年。

第四章 爱之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各国普遍受到革命浪潮的冲击，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在各国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活动更加频繁。达斯和印度自由之友的其他领导人都希望能够派一名成员去欧洲，主要是去德国，以便与柏林的印度民族主义积极分子取得联系。他们还打算派一个代表团去参加 1921 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最高级会议。大家都认为，史沫特莱是最合适的人选。史沫特莱也很高兴有机会去亲身感受一下欧洲的革命，这完全是出于一个新闻记者和作家对世界的关注和责任感。

在两年前那一宗所谓的间谍案中，史沫特莱和达斯虽然获得了保释，但美国官方对他们两人的起诉并没有撤销。在这样的情况下，史沫特莱不可能得到出国护照。她决定想办法不要护照出国。

1919 年岁暮的一天，史沫特莱在纽约的码头上徘徊，她的心早已飞向烟波弥漫的大洋彼岸。欧洲是她童年时代憧憬着的童话王国，那里现在正发生着对一个新闻记者有着强烈吸引力的事件。这时，一艘停泊在码头上的行驶美国——波兰航线的货船正在招募女招待，史沫特莱加入了长长的应聘者的行列，结果她被雇用了。1920 年初，她登上了这艘前往波兰的货船。史沫特莱在船上一直工作到 12 月，才找到机会在波兰格丹斯克跳下货船上了岸，兴奋地踏上了欧洲的土地。她的随身物品只有一架手提式打字机和一个公文皮包。没有护照和签证，她被波兰海关扣留了。史沫特莱打电报给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求助，委员会的领导维连德拉纳什·查托帕迪亚雅马上跟德国外交部联系，史沫特莱获准通过波兰国土，顺利到达柏林。

战败的德国经历了 1919 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导致威廉皇帝退位和魏玛共和国的建立，以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首的革命左派遭到残酷的镇压。德国劳动人民在贫困和绝望中挣扎，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工人的工资不及战前的一半。为了得到不足以果腹的土豆和一块小小的猪油，人们不得不在刺骨的寒风中从早到晚排队等待。史沫特莱亲眼看见过倒卧街头的饿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开始抬头，他们高叫着“国家社会主义”的骗人口号，利用人民的贫困和对战胜国的憎恨，迅速发展着自己的势力。

柏林作为欧洲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已有十年之久。大战期间，柏林的印度革命委员会曾经与德国外交部紧密合作，秘密策划以暴力推翻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在战后的动荡年代，德国政府至少在表面上仍对印度革命委员会持保护态度，而实际上委员会已处于半地下状态。史沫特莱在纽约时已经是一位很有名气的成功的组织者和宣传者，很快她就被吸收入会，成为柏林印度民族主义者队伍中的一名主要成员。

然而，面对着柏林的种种现实，面对着陌生的人和陌生的环境，史沫特莱感到孤独寂寞。她对德语一窍不通，不能随意与周围的人交谈，使她产生了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她怀念在纽约的朋友们，特别是亲密的女友弗洛伦斯·伦农。史沫特莱出狱以后找不到房子住，弗洛伦斯不怕警察特务找麻烦，邀史沫特莱与自己同住，史沫特莱很感激，一直保持着和她的亲密友谊。史沫特莱在给弗洛伦斯的信中幽默地说：“我正在学德语，我能说‘我有一条狗’，这是一个星期的进步。”

孤独寂寞的史沫特莱爱上了维连德拉纳什·查托帕迪亚雅。查托生于 1880 年，比史沫特莱大 12 岁。他出生于孟加拉名门望族，早年在印度受完

基础教育，就到伦敦去学习法律。在伦敦，他成为处于萌芽状态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因而被学校开除。为了逃避英国官方的搜捕，他移居巴黎，流亡欧洲各国，最后来到柏林，成为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他是个卓越的印度爱国者、有经验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无论从哪方面说，他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印度民族主义者中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查托”。

20多年后，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这本书中这样回忆查托：

他头脑敏锐，性格刚毅果断，对敌人像骑士的军刀般冷酷无情。他脸色黧黑，身材瘦癯，一头浓浓的黑发，两鬓斑白。他的脸部表情威严可畏……在我眼里他像迅雷、闪电、暴雨。无论他侨居在欧洲还是在英国，他给英国人的印象差不多总是那样的：他对于那些征服他的祖国的岛上人仇深似海，难以探测。

查托的形象在史沫特莱心中闪闪发光。28岁的史沫特莱依然以少女般纯真的心去感受爱情：只有一个在事业、教养和毅力等方面都能够成为她心中的偶像的男人，才能点燃她心中的爱火；查托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史沫特莱全身心地投入这忘我的爱情之中，查托成了史沫特莱感情生活的中心。她对自己说，如果他有危险，我想我会赤着脚走遍天涯海角去救助他的。

史沫特莱和查托深深地陷于热恋之中，很快就生活在一起了。查托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娶过一位英国妻子，流亡欧洲时在1912年离了婚，后来又娶了一位有钱的爱尔兰姑娘，她现在待在英国一个修道院里，当了一名修女。史沫特莱也是个结过婚的人。过去的经历并没有妨碍他们，反而帮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爱情。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现在世界上仿佛只有他们俩，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只有他们俩才是真正志同道合的伴侣。

史沫特莱和查托在一起过着革命流亡者的艰难的日子。为了生活，史沫特莱当了柏林大学英语研究室的教员，还在印度史研究室授课。此外，一个星期还要当三个晚上的家庭教师，教授英语，忙得不亦乐乎。在家里，她还要克尽为妻子的责任，照料好查托的生活，好让他有充沛的精力为印度民族解放事业奔忙。史沫特莱喜欢整洁，总是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她还学会了做印度菜，虽然做得不太地道，但查托吃得开心极了。尽管工作复杂，家务繁重，史沫特莱在这段时间里还发表了许多篇有关印度历史和妇女问题的论文。爱情使史沫特莱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力量。

在倾向社会主义的查托的影响下，史沫特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了，对德意志民族和印度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有了系统的了解。她与一位著名的进步女版画家成了好朋友，这就是凯绥·珂勒惠支，后来史沫特莱把她的作品介绍给鲁迅，鲁迅又热情地把她的作品介绍给斗争中的中国人民。史沫特莱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初次会见也是在柏林时代，以后她和尼赫鲁的友谊一直长时间地保持着。这时的史沫特莱，已经悟出了西方工人运动与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她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更广大的东方，转向受压迫的东方大国——中国。她开始研究中国历史，这是她日后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基础。

1921年3月下旬，查托带领14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其他印度人士以及第三国际代表讨论印度民族运动的方向问题。史沫特莱也是代表团的成员。

当时，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正处于极端艰难的时期，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和西方国家的武装干涉使苏维埃俄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史沫特莱在莫斯科街头看到一群群的流浪儿童在闲逛，人民的苦难使史沫特莱感到痛心。她说，这里人们的生活已经下降到最低水平，要是再往下降，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史沫特莱虽然在理论上承认无产阶级政权在巩固阶段实行暴力专政的必要性，但一接触到现实，尤其是得知她的朋友，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在苏俄受到软禁，她的认识就发生了动摇。她给弗洛伦斯·伦农写信说：

监狱里挤满了革命中战斗过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之所以没有被关进监狱，仅仅由于他们是国际上知名的人士，但是他们也被软禁起来了……如果我被驱逐出境，被监禁起来或者发生其他事故，我在这里会吵得他们六神不安。

史沫特莱确实是个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干的人，她特意去看望了被软禁的埃玛·戈德曼，这样做需要有不顾自身安危的勇气。戈德曼对此十分感激，她们之间建立起了更加深厚的友谊。

代表团的工作进行得不顺利。他们一到莫斯科车站，就遇见了刚刚在塔什干成立的印度共产党的领袖 M.N. 罗伊和阿巴尼·慕克吉。两个代表团政见不同，在会议席上各不相让。他们意见分歧的实质在于优先考虑哪一个问题：是反英斗争呢，还是在印度掀起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呢？查托的印度革命委员会代表团赞成前者，他们要求把一切反帝组织，不论是共产党的还是非共产党的，结成统一战线向统治印度的英国殖民主义展开斗争。柏林来的代表都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第三国际的成员，他们要求首先为印度争取民族独立，他们愿意与其他人士共同努力以达到这个崇高的目的。但是罗伊雄辩地反驳了这种统一战线观点，他认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必须牢牢地掌握在目前尚在襁褓中的印度共产党手中，他强调要把印度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以确保民族运动的社会主义方向。罗伊提交了一篇斥责殖民主义的著名论文，深受列宁同志的赏识。

史沫特莱和查托回到柏林，德国政府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开始进行把他们驱逐出境的活动。他们虽然最终没有被驱逐，但成了非法居留者，被迫过着非常艰难而又充满危险的流亡生活。德国警务人员和英国特务追踪盯梢，随时随地找他们的麻烦。为了进行反击，他们俩和他们的同志们搞起了一个叫印度情报局的组织，希望通过这个机构加速印度独立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为了筹办这个情报局，查托变卖家产，把稍微像样一些的家具都卖掉了。

警务人员经常闯进查托和史沫特莱的家，翻箱倒柜，胡乱折腾。他们只好带着随身行李到处搬迁，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家了，白天不知道晚上会在什么地方过夜，往往是在情报局里工作到深夜，然后出去随便找一间便宜的旅馆住下。英国特工人员直接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公开警告查托“当心点”！随时有可能发生种种可怕的事情。

有一次，英国特工人员用药麻醉了查托，然后把他塞进汽车行李箱，打算把他送出德国国境。幸亏有个机灵的边界警卫员发现，这个阴谋才没有得逞。

还有一次，史沫特莱、查托和几个朋友在一家伊斯兰餐厅里喝巧克力饮料。喝完不一会儿，查托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醒过来以后，呕吐不止，

请来看病的内科医生说这是砒霜中毒。

颠沛流离，惊恐万状的生活损害了史沫特莱的健康，她精疲力竭，得了风湿性的心脏病，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出院回了家，又每时每刻都处于英国特务的跟踪监视之中。

最使史沫特莱情绪沮丧的是她和查托的婚姻出现了裂痕；这裂痕越来越深，达到了无法弥合的地步。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要真正地相互融合，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查托不仅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家族也是社会地位显赫，家族的成员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查托是印度孟加拉具有高贵血统的婆罗门望族书香门第的长子，他的父亲阿贡拉纳什·查托帕迪亚雅是海得拉巴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当过海得拉巴大学的校长，被英国政府强令退休并遭到软禁，19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去世了。查托的大妹妹萨罗吉尼·奈都夫人是个女诗人、政治家，是印度国大党的重要人物，50年代曾担任过西孟加拉总督。弟弟希兰德拉纳什既是诗人，又是演员，还是著名的电影导演和剧作家，活到本世纪80年代才离世。出身在这样一个人才辈出、赫赫有名的婆罗门世家，受过完整的传统教育，能说几国语言的查托，很为自己的出身和家庭自豪，他热爱祖国，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甚至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但是在他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深层，传统的婆罗门贵族观念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查托的家族包括他自己，最终肯定无法接受史沫特莱这样一个出身于美国默默无闻的劳动者家庭的女人。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这部作品里曾经这样分析她和查托的关系：

我和查托共同生活的开始，就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化的结合。我是一个美国劳动妇女，不正常的商业文明的产儿。他是一个印度望族的子弟，具有玄奥、高雅的婆罗门思想，再加上英国的古典正统教育。虽然他恨英国的一切，但更鄙视以金钱衡量一切事物的美国资本主义。他的思想是现代的，但他的感情却深深扎根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之中。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爱情在这种冲突面前也变得无能为力。他们都陷于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无力自拔。他们有共同的革命理想，愿意以共同的事业而不是以生儿育女作为家庭生活的基础，贫困的生活和险恶的环境都不能磨灭他们的爱情的光彩；但是归根结底查托仍然要按照东方传统的家庭观和妇女观的准则去衡量史沫特莱，要求她像传统的东方妇女一样具有驯顺、贞洁的品质，而这正是史沫特莱所不具备的。他不能容忍他的妻子在跟他结合以前跟别的男人有过性关系，至于他自己结过两次婚，也有过情人，按照东方传统观念，这是不需要计较的。印度民族主义团体中的成员都是男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查托的观点完全一致。于是就有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制造一些流言蜚语，说史沫特莱在纽约时男朋友众多，难免跟其中某些人上过床。查托很生气，就用“别的男人不要的剩余物资”这样的话来侮辱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反唇相讥：你不也是别的女人不要的剩余物资吗？况且查托和他那位爱尔兰妻子并没有正式离婚。后来史沫特莱在上海知道了“姨太太”这个词，回想起和查托在一起的生活，自嘲说，当时我不过是充当了一个“姨太太”的角色。

查托认为，公开向他的家庭和上层社会的朋友承认有这样一位妻子是

一种耻辱，有损他的家族荣誉和他自己作为印度革命委员会领导人的尊严。有一次，几位著名的印度人士来到柏林，查托约好了去会见他们。而就在同一天晚上，史沫特莱和几位美国朋友约好了到剧院去看演出。史沫特莱感到很抱歉，征得查托的同意后，史沫特莱就到歌剧院去了。当戏的第一场演了一半时，史沫特莱感到坐不安稳，总觉得她应该陪同丈夫去会见客人。她走出了歌剧院，匆忙赶到查托和朋友会见的旅馆，愉快地微笑着出现在查托面前，哪里料到她的到来使查托万分尴尬。他恼火地一下子把她拖出门外，说：“你瞧，你干吗到这里来？难道你不知道你这样做会使我的地位不堪设想？我不能把你介绍给那些人——他们都认识我的家族，我怎么能够把你介绍给他们呢？”

史沫特莱听了目瞪口呆，大为震惊，问道：

“你的家族？那你究竟为什么不能把我介绍给那些认识你的家族的人呢？”

“啊，这是办不到的，你一定得马上离开这里！”

史沫特莱回头一看，见到所有这些印度人都惊讶地望着她，似乎把她当作一个下流女人。

史沫特莱在夜晚的柏林街头徘徊了几个小时后，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悲伤。

在所有旅居欧洲的印度人眼里，查托是一位才华出众很有威望的长者，家里经常人来人往，流亡欧洲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往往是一下了火车就直接投奔查托而来，有些还是很年轻的学生。史沫特莱触动了母性心肠，对他们充满了同情，不遗余力地照料他们的吃住。但长此以往，经济上和体力上都不胜重负，她外出授课和做家庭教师的收入已经不敷支出，她不得不到处借钱，最后到了债台高筑的地步，只好挤出时间写点东西挣钱。三年来，她就是这样默默地支撑着这个家。

但是尽管这样，她还要承担一切家务：做饭、洗碗碟、擦地板、洗衣服、熨衣服，一声不响地为丈夫和到家里来的一切印度人做着这一切。按照印度的风俗，吃饭时必须让男人先吃饱，女人只能吃男人剩下的饭菜。他们夫妻俩吃饭时是不是按这种风俗办，不得而知，不过每到开饭的时候，总会有两三个突然来到的客人，那么史沫特莱就只好日复一日地牺牲自己的那份食物。而这些印度客人并非全是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同志，有不少只是来做生意的，查托一视同仁地款待他们。这种封建的生活方式终于激起了史沫特莱的愤怒，她在给她的朋友、丹麦女作家卡琳·米凯利斯的信中写道：

我把一生献给了印度，但我却不得不为商人做饭，而且我还得坐在旁边听他们高谈阔论，说什么欧洲的女人全是娼妓。而且，从清早到深夜我得应门铃，接电话，那是催我丈夫还钱的人打来的电话——我丈夫从未借过这些钱，是别的印度人借的，可是他同意代他们还债，因为他说，这与印度的荣誉有关。事实上一笔一笔的债都得由我去还清。该死的印度荣誉！

史沫特莱终于经受不住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重负，她病倒了，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晚上她整夜整夜地失眠，得服用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白天整天情绪沮丧，目光呆滞，似乎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为了挽救自己，她决定离开查托，即使只离开一段时间也好。1923年夏天，她得到女友莉拉·辛格的帮助，到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脉去住了两个月。到了9月，史沫特

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基本恢复了正常，她回到了柏林。

史沫特莱的出走使查托害怕了，他怕她会离开他。她一回来，他就把她紧紧地缠着不放，说没有他就无法生活，无法继续从事印度独立的工作。史沫特莱说不知道自己还爱不爱他，但事实上查托还是占据着她的心，她想用时间来医治内心的创伤。查托向她发誓，放弃要求她服从东方习俗的权力，恳求史沫特莱重新跟他生活在一起。她虽然明知道跟他在一起将会很痛苦，但还是答应了他的恳求。

史沫特莱决定继续留在柏林是因为她打算申请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她向往学习，想使自己真正地登上文化的巅峰，这个心愿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她的申请没有获得准许，因为她无法提供在美国学校念书的成绩单。她写信回纽约，请朋友们帮助她弄到成绩单寄来。她和查托说好，如果明年春天进不了柏林大学，她就要回美国去。她已经 31 岁了，但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无知的、没有教养的、不成熟的动物”，她迫切地希望有机会继续学习。

她和查托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家，过的还是原来那样的日子。史沫特莱的情绪又抑郁起来，健康情况又开始每况愈下，终于又完全病倒了。她的病情一天天地发展，已经严重到出现神经性发作的症状。当病发作的时候，她丧失了对自己身心的控制能力，她浑身哆嗦，跌倒在地。她整夜失眠，服用的安眠药剂量越来越大，药性越来越烈。但只要身体稍微可以支持，她仍然坚持写作。史沫特莱自身婚姻的不幸遭遇使她对妇女问题产生了更加激进的看法。她认为，妇女虽然在自然属性，例如体力方面不能取代男性，但在社会属性方面，妇女不应该是低能的。是男性扭曲了自然的面貌，使妇女一直被处于与她的天性不协调的地位上；但她又不得不安于这种地位，因为惟有这样才能满足男人的虚荣心。

她在给弗洛伦斯·伦农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不明白为什么妇女就不该成长起来，发展与她的天性相适应的一切才能，至于发挥什么样的才能，那是无所谓的……我不愿意接受人们现在对妇女地位或男人地位所提出的社会准则，因为我不认为今天的社会对男人或女人或阶级的看法是合理的、正常的。在性别上有差别的自然面前我低头承认，但是在建筑于统治阶级妄想掌权的基础上的社会制度面前，我决不低头。这个制度从家庭与学校开始，错用了生命的源泉。在这种制度下，成千的妇女受到挫折，被迫哑口无言，她们的才智从来得不到发展；但是假设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她们的天性会促使她们充分地发展她们的聪明才智。

……我确实恨的是男人，尤其是那种男人，认为一个女人必须有一群孩子围着她的裙子转，否则这个女人就该永远永远受到诅咒……今天太多的妇女只是无目的地生孩子。我的思维方式认为生孩子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只有当你明确了生命的意义以及为什么你要产生一条新生命以后，你才能生孩子……

史沫特莱对婚姻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她认为当婚姻约束了妇女的社会属性，并且使她们的自然属性也遭到扭曲的时候，这种婚姻是毫无意义的。她相信人类将来的发展一定会导致妇女自身的完善，使她们的聪明才智能够充分发挥。她把这些观点写成论文发表，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的。

德国的朋友们劝史沫特莱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给她介绍了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是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内夫的中年女医生，弗洛伊德学说的正统派。

纽约的朋友们也纷纷寄钱，资助她的治疗。而查托却把精神分析嘲笑为传教士的说教和巫术迷信。史沫特莱觉得已经走投无路，就在1923年底开始接受内夫医生的分析治疗。

内夫医生每周两次与史沫特莱作长时间的谈话，从她童年时代的生活经历，追溯她心理性格的形成和思维方式的发展，分析生活环境的影响如何使她产生心理上和生理上的病态，帮助她寻找造成疾病的心理根源。当然同时也配合一定的药物治疗。这一切都是根据一套完整的科学的治疗程序进行的，目的是帮助病人恢复自我肯定，重新树立起自己的正面形象。史沫特莱在内夫医生的帮助下逐渐恢复了心理健康，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

朋友们都来帮助史沫特莱。埃玛·戈德曼为她搞到了一张请柬，邀请她在1924年2月份到柏林大学英语系作一次演讲，内容是关于甘地的思想。查托反对她去演讲，他骂史沫特莱是个白痴，居然想登上大学讲坛。实际上他反对的倒不是演讲这件事本身，而是这次演讲的内容。因为她讲的是印度，他不能容忍不是出自他本人的任何关于印度的言论。内夫医生出面保护史沫特莱，她去找查托谈了两个小时，跟他说，如果他真想史沫特莱康复，就不要横加干涉，因为参加社会活动有利于她的健康。

演讲很成功。她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学生们注视着她。贪婪地听取她讲的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她面对所有的听众，丝毫没有畏缩情绪，跟当年年轻的史沫特莱站在汽车挡泥板上向工人群众宣传反战的情况大不相同了。查托也去听了她的演讲，尽管他吹毛求疵，还是不得不承认她讲得好。

史沫特莱与查托在一起感到情绪压抑，心情紧张，他们的婚姻生活已经到了难以挽救的地步。史沫特莱心里想：为了他的祖国，为了他的事业，我可以去死，但和他在一起生活是再也不可能了。她决定第二次逃离查托，独自搬到一个朋友家，住在女仆的房间里，那是一个只能摆下一张床和一把椅子的窄小的房间。查托追寻而至，恳求史沫特莱回家，继续留在他身边。由于疲劳和激动，查托说着说着竟晕了过去。史沫特莱的心又软了下来，充满了对他的怜爱。史沫特莱把他送回家。查托病了两个星期，史沫特莱日日夜夜守在他的床前，他们又在一起过起日子来。

1925年夏天，史沫特莱在一位女友的陪同下，离开柏林来到捷克斯洛伐克。史沫特莱再次出走，又把查托急坏了，他到处求助，希望把史沫特莱找回来。在史沫特莱感情生活一波三折的这段日子里，有一位年轻的印度大学生巴卡尔热烈地崇拜她，疯狂地追求她。他比史沫特莱小八岁，史沫特莱称他为“我的儿子”。现在查托找到了巴卡尔，请他帮忙把史沫特莱找回来。巴卡尔照办了，但史沫特莱不答应再与查托见面。

一个多月以后，史沫特莱接受丹麦女作家卡琳·米凯利斯的邀请来到丹麦的一个名叫楚尔的孤独的小岛上，打算在这里继续完成她的第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史沫特莱在给玛格丽特·桑格的信中谈到自己对这部作品的构想：

这部书将以我的生活经历为基础，我打算把它写成一部坦率而真实的纪实小说。这部书将会使我失去许多朋友，因为当他们读了这本书后，会以有我这样的友人而感到羞耻……我有必要以最大胆的方式来写这部书，因为我的健康是靠不住的，加上我的心灵受过很大的摧残，以致我从来不知道我究竟能做些什么……我的这部书的书名是《流浪者》或《一个流浪者》，我自己还不知道呢……我对这部书的成功几乎是有把握的，……卡琳说这部书将会是一部了不起的畅销书。

史沫特莱的这部纪实性自传体小说最后定名为《大地的女儿》，在 1929 年出版。

关于查托，史沫特莱后来写信给埃玛·戈德曼说：

我心里充满着怜悯。如果我愿意回去跟他一起生活，或者甚至只是告诉我打算这样做，我就能抹掉他的这副可怜相，使他恢复精力。但是我做不到……我知道如果回到他身边，在一个月之内，我会把自己杀死的……

第五章 锻造

1925年12月，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带着快要完成的《大地的女儿》的初稿回到柏林，她打算很快把书修改润色完毕，在德国或者美国找个出版社，只要书一出版，她就可以享受经济独立的生活了。可是，她马上发现，当前的谋生问题压倒一切，她不得不暂时放下书稿，重新回到柏林大学教英语，晚上继续当家庭教师。

名演员蒂娜·迪里厄请史沫特莱到家里教英语，使史沫特莱的生活出现了一段戏剧性的转折。

蒂娜·迪里厄原名奥迪莉·戈德弗鲁瓦，是一位大学教授的女儿，因为成功地扮演了蒂娜·迪里厄这个角色，别人都用这个名字称呼她，她就把这个名字当作自己的艺名。迪里厄比史沫特莱年长，本世纪初已经演过许多话剧名著，扮演过奥斯卡·王尔德的《莎乐美》的女主角。萧伯纳的《卖花女》在德国上演时，迪里厄扮演女主角伊莱扎·杜利特尔。她已经度过了20多年的舞台生涯。

迪里厄一见到史沫特莱，仅凭直觉就明白她跟自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还从来没有一个衣着朴素得近于土气、语言直率得近于粗鲁、眼光锐利得近于不友善的人到她这豪华的宅第里来过。史沫特莱使蒂娜·迪里厄想起了她扮演过的卖花女伊莱扎。伊莱扎是一个贫穷的、没有读过书的、言语粗鲁俚俗的农家姑娘，语言学家希金斯教授用她作试验，在六个月内改变了她的言语和风度，使她变得像一个雍容优雅的豪门小姐。蒂娜·迪里厄发现生活中的伊莱扎来到了她的面前，这就是史沫特莱，而她自己就是希金斯教授。她产生了一个浪漫的想法，要帮助史沫特莱进入上层社会。但很快她又发现史沫特莱跟伊莱扎并不完全一样，史沫特莱是一个才华横溢、意志坚强的人，她需要帮助，也值得帮助。

红遍欧洲的名演员蒂娜·迪里厄有一副热心肠，她知道史沫特莱需要一段不受干扰的时间去完成她的作品，她愿意给史沫特莱一个机会，两人一起到萨尔茨堡住上两个月，让史沫特莱潜心写作。这是1926年7、8月间的事情。

在萨尔茨堡，迪里厄带着史沫特莱住进了豪华的旅馆，在文人和演员的沙龙里把史沫特莱介绍给社交界。史沫特莱从柏林破败的阁楼来到欧洲第一流的旅馆，禁不住思绪万千。看到衣着讲究、满面红光的贵妇人，她想起了瘦弱不堪、疾病缠身的母亲，看到那些活泼漂亮、营养充足的儿童，她想起了自己贫困的童年，想起了科罗拉多矿区小镇街头饥饿肮脏的孩子。她第一次思考“阶级”这个概念，明白了这个世界是由截然不同的对立阶级组合而成的。在给纽约的弗洛伦斯·伦农的信中她第一次提到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

……然后我在门厅里四下环视，我见到的都是些机灵的、营养充足的富人，抽着雪茄烟，请人喝酒，付钱时摆出一副金钱对他们是无所谓的态度。于是我想起他们怎样掠夺搜刮生活中的美好东西，据为己有，而且绞尽脑汁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辩护。我知道他们都在某处有着大笔的银行存款——他们的钱多得一辈子也用不完……我也明白他们的每一个马克意味着牺牲了某个地方某个工人的婴儿。然后，我听他们谈论“无政府”以及“布尔什维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危险”。当我坐在那里听他们谈论时，我怀疑他们有没有丝毫人

性——我真的拿不准他们有没有人类的属性……我渴望有这么一天的到来，那时候工人阶级的高度觉悟足以把整个世界震撼得粉碎，并把这里富人淹死在他们自己的鲜血洪流中。

我很高兴来到了这里，我并没有像我想像的那样受到腐蚀。这仅仅使我面对面地见到了存在于人世间的可怕的不公正现象——人对人的残忍行为：他们用铁石心肠对待像狗一样活着的人们。

迪里厄夫人主动提出资助史沫特莱一笔钱。让她进柏林大学读书，一直到获得博士学位为止。这对史沫特莱的吸引力太大了。她过去读书，都必须同时工作，以做工所得支付学费，现在有了专心学习的机会，这正是史沫特莱梦寐以求的事情；虽然心里有一种依赖感使她很不舒服，但她仍然无法抗拒。

但是，富人阶级对史沫特莱的“改造”并没有成功，她还是那么本色，那么直言不讳，锋芒毕露，桀骜不驯，从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史沫特莱在上流社交界的“表演”并不像蒂娜·迪里厄夫人扮演伊莱扎那么成功。

这期间发生了两件有趣的事情：

柏林动物园从国外弄来了几个畸形人，在动物园里展出，据说以后还要到欧洲各国去巡回展览。以文明人自居的富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史沫特莱却抑制不住心里的怒火，她写了一系列文章，尖锐地抨击了这种不人道的现象。文章在报上连续发表，“展览”只好尴尬地收场了。

另一次是在祝贺蒂娜·迪里厄在魏德金德的戏剧《弗朗采斯卡》中演出成功的宴会上，史沫特莱和一位不认识的英国绅士闲谈，扯到婚姻问题和性问题的时侯，英国绅士说：

“这方面，从来就没有什么进展，以后也不会有进展的。”

“您使我想起了猴子的故事。”史沫特莱毫不客气地讥讽道，“猴子一定注意到了尼安得特人站直了走路。毫无疑问，猴子认为站直了走路是不自然的，它认为在走路的问题上，过去没有什么进展，将来也决不会有进展的。”

史沫特莱讲完，才想到问一问英国绅士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在大使馆工作，我是……英国大使。”

史沫特莱沉默了片刻，接着就旁若无人地哈哈大笑起来。

1927年，德国的政治生活走向危机，法西斯主义势力正在膨胀，而德国共产党也在不断地发展。史沫特莱同情共产党人，但认为自己绝对不会参加德国共产党。她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她与德国共产党的观点有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

德国共产党人单纯地把工人阶级看作充满忘我精神的革命理想主义者，认为一旦革命成功，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问题马上就会解决。史沫特莱认为这是不了解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愚蠢的见解。她根据自己在美国中西部的生活经历，知道工人阶级并非都是天生的革命者，他们要走向革命，要经过一段十分艰难曲折的认识发展过程。她也不相信革命一旦成功工人阶级马上就能结束原有的贫穷、落后、无知的状态，她相信消除教育水平低下和经济贫困所遗留下来的创伤的过程是漫长而又艰巨的，其中涉及到心理上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研究工人的心理。

第二是妇女解放问题。史沫特莱不相信一旦革命成功妇女就马上能够获得解放。她认为劳动妇女的苦难不仅来源于阶级压迫，也来源于性别歧视。丈夫把妻子当作私有财产、性奴隶和生育工具的对象，即使在工人阶级内部

也很普遍。史沫特莱甚至毫无顾忌地写道：男人只是把女人当作泄欲的工具，即使在过性生活的时候，也是只顾自己的满足，不顾妻子的需要。她主张节制生育，劳动妇女用“生育罢工”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史沫特莱直言不讳地在公众集会中陈述自己的观点，充满自信地表白自己的独到见解。这时候的史沫特莱，已经是一位有社会影响力的作家、记者和日趋成熟的革命者了。

1927年2月，在欧洲成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反帝大同盟。以查托为首的几个人周密计划了一年，订于1927年2月在布鲁塞尔召开成立大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非共产党的国际知名人士参加，他们是：伯特兰·罗素、艾伯特·爱因斯坦、亨利·巴比塞、罗曼·罗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们出席了成立大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

反帝大同盟计划在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运动方面采取统一立场，反对以维持殖民主义现状为宗旨的国际联盟。布鲁塞尔大会开得很成功，会后发表了宣言，其内容集中阐述了两个问题：为了民族独立而在殖民地内部展开的斗争正日益高涨，预言帝国主义国家将发动战争以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西方的工业和矿业已逐渐转移到殖民地，因此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必须采取一致行动，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会议期间，尼赫鲁会见了查托和史沫特莱。尼赫鲁是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总书记，他对国外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对他们无疑是极大的鼓舞。尼赫鲁以后还在好几个场合和史沫特莱见过面，他们一直保持着友好的情谊。

布鲁塞尔反帝大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了理事会，理事会成员包括尼赫鲁、宋庆龄和鲍德温，查托担任常务秘书。史沫特莱没有在反帝大同盟中担任职务，反帝大同盟交给她的任务是通过中国国民党在柏林设立的新闻处，收集有关中国的消息，在印度的报刊上报道。她撰写了很多文章，其中包括：关于印度民族主义者在广州、汉口和上海等地的活动；印度革命党人哈巴特·辛格在上海枪杀印度警察头子；70名印度警察转到了广州起义革命政府一边，等等。这些报道的用意在于提示人们注意，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同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他们应该联合起来，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史沫特莱开始关心中国的命运，到中国去当新闻记者的决定，就是在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由于为反帝大同盟工作，史沫特莱和查托又碰头了。他们的婚姻关系已经彻底结束，他们走到一起完全是为了共同的事业。他们都是胸襟开阔的人，在工作中坦然相处，关系十分和谐、友好。

史沫特莱充满了活力，1926年秋季开始在柏林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功课十分紧张繁重，加上她的根底又不雄厚，她要花费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才能勉强跟上同班同学。到了第二年6月，她终于决定停止争取专业学位的努力，全力投入反帝大同盟的新闻工作。她又继续在大学里教两门课，每周三个晚上当家庭教师。这样她就不用更多地欠蒂娜·迪里厄夫人的人情债，这使她心里感到轻松。而迪里厄夫人仍然继续帮助史沫特莱，她找到了《法兰克福日报》出版社，使他们同意出版史沫特莱的书《一个孤独的女人》（即《大地的女儿》德文版的书名）。

反帝大同盟的新闻工作帮助史沫特莱形成了观察民族解放运动的新视点，她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了，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世界性的特点。

像印度、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必须采取跨国的统一行动，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相同的敌人。她坚信，民族主义者只有两种立场可以选择：要么站在依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对印度来说，就是继续保持殖民地的地位，充其量只能实现在英帝国主义允许下的某种程度上的自治；对中国来说，就是长期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要么站在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把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的解放结合起来，争取彻底的民族解放。史沫特莱从在纽约和卡达尔党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就一直坚持后一种立场，现在她更加相信这种立场是正确的。卡达尔党没有获得成功，正是这种立场还不够坚定和策略上的失误。史沫特莱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查托和她的观点是一致的。赞成第一种立场的是印度国内的上层著名人士，如莱帕特·拉伊。莱帕特·拉伊是史沫特莱认识民族问题的启蒙老师，史沫特莱投身民族解放运动，就是在他的带引下入门的，可是这位老师的观点却没有得到学生的信服，他们一直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尽管如此，史沫特莱仍然把莱帕特·拉伊尊为长者，对他的学识和品格非常敬重。

史沫特莱写了一篇题为《国外的印度革命运动》的论文，刊登在 1927 年 8 月 11 日与 18 日的印度《人民》周刊上。她写道：

印度国内的（民族运动）领袖几乎都中了英国教育的毒，或则由于只听英国对世界时事的解释而中了毒。而印度的流亡者，因为他们生活在世界各地，能够通过印度人的眼睛，而不光是通过英国人的眼睛来观察世界形势。

史沫特莱用尖锐的语言批判了“国内派”的狭隘性，肯定了“国际观点”的优越性，希望能够帮助莱帕特·拉伊改变他的使印度成为英国的自治领然后实施改革的立场。她的文章在印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莱帕特·拉伊首先写文章反驳史沫特莱的观点，他写道：

史沫特莱小姐错了，如果她认为我们全都是些婴儿，甚至连最起码的政治都不懂。她坐在柏林，以优越的地位写文章，她可以把我们叫做叛徒、懦夫和白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决不是那样的人……史沫特莱小姐并未说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是否应该组织一次反抗英国的起义，任凭敌人把我们的脑袋、骨头以及肉体全都搞得粉碎？假如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被处了死刑，印度会不会变得更自由些，更幸福些？

查托的弟媳卡玛拉·德维也卷入了这场辩论，她激烈地反对民族运动要以苏联为解决问题的榜样的观点。她以为史沫特莱是共产党员。她尖刻地说：“这些加入共产党的朋友常常是一些没有机会成为资本家的人，他们把这种损失转化为一种美德。或者他们本人就是资产阶级，在表面上扮演着共产党员的角色。”卡玛拉·德维认为：“如果认为每个人都吃饱肚子，世界就会变成天堂，那是荒谬的，只有当我们认为生命是神圣的，幸福才会开始来临。”

双方唇枪舌剑，谁也说服不了谁，辩论变得越来越感情用事。正在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转移了双方的注意力。

有一位名叫凯瑟琳·梅奥的美国女作家出了一本书《印度母亲》，这本书在美国很畅销。作者在书中宣扬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只有基督徒和英国人在从事改革印度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作者在为英国继续统治印度寻找理论根据。这本书的出版触怒了各个政治派别的印度民族运动领袖。莱帕特·拉

伊在《人民》周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一点一点地反驳梅奥的观点。史沫特莱作为一个美国妇女政治活动家也起来抨击她的同胞梅奥，这使莱帕特·拉伊十分感激。在史沫特莱发表在《新群众》报上的对《印度母亲》的第一篇评论发表以后一个月，莱帕特·拉伊发表了致史沫特莱的道歉文章：

我原来可以用比较温和的语调来进行评论，而且我也应该这样做。我和史沫特莱小姐相识已达十年之久，在此期间我从未对她的诚意产生过怀疑。她不是一个能以金钱收买的人。她是个天生的革命者，具备一个革命者的一切才智、性情和习惯。她一生为了生存和荣誉进行不断的斗争；她的生活本身加强了她的那些革命气质。从个人角度讲，她的动机完全是清白纯洁的。她能为她的朋友的事业作出巨大的牺牲，因此就我个人所知道的，我能说，黄金对她是一无诱惑力的……

正当史沫特莱和她的印度同志们抨击《印度母亲》最激烈的时刻，她的美国老朋友玛格丽特·桑格来到了柏林。桑格一贯致力于宣传节制生育，史沫特莱在纽约担任过她主办的节育刊物的负责人。这次她来柏林，主要目的仍然是宣传节育。桑格回美国之前，要求史沫特莱尽快在柏林办起一间节育诊所。史沫特莱和过去在纽约共同从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和节育宣传工作的同事约瑟芬·贝内特一起进行节育诊所的筹备工作。她们成立了一个由有经验的医务人员组成的参谋委员会，由他们从事具体工作和承担责任，以抵制公众的抗议。在当时的欧美，节育工作是一项先驱者的勇敢事业，虽然在德国节育并不是非法的，但是天主教徒和国家社会党（纳粹党）人正在极力剥夺法律对节育的保护，而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也只能对节育工作提供一些象征性的支持。要办一间节育诊所，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史沫特莱听从凯绥·珂勒惠支的儿子汉斯·珂勒惠支的劝告，求助于医学博士、共产党员理查德·施米恩克，在施米恩克和一批共产党员以及信仰共产主义的专家们的帮助下，终于办起了节育诊所。史沫特莱十分感激共产党人，正是他们十分慷慨地用自己的才智和精力帮助了德国的工人阶级和穷苦的人们。

在1925年到1928年这三年中，史沫特莱一直在跟贫困和疾病搏斗。长期的心灵折磨留下的创伤，使她不得不继续进行精神分析治疗。1927年圣诞节，史沫特莱孤单寂寞，崇拜着史沫特莱的年轻的巴卡尔来到她身边，陪伴她度过节日之夜。巴卡尔向她求婚，但史沫特莱拒绝了，她认为这会葬送了他的前程。巴卡尔在柏林读完了博士学位，就回印度去了，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1928年4月，史沫特莱得了阑尾炎，但她穷得一无所有，玛格丽特·桑格给了她经济援助，才进医院做了手术。手术以后，她的心脏病和胃病又犯了，医生给她做“电浴”。史沫特莱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支撑着虚弱的身子和凯绥·珂勒惠支一起翻译桑格的文稿。凯绥·珂勒惠支为病床上的史沫特莱画了几幅速写，这是史沫特莱一直保留着的珍贵礼物。

但这三年史沫特莱的精神生活无比丰富。她认识了共产党，虽然她没有成为共产党员，但她坚信共产主义和民族运动在斗争目标上的一致性；她初步了解了中国，她明白英国当局害怕反对殖民主义的星星之火可能从中国蔓延到印度。因此史沫特莱决定把她自己作为接触剂，把中印两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火焰连接起来。她坚信亚洲的民族主义和欧洲美洲的帝国主义的最后的较量即将出现，而中国将是这场较量的中心地带，她决定到中国去。她预

感到有一种使命在召唤，她是完成这个使命的惟一的、最符合条件的人。

她开始为去中国作种种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1928年6月她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她的律师吉尔伯特·罗已经代表她与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大地的女儿》的合同，只要稍作修改，书就可以出版了。她告诉玛格丽特·桑格，她去中国以前，要抓紧时间把书修改好，以后出版的事就由桑格和吉尔伯特·罗负责。甚至说好了万一她发生意外，就把她的书的版权交给她的朋友朱利安·冈泼士先生全权处理。史沫特莱没有任何财产，只有她的作品，把书的事情安排好，她就可以放心到中国去了。

在离开德国以前，史沫特莱用德语向一个共产党阵线的大型组织——拥有三万多名会员的无产阶级妇女大会演讲印度的工人运动。当她演讲结束时，听众全都站了起来，自发地齐声高唱国际歌。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场面！史沫特莱回想起十多年前站在汽车挡泥板上的反战演讲和四年前在柏林大学英语系的演讲，她看到了自己成长的道路，感觉到了自己成熟的过程。现在，她将作为一个坚定地把自己奉献给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美国工人阶级的女儿，奔向一个新的战场——到中国去！

第六章 路标

史沫特莱决定以《法兰克福日报》驻外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国。她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必须得到美国护照。她身在柏林，由在纽约的她的律师吉尔伯特·罗为她办理。罗律师从史沫特莱的父亲那里找到了她的出生证件，又从厄恩斯特·布伦丁那里要到了离婚证，证实了史沫特莱的美国公民身份，最后把护照寄给史沫特莱，办这件事整整花了六个月。

1928年11月，史沫特莱怀着既兴奋又不安的心情和一种即将面临严肃使命的预感，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

史沫特莱途经莫斯科，在那儿停留了一段时间，拜访了居住在莫斯科的宋庆龄。在莫斯科，史沫特莱看到苏联人民的生活与她1921年参加印度民族主义者最高级会议的时候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主义的苏联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西方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里产生不了影响，苏联的社会生活是安定的。但史沫特莱看到莫斯科街头仍然有大群大群的流浪儿，她很关心这些孩子的命运。她参观了孤儿院，为《民族》周刊写了一篇报道。

史沫特莱游览了莫斯科，1928年11月底登上了开往中国满洲里的火车。

在史沫特莱逗留莫斯科的时候，印度发生了突然的事变。史沫特莱的导师和朋友莱帕特·拉伊在一次非暴力示威中受了伤，11月17日在拉合尔医院中去世。事后证实莱帕特·拉伊是被英国警察桑德斯开枪打伤致死的。旁遮普的年轻人发誓要报仇。两个星期以后，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年轻的锡克革命党分子在拉合尔警察指挥部的台阶上，枪杀了桑德斯。后来史沫特莱在南京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悲愤地为莱帕特·拉伊写了一篇沉痛的悼文。

1928年12月，史沫特莱从满洲里进入中国国境。当时的东北，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史沫特莱到来之前的几个月，日本人杀害了军阀张作霖，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老百姓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土匪的肆无忌惮的劫掠下，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史沫特莱虽然从小在贫困中生活，但当她从未亲身体验过的亚洲的贫困扑面而来的时候，她还是惊呆了。她承认，她从未见过这样彻底的贫困。史沫特莱从旅顺到天津，再到北平和南京，所到之处，哀鸿遍地，民不聊生。史沫特莱过去曾经靠第二手材料写印度人民的苦难，现在有机会亲身体验中国人民的苦难，她的使命感更加强了。

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史沫特莱就以一个女性特有的敏感去接触中国妇女。她看到中国妇女的苦难远非她所熟悉的美国西部劳动妇女的苦难可以比拟，这是茹苦含辛的默默地流着血和泪的一群。史沫特莱知道，自从10世纪以来，中国妇女就被迫缠足，使女人的天足变成畸形的“三寸金莲”；封建的婚姻制度是捆在妇女身上的一条绳索，“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人骑来任人打”，这是史沫特莱听到的第一句中国谚语。女人只有生了男孩，在家庭中才有地位，溺死女婴的现象在下层社会中很普遍。妇女想要逃脱悲惨的命运，传统的办法只有自杀或者削发为尼。

史沫特莱也了解到中国妇女的反抗，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出现的新一代女革命家，到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一代年轻的中国女性，直到在白色恐怖中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而牺牲的女共产党员，她们勇敢地在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斗争中，去寻求妇女自身的解放，并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在沈阳，史沫特莱拿起了她战斗的笔，把她初到中国所见所闻的种种使

她心潮难平的人和事写成了一系列报道，寄往德国的《法兰克福日报》和印度的各个刊物。这一系列报道集中表现了两个主题：其一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野蛮统治，指出原来西方人认为英国在东方的威胁大于日本，这是一种偏见，其实最大的危险来源于日本帝国主义。不了解亚洲情况的西方报刊普遍不接受史沫特莱的这个结论，经过一番研究论证，才发表了史沫特莱的报道。另一个主题是关于中国妇女的，其中写得最生动最精彩的是发表在《新共和》杂志上的特写《沈阳的五位妇女》。这时候，她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正在美国和德国问世。而在中国，她以具体的形象，深刻的感受，个性化的描述，反映中国妇女的苦难、斗争和希望。史沫特莱开始把反映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当作她为之献身的新事业。为此，她要投身到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去，她到中国来，决不是为了当旁观者。

1929年3月，史沫特莱在南京。这时候在印度德里以东100英里的小城米拉特，进行了一次公开审判：31名印度共产党嫌疑分子和51位缺席的同案被告——包括史沫特莱——被指控“阴谋夺取英国国王和王后的主权”，受审者有锡克族的活动分子，被指控用乌尔都文发表史沫特莱的文章，包括那些预测英国和苏联之间将要由于苏联威胁英国在中国和印度的地位而发生战争的文章。史沫特莱悼念莱帕特·拉伊的文章又正在这个时候在印度发表，于是英国当局认为有理由把史沫特莱视为威胁英国安全的危险分子。在南京的英国情报官员立即行动起来，监视史沫特莱的行动。并以史沫特莱是英国臣民查托帕迪亚雅的妻子为理由，要求美国驻南京的大使馆否认史沫特莱的美国公民身份，要求中国政府以“不良分子”的罪名把史沫特莱驱逐出境。史沫特莱在蒋介石统治的中心南京行动受到约束，就登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1929年5月，史沫特莱到了上海。

当时有着340万人口的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在史沫特莱眼中是个无比奇特的地方。这个城市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但西方经济文化的渗透也特别厉害，形成了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氛围。史沫特莱觉得上海有点像纽约，不像她想像中的中国城市。上海的租界面积差不多占了城市的一半，这是分属于各个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中国政府不能行使国家权力的地方，这种国中之国的奇特现象使史沫特莱感到惊讶。后来她才明白，正是这种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特殊环境使上海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逃避国民党政府司法权的避风港。史沫特莱从此在上海前后生活了七年，使自己完全地融入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后来她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常常忘记了我不是一个中国人。”

史沫特莱在上海的行动相对地比较自由，她常常去光顾位于苏州河旁公共租界的“时代精神”书店，和书店的经理艾琳·维德迈尔成了好朋友。通过艾琳，她找到了在柏林时的两位老相识，格哈特·艾斯勒和阿瑟·尤尔特，他们现在是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代表，两人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史沫特莱知道他们的身份，她自己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也不属于共产国际，但她支持他们，他们也相信她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可是，史沫特莱初到上海时，也有过一段对陌生的生活环境难以适应的时期，她情绪不稳定，心情有点迷惘，时而兴奋莫名，时而苦闷沉郁，她还没有找到通向普通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的道路。史沫特莱在上海初期接触的是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诗人、学者和作家。她的这些朋友中，有杜威的门徒胡适教授，有中央研究院的著名人类学家、政治上开明的杨铨教授。

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更是深深地吸引了史沫特莱。徐志摩在牛津大学受教育，说英语跟说汉语一样口若悬河。在史沫特莱浪漫的想像中，他是东方美和西方美的结合。据说史沫特莱有一段时间曾迷恋上了他。1929年夏天，两人逆长江而上作了半个多月的旅行，一起到徐志摩的家乡去度假。

但史沫特莱并没有沉迷多久，她很快就给自己的这一段情感历程划上了句号。史沫特莱曾经跟这些被她称为精神贵族的诗人、学者们坐黄包车兜风。车夫在前面跑着，精疲力竭，白粗布的号背心浸透了汗水，而他们坐在车上尽情领略上海之夜的清风明月。这情景使史沫特莱深感内疚。后来她在1930年5月18日刊登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中国的诗人与教授》中用严厉的语调责骂自己：

我想要成为一个精神贵族的愿望同另一种思想搅和在一起。我想到在我面前像一匹疲惫的马一样奔跑着的黄包车夫，他沉重的喘息不时为虚弱的咳嗽声打断。蓦然，他那宽阔的肩膀使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是一只狗啊！我们整个一群全都是狗！

史沫特莱和某些外国记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她不愿意以居高临下的姿势观察中国，以旁观者的态度去写中国人民的生活。她要求自己对中国现实有牢固的把握，以整个身心去和中国普通老百姓融合在一起。她要认真去看看普通的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在这方面，对她帮助最大的是鲁迅、茅盾和陈翰笙。陈翰笙当时是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获得过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的学位，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员。1929年秋天，陈翰笙邀请史沫特莱和他一起到无锡地区去作农村调查。这地方是富饶的湖区。史沫特莱认真地研究了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她发现这里的贫富悬殊达到了使人震惊的程度，而农民的极端贫困和她看到过的满洲地区没有两样。在码头上，她看到肩上套着绳索的搬运工人在炎炎烈日下吃力地拉着装满货物的板车。一辆闪闪发光的黑色轿车驶近，车里坐着傲慢的洋人。一个满脸胡子的高个子印度巡捕出现了，为了给洋人的汽车开路，他抡起警棍，向着搬运工人赤裸的、汗水淋漓的背上猛击。史沫特莱目睹一个被压迫民族竟然这样对待另一个被压迫民族，她感到那警棍像是击在她自己身上。在无锡，史沫特莱还看到过一个惨绝人寰的场面：一批缫丝工人工会的干部被当作共产党嫌疑分子，被反动当局在街上斩首示众！

史沫特莱想要了解上海工人的劳动情况，鲁迅通过左翼作家朋友介绍她到一间私营纱厂做工。史沫特莱出身劳动家庭，从小习惯劳动，习惯与劳动者在一起，她很快就和女工们互相理解，成了好朋友。与史沫特莱同住一屋的是一位中年女工，名叫许莲弟，童工出身。她告诉史沫特莱，童工有三大克星：超过身体承受力的劳动强度、恶劣的劳动条件和奴隶式的管理制度，童工只有百分之三十能够挣扎着活到成年。在工厂劳动期间，史沫特莱完成了一些最真实动人的特写，如《缫丝工》《徐梅龄》。

史沫特莱离开工厂时，打算给许莲弟赠送一件纪念品，她把莲弟带到百货公司。莲弟在一个出售泥人玩具的柜台前站住了，她看中了一个肥头大耳、憨态可掬的无锡大阿福。史沫特莱告诉她，准备送给她一件更贵重的纪念品。莲弟摇摇头说：

“不，我家里很穷，从来没有玩具，我一直盼望能有这样一个泥人。现在，我已是40岁的人了，托您的福，我盼了多年，终于盼到了。”

中国劳动者的生活理想是多么纯朴，追求理想的意志又是多么执着，可是他们却在贫困的深渊中挣扎。史沫特莱心中涌起了一股正义的怜悯之情。她把自己的感受告诉鲁迅时，鲁迅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她，说道：

“的确如此，民众具有坚定的生活信念，他们不达到目的是不会停止追求的。”

茅盾帮助史沫特莱了解中国文艺界的现状。史沫特莱知道了中国还有一批与她先前所了解的“精神贵族”不相同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不接受徐志摩式的浪漫主义，他们走向社会，走向劳动人民，按照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去反映人民的斗争。史沫特莱和左翼文艺工作者开始有了联系，她和茅盾共同翻译了不少左翼作家的作品。史沫特莱给茅盾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茅盾在 1980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史沫特莱：

认识她好比看到太空中的一道彗星昂然又悠然逝去。她去世已经 30 年了，离开中国更早 10 年。这段时间不短，其间有许多着实烜赫过一阵的人和事都为历史草草抛却，但我一念及她，便觉得斯人宛在，光鲜逾昔。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难忘的，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她。我们中国人当然喜欢她，非常喜欢……她是我遇到的透彻到家的国际主义者……在她身上，闻不见半点封建气味来，这对我们中国人好比空谷足音，正是最具吸引力的……我不禁回想她哀乐的一生，颇觉其犀利（时或近于刻薄）、绝俗（时或近于愤世）、创新（时或近于纵奇）、嫉恶（时或近于无恕）、利他（时或近于虐己），其中闪烁着高尚品格的光芒，可说是 20 世纪同辈人物中罕见的。

史沫特莱认真地观察并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的现状，清醒地认识到这个现状必须变革；而且变革必须是彻底的，不可能在旧制度的约束下进行。史沫特莱坚定地说：那么，就让我 and 中国人民一起来变革这个制度吧！

史沫特莱马上把信念变成行动。她为《法兰克福日报》写了一系列动人心弦的报道，这些报道后来收进了她关于中国的第一部著作——《中国人的命运》。1931 年，史沫特莱和哈罗德·伊萨克斯合作在上海创办了进步杂志《中国论坛》。她协助宋庆龄以及中央研究院的成员于 1932 年组成了“中国人权保障大同盟”。她甚至计划在上海办一个节育诊所。

史沫特莱在中国见到了许多她从未见过的新鲜事情。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了农村苏维埃政权，贫苦的农民打倒了地主，分了地主的田地财产。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农武装割据使史沫特莱异常向往，总想有机会到江西苏区去亲眼看一看。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去成，但她总想着在上海为江西苏区尽一点自己的力量。她在上海巴恩公寓的住所成了江西苏区来的同志们的联络点和接待站，她冒着极大的危险为他们藏匿文件，帮助他们治病，一有机会，就详细地向他们询问苏区的情况。红军指挥员陈赓和周建平经常在她家作客，周建平还在她家养病，住了两个月，受到史沫特莱无微不至的照料。1938 年周建平在战斗中牺牲了，陈赓 50 年代当了 中国 派驻越南的高级军事顾问。史沫特莱利用从他们那里获得的第二手材料，写了几篇关于江西苏区的文章。这是最早的西方记者写的关于苏区的文章。

史沫特莱在上海一开始就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严密监视她的行动，经常对她进行无理的骚扰和故意的刁难。史沫特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她甚至敢于把枪支装在箱子里用手提着穿街走巷，把它们送到党的地下工作者手里。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找麻烦，她开始用“勒·奈尔斯”的笔名

发表文章。这个笔名来源于一次晚会上的笑话，当时一个朋友说，艾格尼丝生气时，就像锡桶里的一磅铁钉一样不好对付。这个笔名的意思就是“锈铁钉”。

国民党反动派对史沫特莱的活动既害怕又无可奈何，于是采用了惯用的伎俩：秘密监视、造谣中伤和威胁恐吓：国民党政府和英国警方勾结起来对史沫特莱进行监视和骚扰，使她不得不在法租界内经常变换住处。为了保护史沫特莱，她的朋友格拉斯和伊萨克斯轮流睡在阳台上，以防潜伏在房子周围的歹徒破门而入。1933年国民党的报纸上发表了一则电讯，说史沫特莱携带了几箱威士忌去访问江西苏区，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她赤身露体，站在讲台上唱国际歌。另一次更加令人发指的是，史沫特莱有一次回到住处，竟在纸篓里发现了一颗印度锡克人的血淋淋的头颅！

在了解中国和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同时，史沫特莱自己的内心世界也起了深层的变化。1930年4月2日她给老朋友米凯利斯的信中写道：

我现在是为一种思想活着，这比什么都使我吃惊。我变得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理智了……在这里我每天工作18小时，即使不干活，也不得安宁，因为亚洲的贫困……从四面八方向你扑来……有一小撮阔绰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就同难以描述的近在他窗下的贫困毗邻而居。许多国家的大战舰在江中停泊，许多国家的持枪的士兵和水兵“保卫”着一小撮富裕的外国人……我总想在我死去以前，一定要再写一本书——多少年以后我将在书中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连用它发展出来的帝国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它怎样把人变成了狼。只有已经变成了狼的非人动物才会愿意让这个制度永存下去。正是这个制度使亚洲落后到今天的地步。而那些武装力量，那些战舰正是为此目的才呆在这里的。

在6月30日的信中她写道：

中国使我受益匪浅。她使我成为一个头脑清醒的女人，头脑清醒，意志坚强。一切把我和查托捆绑在一起的东西，对我已不复存在，现在不，永远不……我经常还有一点倾向，渴望那类无意义的、依赖和残酷的老式的爱情。但我要从思想上从心中把它去掉……我希望使我的一切情感社会化。不过，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变成了或者以后会变成一个僵硬的女人。中国人对我的反应就可以说明我有数不清的、对我无限忠诚的朋友……我热爱中国人和所有的亚洲人，他们是感觉到了的。

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曾经是史沫特莱的好友和楷模，而现在，史沫特莱由于她“对一切共产主义运动的不留余地的谴责”而与她断绝了往来。

史沫特莱通过茅盾的介绍认识了鲁迅，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9年12月，以后他们经常见面，并常有书信往来。

据《鲁迅日记》记载：“1929年12月27日，下午史沫特列（莱）女士、蔡咏裳女士及董绍明君来。史女士为《弗兰孚德（法兰克福）报》通信员。”“1930年1月21日，下午得史沫特列信。”“22日，午后复史沫特列信。”“2月10日，下午董绍明来……且持来 Agnes Smedley（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所赠《Eine Frau Allein》（即《独立一妇女》）一本。”这本书，就是史沫特莱赠给鲁迅的《大地的女儿》，扉页上有作者用英文写的一句题词：“赠给鲁迅，对他为了一个新的社会而生活和工作表示敬佩。艾格尼丝·史”

沫特莱。”

当时鲁迅住在公共租界一条弄堂里的一幢欧式楼房里，二楼是书房。当太阳光透过窗帘斜照室内的时候，鲁迅坐在靠窗的藤椅上和史沫特莱谈论文艺和政治。当他们发现彼此可以用德语交谈时，谈话的内容就更加丰富，也更加随意了。鲁迅告诉史沫特莱，他正在读《大地的女儿》的德译本。史沫特莱则向鲁迅介绍她的朋友，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鲁迅对这些作品很感兴趣，他说，作者很善于从一个十分新颖的角度摄取生活中最激动人心的一瞬，线条粗犷、刚健，很有力度。其中那一幅描写一位母亲悲伤地献出自己的儿子的作品，使鲁迅想起千千万万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中国青年和他们的母亲。鲁迅决定把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从这时候开始，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鲁迅和凯绥·珂勒惠支开始了书信往来。

鲁迅在上海时期是作为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现于中国文坛的，党对他的影响和他自己所达到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使他的作品具有突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斗争气息。他的人格、学问和思想境界，他对理想的探索 and 追求，使史沫特莱感受到一种严师慈父般的魅力，这是她过去从莱帕特·拉伊那里从未感受过的。她以鲁迅的学生自居，向他学习怎样对待生活，怎样对待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史沫特莱开始协助鲁迅为左联工作，致力于向欧洲、印度、苏联和美国介绍中国左翼作家和革命文学。据戈宝权同志提供的资料，从1931年到1935年6月间，在美国进步刊物上发表过左翼作家联盟的三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都是史沫特莱一手办成的。第一封信发表在1931年1月1日出版的美国共产党杂志《新群众》上，题目是《中国作家的来信》，附有鲁迅50寿辰时史沫特莱为他拍摄的照片，这是左联成立以后第一次在国际上公开发表的历史性文件。第二封信发表在1931年6月出版的《新群众》杂志上，这是在1931年2月7日五位左翼作家和党的工作者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惨杀后不久，左联为向全世界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行而发表的《中国作家致全世界的呼吁书》。第三封信发表在1936年6月出版的美国《今日中国》杂志上，题目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致美国作家代表大会的贺信》。在此期间，史沫特莱深入研究了中国的左翼文艺的现状，在国外发表了许多介绍中国左翼文艺的文章。《法兰克福日报》1930年3月刊登了她的《戏剧——革命的准备》，6月15日刊登了《上海的电影》，《新群众》杂志1930年9月发表了史沫特莱的论文《中国的革命戏剧》，1931年2月又发表了她的《穿过中国的黑暗》。

1930年底，史沫特莱的健康情况恶化，她必须到菲律宾去休息一段时间。离开上海前夕，鲁迅和柔石、蔡咏裳、董绍明一起到史沫特莱的住所探望她。柔石是一位当过教师的青年作家，他给史沫特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1年3月，史沫特莱一回到上海，就知道了柔石和李伟森、胡也频、冯铿、殷夫等五位左联作家和党的工作者2月7日深夜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的消息。她怀着极端悲愤的心情跑到鲁迅家里。鲁迅在书房里，脸色灰暗，两颊深陷，没有刮胡须。史沫特莱感觉到他一双眼里闪耀着狂热的光芒，声音里充满一种可怕的仇恨。

“这是我那天夜里写的一篇文章。”鲁迅把他写好的《黑暗的中国文艺界的现状》交给她，请她译成英文寄到国外去发表。史沫特莱迅速把文章看了一遍，心一下子揪紧了，她担心这篇文章的发表会影响鲁迅的安全，劝鲁

迅不要发表这篇战斗性极强、匕首投枪式的文章，最好是另写一份呼吁书之类的东西。史沫特莱警告鲁迅：

“这篇文章如果发表，你会被人杀害的！”

鲁迅毫不退缩：

“那不要紧，总得有人出来说话，总得有人说出真理！”

史沫特莱邀请茅盾一起来说服鲁迅，鲁迅仍然坚持要发表这篇文章。除此以外，还和史沫特莱一起再起草了一份呼吁书，向外国文艺界揭露国民党当局屠杀中国作家的血腥罪行。文章和宣言在纽约、柏林、莫斯科等地发表以后，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世界各地的作家、艺术家给国民党政府发来了几百封抗议信和电报。

这件事史沫特莱办得很圆满，但她担心鲁迅安全的心却总也放不下。一年多以后的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在上海登陆，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这就是“一·二八”事变。日本人对上海旧城狂轰滥炸，鲁迅居住的地区也遭到了轰炸，史沫特莱心急如焚，她乘着美国《大美晚报》的汽车，冒险通过日本人的防御工事，向鲁迅家跑去，她使劲捶门，用英语和德语拼命喊叫，没有人答应。邻居们都锢居自己家中，不敢答理任何人。直到上海战事结束，史沫特莱才知道，鲁迅一家已经被一位日本朋友救出隐藏起来了。

1930年9月，两位左联的朋友找到史沫特莱，说打算在9月17日为鲁迅预祝50寿辰，请史沫特莱出面去租一间外国餐馆，要举办一次有一百多人参加的晚宴。为什么要史沫特莱去办？这纯粹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当时国民党正在“通缉”鲁迅，而出席晚宴的客人，又全都是所谓“危险的思想界”的代表人物，由一个外国人去租外国餐馆，有利于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史沫特莱爽快地答应了，设法找到当时上海法租界吕班路口靠近法国公园的一家荷兰印尼西餐室。当天，史沫特莱精心选购了一幅白绸子衣料，作为送给鲁迅的生日礼物，就早早来到餐室站岗放哨。

史沫特莱和两位朋友站在餐室的花园门口可以望得见客人来时的必经之路的地方，看着客人一批一批地走进餐室。这次聚会集中了文化界的几乎所有先进的代表人物：戏剧界有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的代表，洪深教授和他的学生，还有年轻的左翼演员。史沫特莱听说过，南国社上演《卡门》遭到国民党政府查禁，因为剧中的唐·何塞刺死卡门的时候，卡门把指环向她所抛弃的情人掷去时说的一段台词，被认为是暗示国民党破坏国共两党的合作。客人中还有共产党地下报纸的编辑，还有一位头发蓬乱的、刚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的革命者，还有冯铿等左翼青年作家。

史沫特莱在门口一直守候到客人们全都进了餐室，才离开她所站的位置，走进餐室坐在鲁迅身边。

鲁迅和夫人许广平带着一岁的儿子海婴来得很早。他穿一身米黄色的丝绸长衫，一双软底布鞋，没有戴帽子，剪得短短的黑发像一把刷子一样竖起来。史沫特莱从未见过这样表情丰富、不断流溢着智慧和机敏的光芒的脸孔，她觉得鲁迅浑身散发着完美人格的和谐的魅力。在鲁迅面前，史沫特莱总觉得自己十分笨拙，十分无知。史沫特莱把鲁迅视作良师，对他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忠诚。

晚宴结束以后，演说开始，满头乱发的刚从狱中出来的革命者谈狱中的情况，地下党报的编辑谈“秋收起义”，说起义的农民怎样大批地参加红军，像无数细流汇入不断壮大的江河。史沫特莱听了心里兴奋不已。

冯铿接着站起来讲话，她谈了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的必要，恳请鲁迅担当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的导师和保护者。

鲁迅静静地听着，最后他站了起来说，现在有人请他出来领导一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一切年轻朋友在敦促他做一名无产阶级作家。然而要佯称他为无产阶级作家，那将是幼稚的。他的根在农村，在农民和读书人之中。而且，他也不相信：不曾体验过工人的生活、希望和痛苦的年轻知识分子，能够在目前情况下创造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源泉只能是生活体验，而不是理论。尽管如此，他愿意帮助和指导青年，或者就是像他们所要求的那样，充当他们的导师。至于保护，在一个把最温和的社会文学也称为犯罪的政治统治下，又有谁能做得到呢？

聚会结束，客人陆续离去时，史沫特莱又站在门口警惕地向四周瞭望，直到最后一个客人离开了餐室，她才和朋友们一起把鲁迅护送回家。

1932年间，史沫特莱把她关于中国的新旧作品整理汇编成一本集子，这就是1933年出版的《中国人的命运》。史沫特莱紧接着着手整理江西苏区的材料，准备动手写她的新著《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二八”事变以后，史沫特莱感到在上海已经无法静下心来写作，莫斯科一家出版社同意预付这本书的稿费，邀请她到苏联去写作。于是史沫特莱在1933年6月到了苏联，在高加索的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院住了一个夏天，然后又到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苏联一直住到1934年4月，写完了《中国红军在前进》。

在列宁格勒，史沫特莱与查托重逢。原来德国纳粹党执政以后，查托就离开柏林到列宁格勒定居，在列宁格勒人种志学研究所工作，娶了苏联妻子，现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将要出世了。史沫特莱的心情是平静的，她知道，她生活中那痛苦的一页永远结束了。

以后，史沫特莱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和父亲弟妹作短期的团聚，1934年上半年重又回到了上海。

史沫特莱回到上海以后，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住在鲁迅家里，受到鲁迅和许广平的热情接待。许广平把二楼儿子海婴住的房间腾出来让史沫特莱住。史沫特莱每次出外回来，走到弄堂口，都要机警地前后张望，确信没有特务跟踪，才疾速拐进弄堂，飞快地进门，冲上二楼。幸亏一直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实上，由于鲁迅的声望，国民党特务不敢轻举妄动，使史沫特莱免受骚扰。

在鲁迅家里，史沫特莱有更多的机会与心中最敬爱的导师促膝长谈。他们谈得最多的是文艺和政治。

有一次，鲁迅对史沫特莱说，他想以自己的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也有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为题材写一部作品的打算。对前者，是无暇顾及；对后者，是没有亲身体验。而没有亲自体验要写好这么重大的题材，鲁迅认为，这是办不到的。他惟一能够做到的，也是惟一应该做的，就是致力于既具有政论性又具有文艺性的杂文的写作。

史沫特莱说：“您的政论性杂文要译成英语几乎是不可能的，您常常引用中国历史最黑暗时期的人物、事件和观念，这些杂文简直是隐喻和典故镶嵌而成的艺术品。”

鲁迅听了，意味深长地说：“不，我对屠杀无辜的暴行深恶痛绝，我只能把我的杂文变成匕首投枪，而不是供人欣赏的艺术品。”

1935年底，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由于国民党封锁消息，上

海一般人很晚才知道。史沫特莱通过国外电讯知道得比较早，她把消息告诉鲁迅，建议拍一个电报去表示祝贺。鲁迅同意，亲自草拟了给毛主席的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茅盾问电报如何发出，鲁迅说：“交给史沫特莱，让她去办就是了。”史沫特莱通过第三国际把电报从法国转发到延安。

1935年下半年，鲁迅的肺结核病越来越严重。史沫特莱看到鲁迅身体消瘦，脸色枯黄，心里非常着急，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举行十月革命节庆祝酒会的时候，史沫特莱和宋庆龄、何香凝、茅盾在一起谈起鲁迅的病，大家都觉得上海的文坛纠纷使鲁迅心情不舒畅，医疗和生活条件也不好，主张鲁迅到苏联去养病。苏联领事馆也答应安排一切。鲁迅不愿意去，说出了国就和国内隔绝了，连报纸也看不到，目前国内的斗争那么复杂，出国不是逃避斗争吗？况且他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大病。史沫特莱说她有一位美国朋友和一位德国朋友，都是肺科专家，可以请他们来给鲁迅看病。鲁迅说，他一直由日本的须藤医生诊治，一旦又请别人，这是对不起须藤的。

直到1936年4月，冯雪峰从陕北回到上海，和茅盾一起说服了鲁迅，才叫史沫特莱马上去请美国的D医生。D医生来了，首先问：“病人懂几国语言？”史沫特莱说：“日语很好，德语可以看书，不懂英语。”D医生说：“那么我们就用英语交谈吧。”为的是不让鲁迅听到病情。

听诊以后，史沫特莱问病情怎么样，D医生说：“很严重，恐怕过不了年。”

史沫特莱听了，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转过身去掩面啜泣。

“亚洲人对疾病的耐受力太强了，”D医生又说，“要是欧洲人，五年之前就死掉了。”

史沫特莱求D医生想个办法。D医生说，鲁迅不仅有肺病，还有其他多种疾病，需要详细检查。他建议找一个设备好的外国人办的医院，开个病房，由他诊治，只借用医院的设备。如果病人同意，马上就可以办。大家把病情严重的话瞒过鲁迅，只悄悄对许广平说了。对鲁迅只说要住院检查。鲁迅说：

“你们不要骗我，我知道病情严重。我看见史沫特莱哭了。唉，她真是太感情了。”

鲁迅不同意去住院，到了七月，病情却渐渐好转起来。到了十月，鲁迅突然病发去世了。

鲁迅去世时，史沫特莱没有在他身旁，她已经去了西安，准备到延安去，但是她的名字仍然列在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上。

后来，有人问史沫特莱，在中国谁是对她影响最深、最受她尊敬的人，她毫不犹豫地说出了鲁迅的名字。

“在我身上，激励着我的精神力量的鲁迅，已成为我人生的路标。我从这位伟大的作家那里所感受到的一切，将铭刻在我心中直到永远。”

1946年，史沫特莱在美国接待了访美的中国作家老舍。老舍向史沫特莱详细地叙述了鲁迅逝世时的情况。鲁迅下葬那天，三万多上海工人、学生、作家、美术家冒着被枪杀的危险，默默地跟在灵柩后面。也许是碍于葬礼主持人宋庆龄的威望，便衣警察不敢有什么行动。葬礼以后，老舍组织了有40多位作家参加的追悼会。那天，警察和特务就动手了。当警察署长驱车前来命令众人解散时，便衣警察和特务一个个满面杀气，站了出来。参加追悼会的除了作家，还有许多青年学生，大家站起来，手挽着手，毫无惧色。警察

署长掏出了手枪，老舍马上挡在枪口面前，冲着他大声喊道：“你要开枪，先打我好了！”为了大家的安全，老舍只好哀求大家今天先回去。在使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之中，人们只好怀着悲愤的心情默默地散去。

老舍无限惋惜地说：

“鲁迅生前，我从未与他见过面，因为我没有去敲像鲁迅这样伟大作家的的大门勇气。”

上海虹口公园里的鲁迅墓，墓碑上有一个圆形的框框，里面刻着鲁迅的浮雕像。史沫特莱的心又飞回了她与鲁迅共同战斗过的地方，可惜她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那儿去。她保存着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1933年2月萧伯纳访问中国时，在宋庆龄家的花园里照的，上面有鲁迅、宋庆龄、萧伯纳，还有史沫特莱。她穿着一件深色滚边的中国旗袍，稍稍低着头坐着，显得有点拘束、羞怯。她还记得，当时萧伯纳风趣地对鲁迅说：

“他们称你为中国的高尔基，不过，你比高尔基英俊。”

鲁迅微笑着回答道：

“等我再老一些，我会更加英俊。”

第七章 张学良的播音员

1936年秋天，史沫特莱接受了刘鼎的邀请，离开上海来到西安。

刘鼎是四川南溪县人，赴德国勤工俭学时，经朱德、孙炳文介绍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德国获得工程学学位。1926年由德国去苏联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院学习、任教，担任东方大学共产党中国支部书记。1929年回国，先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工作，1932年调闽浙赣苏区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后改任兵工厂政委，亲自动手研制和生产了红军的第一门大炮。在长征中因故掉队，秘密回到上海，住在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家中，史沫特莱也掩护过他，让他在自己的公寓里避难，两人在患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上海党组织考虑到刘鼎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就派他到张学良部队中做统战工作。解放后，刘鼎在军事工业部当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竟由于他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到批判和监禁。80年代初，他已经七十五六岁，退了休，负责编写新编党史中关于西安事变的部分。刘鼎向张学良讲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军事工作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张学良对他十分信赖。张学良曾对他的参谋长孙铭九说：“刘先生胆识超群，绝非等闲之辈。听说共产党内有个王稼祥，颇有本事，莫非刘先生就是王稼祥？”孙铭九笑了：“不一定吧，共产党里能人多得很哩！”

刘鼎是3月中旬到西安的，同行的还有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斯诺和马海德到延安去，刘鼎则在张学良军中当高级参谋。

西安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相距咫尺，是个最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地方。张学良是东北人，家乡沦陷，父亲被日本人杀害，他与日本帝国主义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东北军将士绝大部分是东北人，抗日救国，收复家园的要求很强烈。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西安，为的是使张学良远离东北抗日前线，瓦解将士们的抗日斗志，按蒋介石的需要去进攻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而西安从1935年起就处于杨虎城的西北军控制之下。杨虎城比张学良年长，性格粗豪，阅历丰富，有点军阀作风；张学良年轻气盛，是个知识分子型的将领。在抗日救国问题上，两位将军的观点是一致的。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方面做了不少深入细致的工作。1936年1月25日，红军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的信中指出，蒋介石把要求抗日的东北军调到陕西来打红军，是企图使东北军和红军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人之利，以达到反共和对日妥协投降的双重罪恶目的。因此东北军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抗日反蒋。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西北军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

刘鼎曾安排张学良和周恩来在陕北肤施城的一个天主教堂里作了一次秘密会见，希望劝服年仅36岁的少帅张学良在联合陕西其他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中采取积极的行动。这次会见是毛泽东主席认真分析了东北军的情况以后作出的重要决定。

4月8日，周恩来和随行人员按照预定时间来到天主教堂。那天雨雪交加，直等到第二天天色放晴，张学良才和刘鼎、孙铭九等人一起到达。当时周恩来留着大胡子，张学良一见，就上前紧握他的手，高兴地说：

“你是周先生，久仰，久仰！”

周恩来打量着这位年轻的东北军统帅：“张将军，你好眼力啊！”

“谁不知道共产党里的美髯公呀！”

两人相视，哈哈大笑。屋子里一下子充满了和谐、友好的气氛。双方在讨论了一般的政治问题以后，又谈起了红军和东北军合作的一些具体问题。由于双方都有意寻求合作，所谈的问题都圆满地达成了协议。回到西安以后，张学良高兴地对刘鼎说：“我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得多。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周先生这样友好，说话这样入情入理，我要早见到他多好啊！”

史沫特莱在西安只住了几天，刘鼎就安排她到临潼去住。刘鼎把这次请史沫特莱到西安的目的作了说明：周恩来和张学良的秘密会谈获得成功以后，共产党相信争取与东北军和陕西的其他武装力量联合起来抗日反蒋的努力一定可以成功，而这将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周恩来希望能有一位同情进步事业的外国记者对这一过程进行客观的报道。刘鼎安排史沫特莱避居临潼，不要公开露面，以免招致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警觉。史沫特莱听了很兴奋，她很愿意有机会承担这样的任务。

临潼是个美丽的地方，这里有含硫的温泉。在唐代，这里就是帝王和后妃们幽雅的休憩场所，著名的杨贵妃沐浴的华清池就在这里。这里有从唐代直到明、清时期的各种风格的建筑，亭、台、楼、阁、浴池和林荫路，使人萌发思古的幽情。史沫特莱在这里悠闲地一直住到11月底，一边休息恢复身体，一边开始写一本关于红军长征的新书。空闲的时候，就骑马旅行。骑马是她从小就喜欢的一种活动。

这期间史沫特莱只有一次离开过临潼，那次是到西安的德国医生赫伯特·温施家里，看望刚从陕北保安革命根据地回来的斯诺。埃德加·斯诺在那里生活了四个月，会见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写了大量报道，拍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其中包括那张著名的毛主席头戴八角帽的半身照，为他的《西行漫记》收集了丰富的资料，使史沫特莱妒嫉不已。当时由于共产党要求第一个访问根据地的外国记者必须是与国际左派没有联系的人，否则，这第一个就将会是史沫特莱而不是斯诺。史沫特莱理解这种要求，但没有获得这个难得的机会，心里一直十分惋惜。在温施医生家里，史沫特莱惊喜地见到了丁玲。丁玲是史沫特莱的好友，是通过鲁迅认识的。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当时史沫特莱在莫斯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她马上编辑出版了丁玲作品的英译本，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声援。由于国际上的关注，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了丁玲。史沫特莱还以为丁玲早已不在人世，现在见了面，当然分外高兴。丁玲更是激动万分，称史沫特莱为她的救命恩人。丁玲准备到延安去，现在是扮作女佣藏在温施家里。温施也是听了史沫特莱的劝说从上海来到西安的，他现在的公开身份是张学良的牙医，真正的任务是给红军输送医药用品。这是一次欢乐的会见，充满笑声和泪花的重逢。丁玲系上围裙，下厨为大家准备丰盛的菜肴，其中最受大家称赞的是她花大力气烧好的一只鸡。几个星期以后，丁玲溜出西安，参加了保安附近的红军。

10月中旬，史沫特莱得到了父亲在加利福尼亚去世的噩耗。父亲的去世，使她又想起了两年前从莫斯科回上海途中在加利福尼亚和家人团聚的情景。这次团聚是痛楚的。自从1916年离家求学，她整整18年没有回过家了。父亲已经71岁，仍然酗酒，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更衰老、颓唐。小弟萨姆已经结婚，做一些临时的工作，找不到固定的职业。家里惟一有固定收入的是妹妹默特尔。默特尔由姐姐资助读完师范学院以后，一直在圣迪戈区的一所小学当校长。她的工资很有限，不能彻底改变家里的困境。史沫特莱向家人

谈她在上海的生活。当时美国经济正处于大萧条时期，史沫特莱说，这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正在衰落的表现，她劝萨姆参加美国共产党，萨姆以极肯定的语气拒绝了。一家人都不理解史沫特莱的政治热情，气氛显得很和谐。现在父亲离开了人世，激起了史沫特莱对父亲和家人的深深的内疚和怀念之情。

史沫特莱还没有从丧父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又得到了鲁迅在上海去世的消息。那天是10月23日，一位女友来到史沫特莱的住处，悲伤地对她说：

“我们中国人遭受了许多损失。现在我们又遭遇到另一个损失——我们伟大的作家鲁迅逝世了。”

史沫特莱痛失良师，她觉得鲁迅的逝世不仅是她个人的悲痛，而是一个民族的损失。这个民族失去了一位一生为民族的未来而生活和工作的伟大的人，一位以自己的高尚完美的人格影响着整整一代年轻人的伟大的人。

这时候，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蒋介石也知道对日作战不能避免，但却想尽办法把对日宣战尽可能往后拖。他爱说的一句话是：“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他正在同日本人谈判，试图争取时间按照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的模式使他的军队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他要掌握时机解决西北的“共匪”。他认为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元气大减，正是围而歼之的好机会。现在就看他如何部署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陕北根据地了，所以张、杨二将军的部队是蒋介石手中的两颗关键性的筹码。可是这两支部队已经私自与红军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协议，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决定亲自到西安布置“剿共”军事行动。

10月，蒋介石带着宋美龄飞往西安，表面上悠闲地到处游山玩水，其实心里作着紧张的谋划。玩了几天以后，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布置“剿匪”任务。张学良站起来，激动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现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我觉得这种同胞之间互相杀害、消耗国力的内战，不能再打下去了。我在这里向委员长再次请求，请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接受中共的建议，共同商讨抗日大计，这不仅是我张学良一个人的要求，也是东北军全体将士的意见。”

杨虎城也说：“官兵抗日情绪高涨，‘剿共’士气低落，值得考虑。”

蒋介石勃然大怒，把紧握在手中的铅笔往桌上用力一掷，说道：

“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轻言抗日！‘攘外必先安内’，这是既定的国策！”

11月23日，蒋介石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和章乃器等爱国民主人士，这就是“七君子事件”。罪名是莫须有的，或者如沈钧儒先生所说，叫做“爱国未遂”罪。蒋介石又下令查封全国14家抗日进步刊物，悍然宣布：有“侈言”抗日者，格杀勿论！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各界人士纷纷抗议，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被捕爱国者的运动。

12月4日，蒋介石第二次来到西安。再次向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布“剿匪”训令的同时，命令集结在陇海线的中央军向陕西推进，使东北军和西北军处于被监视被分割的状态，以便必要时把张、杨部队调离陕西，把地盘让出来，让中央军去打内战。张学良在绝望之中，仍企图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与共产党团结抗日。他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蒋介石冥顽不化，坚持反共立场：

“你们的任务，第一是剿共，第二是剿共，第三还是剿共！你们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不要问为什么！”

张、杨二将军看到直谏、苦谏、哭谏都不奏效，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决定实行兵谏，把蒋介石抓起来，强迫他同意停止内战，与共产党联合抗日。

就在蒋介石到西安以后的两三天，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救亡会和学生联合会等抗日团体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游行示威，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示威运动达到了高潮。在张学良和杨虎城控制下的西安，群众游行是允许的，可是这次蒋介石直接下达了“格杀勿论”的命令，他的私人卫队和西安警察有恃无恐，公然开枪镇压游行群众，当场打死了9名学生，逮捕了12人，一名12岁的小学生也被打死在街上。张学良在群众的示威行动面前感到进退两难，他同情和支持他们，又不忍心看着他们流血牺牲。他要求蒋介石下令释放被捕者。对自己的无上权威十分自信的蒋介石，看到张、杨拒不执行镇压爱国群众的命令，怒不可遏，给张、杨下了一道为期两天的最后通牒。立即执行命令，开始对付共产党的军事行动，否则解除他们的职务。于是张、杨决定提前实施兵谏，用自己的行动在历史上写下了惊人的一页。

12月12日黎明前，蒋介石在睡梦中猛然听见几声枪响，感到事情不妙，他穿着睡衣，连假牙也来不及戴上，黑暗中冲出房门，摸摸爬爬，溜到东侧围墙边。贴身卫士蒋孝镇弯着腰，弓起瘦小的身躯，把蒋介石托出围墙外。蒋介石摔在满是碎石的沟里，走时匆忙趿上的鞋子也不知掉到哪里去了。蒋孝镇翻出墙外，扒下自己的皮鞋胡乱给蒋介石套在脚上，背上他就仓皇往后山跑去。后来蒋介石被发现躲在山崖上的一个不很深的缝隙里，脚上的皮鞋早已不见了，一双脚上满是血，已经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望了一眼黑洞洞的枪口，抖抖索索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张司令要我们来保护委员长，请委员长进城。”领头的军官向蒋介石道了歉，把他背下山。一路上士兵们不断地喊道：

“我们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我们要打回东北去！”

蒋介石被扶进汽车，送回西安。他仍然浑身发抖，拒绝说一句话。

在东北军扣留蒋介石的同时，杨虎城的士兵冲进西安的西京招待所，逮捕了住在那里的蒋介石的全体随员。

11月下旬，史沫特莱突然接到通知，立即离开临潼，回到西安，住进西京招待所。12月4日，蒋介石来了，他把召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地点定在临潼，而把他的随行人员留在西安，也住在西京招待所。12日，杨虎城的士兵冲进西京招待所逮捕蒋介石的随行人员的时候，这支带有军阀风气的队伍也骚扰了西京招待所的不少住客，连史沫特莱也未能幸免。士兵用枪托猛砸她的房门，冲进房间，把她的钱和衣物抢掠一空，连她的摄影器材和珍贵的胶卷也被抢走了。

这时候一幕不该发生的悲剧发生了。温施大夫来到西京招待所，受到士兵的阻拦，他说他与人有约，必须进去，强行挤过门口的士兵，推门而入。士兵竟向他开了枪，温施大夫当场就倒下了。谁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突如其来的悲剧。史沫特莱惊呆了，她立即与中共地下党员、杨虎城的高级参谋王炳南取得联系，请他马上来处理这件事。温施大夫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当初他听从史沫特莱的建议来到西安，以张学良的牙医的公开职业为掩护，向

红军输送药品和医疗器材，走上了把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的艰辛的道路，他是为中国人民作出了贡献的。史沫特莱和王炳南一起在城郊的一座小山上埋葬了温施大夫，她心里充满了悲伤，蓝灰色的大眼睛里泪水盈盈，额上和嘴角绽出了痛苦的皱纹。温施大夫的遭遇使她更加明白了自己所选定的生活道路是多么严峻。

西安街头，张、杨部队和蒋介石的卫队不断发生武装冲突，还有刚被释放的受伤的红军俘虏，街头到处有人在流血，到处可以听见呻吟声。从 12 日开始，史沫特莱就带上军事通行证到街上进行急救工作了。她工作了整整一个星期，这是一段既艰苦又充满危险的经历。后来她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感受：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一个星期，我是奔走于街头的战地急救员。有许多事情要干，教会医院给我绷带和裹伤用的软麻布，遇到难题时，医院教给我相应的急救知识，还带我到病房教我如何护理伤员。招待所经理给我一小瓶法国白兰地，我自己买了酒精、碘酒和其他急救药品。曾有一次，我在街上护理 30 名杨虎城的士兵。在这条街上，曾发生过意外事故，有 18 人死亡，其余人受伤。为了找水，我敲开商店的大门。当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商人门口时，他们照例是不闻不问的。此后，当 400 名政治犯被释放时（他们全是红军和红军家属），我成了他们惟一的医护人员。300 名红军中，有 100 人是伤员——有人带着从未治疗过的、有致命危险的旧伤，有的伤口正在化脓，有的腿上形成溃疡，许多人光着又大又硬的脚——由于在冬季雪地里行军和战斗而变得肿胀和血迹斑斑的脚。我给他们洗脚，给伤口消毒、包扎——然后返回教会医院请教对某些伤口的处理方法……

在把这些伤员转移到医院之前，我必须充当他们的医生。红军政治犯中，有 54 名妇女和 40 名男孩，我每天去照顾他们。所有这些人几乎都是贫穷的农民，有的还是奴隶。我为他们服务的这段时期，我总感觉到自己正走在人类历史上最悲惨、最可怕的走廊里。这些一辈子除了受奴役便一无所知的农民和奴隶，没有床，没有任何被褥，躺在冰凉的石头地上，身上带着没有处理过、尚未愈合的伤口，双脚又大又硬，满是血污——不，我永远不能忘记这种悲惨的情景，我会把它带进我的坟墓。多少年来我都在写红军，而我第一次亲身接触到的红军就是这些农民。他们不了解我。我敢肯定，我是他们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人；我穿的是羊毛衣、皮大衣、皮帽、温暖的长袜和皮鞋。我无法与他们交谈。最初，这些人以敌意的眼光看着我，许多人向后退，对我皱眉。当我给他们洗脚，包扎伤口时，我不知他们作何感想，也许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发了疯的洋鬼子。

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蒋介石的消息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陕北根据地的红军和老百姓更是又意外又兴奋，大多数苦大仇深的战士和群众主张杀蒋报仇。有人半夜里去敲毛泽东的门，嚷道：“把蒋介石这老小子押到保安游街，让老百姓都看一看，然后毙了他！”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乘机把持大权，一面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一面更积极地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策划更大规模的卖国投降活动。宋子文和宋美龄是亲英美派，担心亲日派扩张势力，宋美龄更担心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他们反对运用武力，主张用政治手段使张、杨放回蒋介石。党中央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认真分析了西安事变可能有的两种前途：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御侮，利用蒋介石仍然存在的一定的威望和号召力，团结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使中国免于灭亡，这是好的前途；公布蒋的罪状，然后处决之，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反而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内战，为日本制造灭亡中国的有利条件，

这是坏的前途。为了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共产党必须排除万难，力争好的前途成为现实。

扣留蒋介石的第五天，张学良派刘鼎乘飞机到保安接周恩来。在机场上毛泽东主席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深情地嘱咐道：

“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望着西安。西安很复杂。你们这次去，担子可是不轻噢！”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们会拥护我党的主张的。”周恩来对此行充满了信心。

周恩来作为中共谈判代表到了西安，张学良盛情款待，安排周恩来住在金家巷张公馆东楼。周恩来向张学良详细讲述了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立场，张学良十分赞同。

24日，谈判开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向蒋介石提出三项要求：立即停止旨在消灭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与共产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对日宣战。经过十天的讨论，达到了一项包括六点内容的协议：

- 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
- 二、改组南京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 三、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
- 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谈判结束以后，张学良在圣诞节那天把蒋介石护送回南京。

西安事变期间，史沫特莱当了张学良将军总部电台的英语播音员，成了一个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她每天晚上从张学良的司令部对外进行40分钟的广播，扼要地阐述当天西安事变的变化和发展，双方谈判的进展情况，也谈她和张学良、杨虎城的会见和她对这两位将军的印象。报道的内容客观、翔实，而且准确、生动。史沫特莱不善于外交辞令，对事件往往作一些具有个人风格的尖锐的评论。

史沫特莱的合作者是年轻的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贝特兰在英国牛津大学毕业以后，获得罗德旅行奖学金到中国学习汉语，研究中国文化。贝特兰结识了埃德加·斯诺，开始为英国报纸写稿，报道日军的入侵、学生的抗日运动以及共产党人经过长征转移到西北的情况。西安事变以后，贝特兰放弃了在北平从事学术研究的机会，决心到西安去看个究竟。他和一位中国朋友在一起，乘火车，搭军用卡车，甚至还骑驴，走了11天，于12月27日到达西安。贝特兰的播音风格和史沫特莱迥然不同，他努力模仿纯正的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的声调，尽力使自己的声音不带主观感情。因此贝特兰一开始并不喜欢史沫特莱，史沫特莱也不喜欢他，甚至怀疑他是个英国间谍。贝特兰写过一段文字，回忆与史沫特莱的初次见面：

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迈着大步从走廊走过来。她个子不高，身体壮实，短发，棕色的饱经风霜的脸，两眼距离很宽，眼神坦率……她声音粗哑，听上去似有敌意。她身穿一件红色紧身羊毛上衣，褐色裙子……

证实了贝特兰对西安事变的看法与自己完全一致，并且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的朋友以后，史沫特莱开始与贝特兰愉快地合作起来，并且很快成为无所

不谈的好朋友。他们每晚从无线电广播站出来，就到史沫特莱的房间里煮咖啡。各种各样的人——新闻记者、学生、政府官员、士兵——晚上都到这里来，聚在一起谈论当前的局势，分析日本人可能采取的行动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前景。史沫特莱早已抛弃了家庭享受，但仍然保留着美国人爱喝咖啡的习惯。她在一只酒精炉上煮咖啡，技术高超。

史沫特莱的广播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当时人们能够听到的只有南京官方发布的敌视张学良、杨虎城，歪曲共产党中央的观点的政府公报。史沫特莱的广播是惟一能使公众了解西安事变真相的信息来源。南京国民政府十分恼怒，诬蔑史沫特莱的广播是煽动“本来十分知足的”陕西农民发起暴乱，这外国女人是个阴谋分子、政治骗子。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官员要求美国领事馆收缴史沫特莱的护照。原先帮助过史沫特莱救护伤员的美国教会也害怕了，他们不断地向南京政府和美国领事馆报告史沫特莱的行踪。

史沫特莱的广播站的负责人是王炳南和刘鼎，他们在西安事变中都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于是史沫特莱理所当然地成了共产党的辩护人。美国报刊在头版用具有轰动效应的标题报道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活动——进步报刊说她是英雄，反动报刊说她是无赖。史沫特莱的朋友厄普顿·辛克莱在美国《自由》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女造反派在中国》，过分地夸张了史沫特莱在西安的言行，称她为共产党的“白肤女皇”。苏联政府谴责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认为这是日本人的阴谋。美国共产党可能是受了苏联共产党的暗示，也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攻击史沫特莱，说她不应该支持张、杨，不应该公开批评蒋介石，总之，她在西安事变这个问题上过于旗帜鲜明了。这么一来，史沫特莱与美国共产党之间的隔阂就越来越深了。

西安事变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刘鼎和王炳南到延安参加了红军。王炳南后来到了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外事工作。60年代初，任驻波兰大使，曾与肯尼迪政府进行过改善中美关系的秘密谈判，是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家。

两位亲密战友去了延安，更引起了史沫特莱对延安的无限向往，她想设法收集红军近十年的历史资料，连每一个战略细节都不放过，从江西苏区时期到长征路上的每一次战斗，她都能如数家珍般向人叙述。贝特朗听了深感惊讶，说，她的叙述“像司汤达的小说一样生动”。

1937年1月初，一个通信员从延安潜入西安，交给史沫特莱一封正式邀请她去延安访问的信。史沫特莱多年的盼望终于成了现实。她戴着红十字袖章，以前线救护员的身份出了西安城，穿着粗厚的马裤和像旗帜般鲜红的毛衣，奔向她心中的圣地——延安。

第八章 矢志不移

第一个到延安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这样描绘延安的：“它处在高高的石山脊的凹处，坚固的城墙蜿蜒到达山顶之上。与城墙连接在一起的，是新添筑的防御工事，它们看起来像一群群的蜂巢。”这是西安事变以后红军刚从保安转移到延安时这座古城的一幅典型的画面。延安是陕西北部的一座古老的城市，市区不大，只有一条主要街道，街道两旁是零零落落的几间不大的商店，街道的一端是一座当时已经被改建成礼堂的废置了的天主教堂。延河水绕城而过，河对岸一座山势平缓的土山上矗立着一座建于公元8世纪的佛教宝塔，这山就是著名的宝塔山，这座宝塔也就成了延安城的象征。

史沫特莱跋涉了整整三个星期，才到达了延安。欢迎她的人很多，除了老朋友丁玲、刘鼎和王炳南，还有一年前到达延安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丁玲是专程到保安等候史沫特莱、陪同她到延安的。延安还有不少老百姓认识她，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孩子。她们围着她，胆怯地微笑着，亲切地摸摸她的手，甚至摸摸她的脸，说着史沫特莱听不懂的话，很多人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她们就是史沫特莱在西安街头救护过的红军“俘虏”和家属。史沫特莱有一种回到了自己家里的感觉，延安的黄土高坡和科罗拉多的高原台地是相似的，延安的老百姓使她想起了家乡的农民和矿工。

史沫特莱到来的第二天，延安的干部和群众为她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史沫特莱应邀在大会上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她像和亲人拉家常那样自然而随便地讲着，讲美国西部农民和矿工的悲惨生活，讲她的贫苦童年，讲她13岁就到别人家里去做工，把微薄的工钱交给母亲，还讲到她的母亲和弟弟怎样悲惨地死去，接着她特别生动而详尽地讲述了1918年因参与在国外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而坐牢的经过。她的经历，对延安的听众并不陌生，他们不像在听一个外国人讲话，而好像在跟一个自己身边的同志谈心，那么亲切，那么动情。史沫特莱演说的风格就跟她这个人的风格一样，真挚坦诚，直言不讳，毫无夸饰，每一句话都是内心热烈感情的流露，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因此也就具有极大的感人力量和鼓动性。听众不断用眼神反映他们对这个陌生的外国人的理解和共鸣。史沫特莱肯定，她和延安人是完全可以交流的，虽然他们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延安人就是史沫特莱的父老乡亲。最后史沫特莱充满激情地说道：

“我理解你们，美国人民理解中国人民，理解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你们不是孤立的，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你们的斗争是世界伟大的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

听众被这位蓝眼睛的外国妇女深深地感动了。演说结束时，全体站了起来，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呼。

从西安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中国正式对日宣战的这六个月，局势相对平静。史沫特莱住在延安专门给外宾准备的简朴的“客人宿舍”里，制定了一个较长期的写作计划，准备写红军领袖的传记。她决定写朱德。在此以前，史沫特莱就听到过许多关于朱德的传说，知道他是一位英勇坚强、富有传奇色彩的军事领袖。

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前往凤凰山麓朱德总司令的住处。他们坐在一张没有油漆过的白木桌子前，朱德问史沫特莱愿意在延安做些什么事，史沫特莱毫不犹豫地答道：“我决定写你的传记，希望你能把一生的全

部经历讲给我听！”

朱德很惊讶，说：“我不过是个农民，是中国工农红军中普普通通的一员。”

“正因为你是一个农民。”史沫特莱说，“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中国农民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朱德觉得这位美国女记者很有意思，也说得很有道理，但还是诚恳地劝告她：“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民和士兵。你既然到延安来了，就先各处走走看看，和大家见见面，再作决定吧。”

史沫特莱与朱德初次见面，正像当年高尔基第一次见到列宁一样，感觉不到丝毫的“领袖味”。后来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这样描写她对朱德的最初印象：

……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微微隆起，颊骨也颇为突出，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军事指挥员，倒很像红军的父亲……他 50 岁，可是显得老得多……

听了朱德的劝告，史沫特莱开始广泛地接触延安的其他领导干部。毛泽东、贺龙和彭德怀，都是史沫特莱心目中的英雄。毛泽东既有政治家的大气磅礴，又有军事家的挥洒自如；既有哲学家的深邃睿智，更有诗人的浪漫情怀。与他的战友们比较，毛泽东具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气质，史沫特莱觉得他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超然的神韵。贺龙四十四五岁年纪，步履矫健，敏捷如豹，穿着打了补丁的灰军装，圆口黑布鞋上露出白色的短袜，嘴上留着胡髭，史沫特莱觉得他很像故事里的蒙古人或者中亚细亚人。彭德怀中等身材，貌不惊人，目光锐利，嗓音粗哑，年纪只有三十五六岁，像个粗壮的庄稼汉。长征时留下的胃溃疡正在发作，史沫特莱把自己带的药粉送给了他。他们都各有震撼人心的斗争经历，但史沫特莱觉得最能集中反映红军将领的伟大品质的仍然是朱德。她写朱德传记的主意已定，她又来到了朱德住的窑洞，一再要求朱德接受她的采访。

史沫特莱的要求极其执着而又诚恳，朱德终于同意每周抽出两三个晚上给史沫特莱谈自己的经历。他们混合使用汉语、德语和英语，遇到难处就求助于史沫特莱的翻译吴莉莉，马海德和黄华也抽空前来帮忙。

朱德比史沫特莱大六岁，可以说是同时代人，但史沫特莱总觉得朱德是个慈祥的长者，自己在他面前像幼稚无知的小学生。她贪婪地汲取着朱德讲的每一句话，语言的隔阂没有妨碍他们彼此的理解。朱德首先讲到他的童年，他有一位具有劳动人民的崇高品德的好母亲。史沫特莱听着，思绪重又回到了她那贫瘠的故乡，想起了她那一辈子处于无权地位的、辛劳的母亲。史沫特莱的蓝眼睛里盈满了泪水。朱德停了下来，轻声问道：“你怎么啦，艾格尼丝？”

“我觉得你是在讲我的母亲。”史沫特莱说，“我母亲是个贫穷的农妇，一年到头光着脚弯着腰在满是石头的土地上劳动，还要到有钱人家里洗衣服，洗得双手裂开了血口子，可是我们五个孩子每天只能吃加土豆的稀面糊

糊。”

“你父亲呢？”

“我父亲帮矿上运输沙石，像一匹马似的干活，有了钱就去喝酒。他不顾家。”

朱德听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天下穷人是一家啊！”

朱德继续讲述，讲到少年时代投考讲武堂的种种曲折遭遇，史沫特莱瞪大了惊奇的眼睛；讲到投身革命，南昌起义，还有井冈山的艰苦奋斗，史沫特莱全神贯注，双手在打字机上飞快地跳动。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将军，怎么会被人当作老伙夫？史沫特莱觉得这是一个谜，现在这个谜解开了。在红军中，总司令同时又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在群众中，共产党的领袖同时又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这就是朱德总司令的伟大品格，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能够打胜仗的秘密。史沫特莱觉得自己一下子懂得了许许多多，她有机会生活在这样的军队之中，能够和这样的传奇英雄坐在一起长谈，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据说，朱德的夫人对史沫特莱一个星期几个晚上和朱德坐在一起长谈颇有微词。有一天，朱德哈哈大笑把这事告诉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听了，也禁不住大笑起来。史沫特莱去找朱德夫人康克清同志，请她谈谈朱德。康克清同志是跟随朱德从江西苏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起并肩携手走过来的，她告诉史沫特莱，朱德的性格“非常可爱”。在《伟大的道路》第二十四章中，史沫特莱引用了康克清的一段话：

他的最伟大的品质是他对事业的耿耿忠心，诚实正直，没有个人野心——这个品质，使得他把自己和军队置于党的统率之下。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平易近人，热爱战士，战士们也同样爱戴他。

史沫特莱对朱德的采访持续了四个多月，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朱德率领八路军（由于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8月22日宣布西北主力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承认它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建成）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采访才不得不中断。

几个月的采访，史沫特莱对朱德的敬爱之情更深了，她从总司令的坎坷经历中，看到了中国志士仁人救国救民的求索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意志，为未来的作品中朱德的性格确定了这样的基调：勇猛顽强、忠贞不渝、谦恭谨慎、乐观自信、质朴正直。“我要去找朱德。”她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1937年10月史沫特莱离开延安，辗转来到山西五台县八路军总部找到朱德，他们的谈话又得以继续下去……

在延安，史沫特莱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对中国共产党也有了更加深切的了解。一种投身伟大事业的强烈渴望，使她迈出了经过长期深思熟虑而最终决定的一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经过反复研究，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史沫特莱得知这个结论的时候，嚎陶大哭起来，周围的同志们吓了一跳，连忙劝慰，史沫特莱还是像个任性的孩子似地哭个不停，哭得党中央的几位领导不知所措，只好让党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设法缓和这个紧张局面。陆定一向她解释说，党相信她是个好同志，但她是个有国际影响的人，党希望她留在党外，作为一个非党的作家和记者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鲁

迅不是也没有入党吗？史沫特莱不哭了，但情绪仍然十分沮丧。那天晚上，史沫特莱辗转反侧，想了一夜，寻找党不接受她的原因，也许是自己那种桀骜不驯的个性，使党怀疑她不能遵守党的严格的组织纪律吧。她越想越伤心，一连好几天都处于情绪极为激动的状态。

尽管申请入党未能如愿，但史沫特莱仍然把延安当作自己的家，把自己当作延安人民的女儿，延安的大小事情，她都要管一管。她看到延安的农村妇女子女成群，不少红军女战士、政府女干部也为生育过多过密所苦，她于是异想天开，决定在延安宣传计划生育，像她在纽约和柏林所做的一样。她给妇女们讲解节育的原理和方法，给她们分发药物。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史沫特莱的做法过于超前，听众很感兴趣地听着她的讲解，脸上带着羞怯的微笑和神秘的表情，却没有谁按照她的指导去做。

延安的窑洞里老鼠成群结队，到处横行，史沫特莱心里很着急，决定展开一次灭鼠运动。她请埃德加·斯诺设法从北平弄来了灭鼠药和灭鼠夹子，一边宣传讲卫生的重要性，一边教大家如何灭鼠。延安的老百姓大都把老鼠成群视作平常的事情，他们笑这个外国女记者大惊小怪。后来毛泽东表示了态支持她，大家就都认真对待了。

延安除了鼠害，虱子也为害甚烈，老百姓和战士身上都长虱子，休息的时候就一边晒太阳一边解开衣服抓虱子。大家习以为常，风趣地把虱子叫做“革命虫”。史沫特莱很为这事着急，有一次做完了报告，就幽默地再说上几句：“我还要说几句话，就是我不赞成大家‘革命虫’的讲法。确实，这是环境艰苦造成的，越苦越累它越伴随你。但是，我劝大家仍要注意清洁，要讲卫生，因为这关系到每个革命战士的健康，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她讲了以后，大家都忙着晾晒被褥，烧水洗烫衣物，展开了除害灭虱运动。

史沫特莱还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图书管理员，她负责扩充延安新建的鲁迅图书馆的外国文学书籍，她把纽约的《新群众》杂志介绍到延安，这本既有鲜明的政治内容又有图片的杂志，很受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欢迎。

史沫特莱关心着延安的医药卫生情况，想方设法托各方面的朋友向延安运送医疗器械和药物。她和毛泽东同志联名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呼吁，希望派医疗技术人员到中国，促成了诺尔曼·白求恩的中国之行。她还和朱德同志联名写信给她的老朋友、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请求派遣援华医疗人员，印度派了以柯棣华大夫为首的五位医生来到抗日战争前线。白求恩大夫和印度医疗队为中国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之中，也凝聚着史沫特莱的心血。

史沫特莱到处奔忙着，而每天夜晚，她窑洞里的灯光总要亮到深夜，她那简便的手提打字机嘀嘀嗒嗒地响着，她在整理采访朱德的材料，准备动手写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

史沫特莱整天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奔波操劳，她老是爱说这样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了我不是一个中国人。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会见了她，回答了她提出的关于中日战争和西安事变的问题。当时，毛泽东住在凤凰山麓城隍庙砭的一个依崖凿成的石窑中，石窑坐西向东，有些潮湿。在这个简朴的石窑中，人民领袖和史沫特莱侃侃而谈。

毛泽东同志对这次谈话非常重视，在3月10日给斯诺写信时附上这次谈话的记录稿。信中写道：

斯诺先生：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

我同史沫得列（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的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问健康

毛泽东

1937年3月10日于延安

3月16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刊登了这次谈话的要点。

3月，史沫特莱搬到了一个新的住处。这是一排五孔坐西向东的土窑洞，位于凤凰山半山腰上（现在的门牌是延安市凤凰村居委八号）。北起第一孔住美籍医生马海德，第二孔和第三孔是前后窑，中间有门相通。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吴莉莉住第二孔，第三孔住警卫人员。其余两孔窑主马玉英家自己居住。据马玉英的儿子马志刚回忆，史沫特莱在这里居住时，在窑前的院子里种了许多花卉，如波斯菊、海芽，还种了西红柿和西瓜。她种的西红柿个大味美，收成之好，羨煞周围的农民。

史沫特莱是一个热爱生活、感情丰富的女人，她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献给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她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自己的个人生活。但是，她在延安却有了一个“家”。这个“家”的成员是她的年轻的警卫员和她收养照顾的一个11岁的男孩，加上她自己。警卫员老是生病，小男孩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44岁的史沫特莱像母亲照料孩子一样照料他们，在他们身上倾注了全部母性的感情，自己也从中享受到了从未享受过的温馨和幸福。

7月初，史沫特莱给美国朋友兰德尔·古尔德写了一封信，生动地描写了她在延安的“家庭生活”：

……我在这里有一个美国式的花园。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了各种各样的种籽：其中有葡萄、金莲花；还有蔬菜——茄子、蚕豆、南瓜、黄瓜。几个月来我铲地、锄草，现在花已开始开放——美丽诱人。到它们结了种籽，我要分送给农民，使这个地方增加花的新品种。

清晨我在山间漫步，穿过峡谷，一路采摘野花——燕草、桔红色的大百合、鸢尾花等等，在这里它们显得漂亮极了。然后，我骑上心爱的“云南”——贺龙在云南缴获的小马，朱德送给我的，一阵风似地驰过峡谷，翻过小山。

我也工作——写朱德的一生，我还养鸡鸭来吃，自己做饭。我还是我的一个警卫员的护士。他害病已有三个月，先是肺炎，以后肺弱。他是一个20岁左右的四川农民，周复一周地躺在床上，用唱歌的声音朗诵书本。现在好些了，唱起了几十首民歌和红军歌曲。我还“爱上”了一个11岁的小鬼，他是这儿最伶俐的男孩。他住在我窑洞里，做些零星家务，还上学。我还想让另一个小鬼也来，因为他患了肺结核，需要一个母亲的照料。他曾是西安监狱里的少年“战犯”，在西安事变期间才被释放。他也是个11岁左右的四川孩子。

我现在这个小鬼可是个人物。在我让他盖鸡窝之前，夜里他把鸡鸭放在他的床底下。床上面有个燕子窝，里面有只正在学飞的乳燕。与我们同院住的农民养小狗和小猫，小鬼给燕子建立了一个保护国。每天他带着我的两只鸭子下河，他们三个一起在河里游泳。他收集罐头盒、钉子、绳子、匣子和我扔掉的杂志的封面，像美国小男孩一样，他用

长绳子系上罐头盒给自己做了个电话。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小鬼，敢于同想欺负他的、个子有他两个那么高的少年打架。我那生病的警卫员有点像父亲般地对待他。每天帮他学习。我喜欢他的好斗。

换句话说，我过着一种从未梦想过的平静而美好的生活。无论是在上海还是美国，我都不能过得如此自由自在，如此惬意。

毛泽东也经常到史沫特莱的窑洞里来，跟史沫特莱和翻译吴莉莉无所不谈。吴莉莉是上海来的大学生，延安文工团的主要演员，特别擅于扮演外国戏剧中的女主角，对毛泽东的诗词也很有研究，会依着毛泽东诗词的韵律作诗填词。毛泽东很喜欢指导她，据说还专门为她填好了几首词。毛泽东对外国的历史和现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边喝茶边聊天。毛泽东比史沫特莱小一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

毛泽东问史沫特莱，她是否体验过像拜伦、雪莱和济慈这些诗人所赞美的浪漫的爱情。

史沫特莱坦率地向毛泽东谈了她和查托的热恋。她说，查托是她一生中仅有的刻骨铭心的真正的爱情。

毛泽东说，他不明白，既然是亲密的情人，又是共同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的同志，为什么最终会分手？爱情，究竟还应该有哪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内涵呢？

史沫特莱跟毛泽东这个同龄人的交谈既自然又随便，有时候还放肆地开开玩笑。40年代，史沫特莱在一段回忆录中提到毛泽东，用的就是十分幽默的语调：

.....不知为什么他似乎不太自信，虽然他的名望和权威是毫无疑问的。我参加了几次由他做报告的在露天召开的群众大会，听众极为踊跃.....他说话时嘴里好像含着热粥，嗓音也不洪亮。他自然意识到这些短处，所以他尽可能地把语句说得短一些，简单一些，而且讲得很慢，停顿很多。此时，前几排的听众把他的话传给后排没听到的人。接着，听众中出现了一阵低低的赞同声，毛等他们平息后再继续讲.....他给我一种印象，不管毛说了什么，他都是每一位听众的代言人。

毛泽东正在利用大战之前短暂的宁静阅读大量的书籍，准备撰写哲学论文。史沫特莱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台旧的留声机和不少西方音乐唱片，毛泽东工作之余，就和史沫特莱、吴莉莉一起欣赏这些唱片。精神上的片刻松弛对他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因为有了留声机，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都鼓励史沫特莱教干部和战士跳西方的交谊舞，活跃延安的文化生活。

史沫特莱脸上现出顽童般狡猾的神情，笑着说：

“我要用西方的舞蹈来‘腐蚀’你们，我相信我不久就会成功。”

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

史沫特莱和苗条漂亮的吴莉莉开始每天晚上在大街尽头的天主教堂里，按照陈旧的留声机里放出来的旋律，教红军干部和战士们跳交谊舞，一些从城市来的大学生也来帮忙。史沫特莱生性好动，对教跳舞很感兴趣。

关于史沫特莱教跳舞，埃德加·斯诺有过一段这样的回忆：

因为她从小生活在美国西部牛仔之中，史沫特莱喜欢像《在老护林熊头上》《红河谷》《她从山那边来》这类民歌。她常用这类民歌的唱片教跳舞……起初，没有几个妇女愿意跳舞，常常只有男人跳。史沫特莱说，跳了交谊舞后，她觉得她的脚好像被整整一个师的人踩过似的。当时她 44 岁，头发已经开始发白；但她具有孩童般的活力，喜爱娱乐和快活，她使同这些“土包子”举行的舞会比纽约的第一流舞会更欢乐更美好。

史沫特莱满腔热情地教跳舞，可是她低估了这件事的难度。跳舞只有男同志参加，他们都不带妻子同来，因为她们都不想学跳舞而且反对跳舞。她们觉得，这种一男一女搂抱着缓慢移动的舞蹈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反映，她们不能接受。史沫特莱和吴莉莉“引诱”她们的丈夫跳舞，她们提出了越来越尖锐的批评。态度最激烈的是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她不喜欢史沫特莱。因为毛泽东坚持要跟史沫特莱学跳舞，她甚至威胁说要杀掉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当了真，吓得夜里不敢睡觉，警卫员和小鬼只好住到她的窑洞来，让她睡到他们的床上。史沫特莱公开表示，贺子珍过的是苍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而一个革命领袖的妻子应该是开放而豁达的。

终于有一天，史沫特莱和贺子珍之间的正面冲突发生了。这是埃德加·斯诺的一段叙述：

有一天夜晚，史沫特莱已经睡下了，窑洞外面有布鞋走路的声音，她听到毛主席轻柔的南方口音。这位主席去隔壁吴莉莉的窑洞。洞里的灯还亮着。史沫特莱听见他敲门，听见门打开又关上。她想重新入睡，刚刚有点睡意，忽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冲上山来。接着，吴的窑洞门被打开，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划破了寂静：“你竟敢骗我，溜到这个资产阶级舞女家里来！”

史沫特莱跳下床，披上外衣，跑到隔壁窑洞。毛的妻子正用一个长长的手电筒打毛主席。他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旧戴着棉帽子，穿着他的军大衣。他没有制止他的妻子。他的警卫员正站在门旁，显得很尴尬。毛的妻子狂怒地大哭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毛最后站了起来。他看上去很疲倦，声音沉着严厉：“别说了，子珍，我和吴同志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们不过是聊天。你作为一个党员，正在毁掉自己，你干的事你应该觉得可耻。趁别的党员还不知道，赶快回去吧。”

毛的妻子突然转向吴莉莉。莉莉靠墙站着，像一只吓坏了的小猫。贺骂莉莉：“舞厅的婊子！你大概和什么男人都勾搭，还想欺骗主席？”……莉莉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身后。这时，毛的妻子又把怒火对准了史沫特莱。

“帝国主义分子！”她喊道，“都是你闹出来的，回你自己的窑洞去。”接着她用手手电筒打了这个“洋鬼子”。史沫特莱可不是好欺侮的，一把将她推倒在地。羞耻胜过疼痛，毛的妻子躺在地上尖声喊道：“你算什么丈夫？你是共产党员吗？我就在你眼皮底下挨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的打，你一声也不吭。”

毛责备妻子道：“她没有惹你，是你打她的。她有自卫的权利，是你羞辱了我们，你的行为简直像美国电影里的阔太太。”毛气愤已极，但极力克制着，他命令警卫员扶起他的妻子送她回家……他们下山时，毛默默地跟在后面。许多人从自己的窑洞里惊奇地望着他们走下山去。

第二天早晨，全城都在议论这件事，毛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解释了他的行动并听凭他们作最后决定。委员会决定把此事作为“秘密事件”处理，发布了禁止议论此事的命令。但谁也制止不了毛的妻子。她把其他妇女召集起来，以求得到她们的支持，把史沫特莱、吴莉莉和警卫员——她认为他也参与了这个“阴谋”——驱逐出延安。

最后，毛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对她说：“我们曾发誓对那件令人不快的事只字不提，但我的妻子没有遵守诺言，现在城里到处是流言蜚语，令人不能容忍。我认为现在应该采取公开行动，驳斥流言蜚语。因此你不必再保密了。愿意的话，你可以为你自己辩护。”

这件事发生以后不久，吴莉莉同丁玲的现代剧组一起上了前线。7月7日抗战爆发以后，史沫特莱也离开了延安。她背起行囊，跋山涉水，克服重重困难，于1937年10月来到山西五台县南茹村八路军总部找到朱德，一边当随军记者，一边继续对朱德的采访。

延安的舞会仍然继续举行。从那时候起，党和政府机关每到周末，都要举行舞会，这大概是史沫特莱对东方传统的封闭性发起勇敢冲击的战果吧。

第九章 热恋的土地

1937年9月，史沫特莱动身去西安，路上整整走了十天，这十天她备尝艰苦。8月间她骑着“云南”在延安的山野间驰骋的时候，这个从小就会骑马的西部牛仔却不知怎么搞的，竟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背部受了伤。一路上辛苦劳累，伤痛发作，她不得不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着走，这使她心情抑郁。吴莉莉走后新安排的翻译邹先生，是从北平来的一位教师。史沫特莱从延安出来以后一路上看到的赤贫景象使她心里很难过，她发现邹先生对农民的痛苦似乎抱有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两人话不投机，关系不融洽，这也使她不愉快。将到西安的时候，史沫特莱脱下便装，换上一套八路军军装。她穿着这套军装进入西安，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在西安，史沫特莱拒绝住设备舒适的宾馆，就在八路军办事处里躺着休息，并且拒绝让邹先生继续当她的翻译。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感到很为难，幸亏遇到了史沫特莱在上海就认识的当时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扬。周扬给她介绍了26岁大学生周立波。周立波的英语说得不怎么样，但史沫特莱还是对这个纯朴的年轻人产生了好感，同意让他来当她的翻译。

史沫特莱在西安停留了一个月，接到了请她到八路军总部的邀请。史沫特莱身体好转，情绪也高涨起来，就带着周立波出发到山西去。周恩来在太原迎接她，把她送到北部山区的朱德司令部。

朱德正在司令部的院子里理发。史沫特莱走进来，朱德发理了一半，身上还披着白布单，就站起来向她伸出双手，史沫特莱上前抱住朱德，在他的脸颊上亲热地吻了一下。理发员站在一旁，手里拿着推剪，着急地说：“坐下，首长快坐下！”

在八路军中，史沫特莱晚上继续跟朱德谈话，白天随军采访，广泛接触根据地的老百姓。她亲眼看到，经过了减租减息运动的根据地，农民虽然还很贫困，但比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吃得好一些，穿得暖一些。八路军给老百姓挑水劈柴；史沫特莱也拿起扫帚，给大爷大娘们扫院子。群众把这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记者也看作亲人，把热呼呼的煮鸡蛋塞到她手里，向她倾诉心里话。史沫特莱心里发烫，眼内盈满了热泪。

八路军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朱德总司令更是被老百姓当作亲人一般。史沫特莱深受感动，她在一篇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深切感受：

当我们进入当地大县中阳城的时候，街上有数千居民，手里拿着旗子欢迎我们……。朱德今天的讲话，使我感到好像从来没有听他讲过话似的。也许，满街的旗子，欢迎的口号以及全神贯注的人们把他给感动了吧。因此，他讲话的声音、言词、举止、神情充满了对人民的热爱。他讲的都是肺腑之言。听众们歪着脖子静静地听着他讲……倾盆大雨落在一张张朝向朱德的脸的时刻，全场屏息静气，鸦雀无声。

与朱德和八路军战士在一起，史沫特莱觉得自己的内心世界获得了净化，精神境界升华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高度。和他们在一起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她决定把自己的命运和他们结合在一起。可是，看着这些战士，他们穿着不足御寒的衣服，吃着不足果腹的粗杂粮，而且随时有可能流血牺牲。史沫特莱心里感到内疚，因为她每天吃着饱饭，有好衣服穿，有温暖的床铺，还享受着无微不至的特殊照顾。她觉得自己仍然未能充分地了解中国

人民解放斗争的全部含义和实质，在激烈的斗争面前仍然是个旁观者。她渴望窥探中国革命者的内心世界，用自己的笔描绘他们的伟大斗争，反映他们为之献出生命的坚定信念。

为此，史沫特莱在艰苦的条件下拼命地工作。在行军途中休息的时候，她强忍着腰背部的疼痛，蹲在地上把每天发生的事详细地记录下来。她有一本黑色封面的日记本，每一页上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字，有的字是歪歪扭扭，难以辨认的。日记的每一页上都沾着汗水和泥垢。每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坐在打字机前整理材料，1938年在纽约和伦敦出版的《中国在反击》，写的就是她在八路军中的战地见闻和自己的深切体验。这本书写得简洁细腻，感情真挚动人。

在山西前线，朱德总司令身边还有另外几位外国朋友，其中一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情报官埃文斯·卡尔逊。卡尔逊是美国康涅狄格州公理会一位牧师的儿子，他是来考察八路军并研究他们的游击战术的。

在八路军总部，朱德招待卡尔逊吃过了一顿只有炒鸡蛋和白菜汤的太行山式的晚饭，陪着他一起来到篮球场上。朱德喜欢打篮球，可总是无缘参加正式比赛，战士们嫌他年纪大了，球技也比较差，怕影响比分，不让他上场。朱德总是笑笑，蹲在场边兴致勃勃地看球。这时候篮球赛正打得激烈，卡尔逊惊讶地发现，球场上有一张西方人的脸。

“她是你的同胞，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朱德注意到卡尔逊表情的变化，向他作了介绍。

可是史沫特莱不高兴和卡尔逊交谈，因为他是个美国军官。她想，这情报官说不定是一名由美国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派来的军事特务，她不相信他能够理解八路军。她认为他们之间惟一的共同点只是爱喝咖啡。

因为周立波是他们两人共同的翻译，他们有时候也在一起散散步，聊聊天，互相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思想。有一次，他们谈到美国向日本供应石油和废铁的问题。史沫特莱突然问卡尔逊：

“你曾经随同美国海军陆战队到尼加拉瓜去消灭桑地诺，不是吗？”

“是的，”卡尔逊回答，“那时候我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陆战队员。命令就是命令，军人只有服从。”

“可是你现在怎么想？”史沫特莱追问。

“现在我懂得了那是美国的帝国主义行为。但是，当时我并不理解帝国主义这个词的含义。”

“你已经从八路军这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是吗，埃文斯？”

卡尔逊答道：“在他们那里，一切旧观念都被清除。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我正在反省过去的一切，重新估价过去。”

卡尔逊逐渐了解了史沫特莱，他非常敬重她，为她的自我牺牲精神所感动。后来卡尔逊这样回忆史沫特莱：

她受人尊重，富有吸引力，生气勃勃，聪明勇敢，是一个极好的伙伴。但很急躁，是个说干立刻就干的人……。她抛弃了我们视为文明的各种舒适享受，置身于异国人中，过着原始生活。她的愿望就是同那些为了实现她一直为之战斗的理想而奋不顾身的人们站在一起。

史沫特莱看到卡尔逊对八路军的態度是友好的，无拘无束的，开始相信

了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真诚，改变了自己对他的教条主义态度，觉得卡尔逊虽然与美国官方有联系，但仍不失为一个善意的自由主义者。她向他伸出了友谊的手。

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不断向华北增兵，山西的形势越来越严重，八路军总部也经常转移。朱德考虑到史沫特莱的安全，要知道子弹是不长眼睛的，更何况她是一个妇女。他劝她离开山西到汉口去。史沫特莱不愿意离开八路军，她差不多是哭着说：

“我和八路军一起度过的日子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日子。不跟你们在一起，我精神上就不得安宁。不，我不愿意在精神上死亡，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朱德不答应。史沫特莱不信上帝，但有时急了也会引用《圣经》里的话，她说：“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住哪儿我也住在哪儿，你的乡亲就是我的乡亲，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儿，我就死在哪儿并葬在哪儿。”

朱德笑了，继续耐心地劝说：“到汉口去吧，在那里，你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医疗设备和药品供应的组织者，可以比在战场上做更多的事情，作更大的贡献。”

史沫特莱沉默了。但当她知道卡尔逊和周立波可以随总部转移时，她又沉不住气了。她去找康克清，请她说服朱德，但朱德毫不动摇；她又去找任弼时，任弼时也不支持她。

他们说：“去前方的人都要会打枪。”

“我会打枪，”史沫特莱说，“我是在美国西部长大的。”

“但你是一位妇女。”

这一下史沫特莱火了，她冲着他们大发脾气：“又不是我想当妇女才成为妇女的。”她又伤心地加上一句，“是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

这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史沫特莱自己也忍不住笑了，他们当然全都是无神论者。

圣诞节的晚上，史沫特莱和卡尔逊决定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庆祝节日。史沫特莱拿出了咖啡，卡尔逊只有一些花生。当水壶在炭火炉上滋滋作响时，卡尔逊问史沫特莱还记得哪些圣诞颂歌。她说，一首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几首黑人歌曲，于是她唱黑人歌曲，卡尔逊用口琴为她吹奏了几首她喜爱的曲子。

第二天，卡尔逊和周立波随八路军总部转移。史沫特莱别无选择，只好收拾起简单的行李，带上那部十多年来如影随形的手提式打字机，尽量装出高兴的样子，与朱德告别，到汉口去。

1937年隆冬，天色阴沉，寒风凛冽。史沫特莱在风陵渡南渡黄河，同行的是一支从华北向河南撤退的国民党军队。一大群士兵在渡口拥挤着，几个伤兵躺在担架上痛苦的呻吟，他们只穿单衣，没有盖被子，浑身血迹斑斑，在寒风中不住地颤抖。

“军医官！”史沫特莱用中国话对着正准备登船的一群军官大声呼唤：“谁是军医官？”

“我就是。”一个头戴皮帽，身穿皮大衣，足蹬皮靴的军官走上前来：“尊敬的女士，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您哪儿不舒服？”

“我是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很对不起，请拿军毯给伤兵盖上，他们受了凉会并发肺炎，有生命危险的。”

“我没有军毯，女士，”军医官漫不经心地说：“如果您有病，我给您看；至于伤兵，您就别管了。”

“可是抢救伤员是您的责任。”

“我对您讲过了，没有就是没有。”

史沫特莱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忿怒，她打开自己的行李，拿出一条毛毯，又从身上脱下大衣，盖到两个伤兵身上。军医官麻木不仁地冷笑两声，登船而去。

过了河，村子里家家关门闭户。史沫特莱一直生活在八路军中，她知道，要是八路军来了，老百姓就会开门迎接，把伤员抬进屋里去的；可现在来的是国民党军队，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风陵渡上这悲惨的一幕，使史沫特莱久久不能忘怀。

1938年1月9日，史沫特莱到达汉口。

在此以前，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军队在北平西南十余公里的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奋起反抗，揭开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序幕。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8月22日宣布西北主力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蒋介石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讲话。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成立。当时在汉口，全民一致抗日的气氛很浓，蒋介石政府对进步力量的压制稍有放松，警察特务的活动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少。1937年底发生的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使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把视点集中到了中国。第一，12月，中国首都南京沦陷，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使30多万无辜人民在法西斯的铁蹄下丧生；第二，国际瞩目的西班牙内战以佛朗哥反动政权的建立而宣告结束。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处于中心地带的汉口自然就成了到中国各个战场的外交家、外国记者和反法西斯战士的停留地和中转站。加拿大医生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前往晋察冀边区以前，在汉口停留过，荷兰进步电影制片人约里斯·伊文思来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厄尔·白劳德和弗兰克·卡普拉也来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刚刚从莫斯科来到了汉口。当时为汉口地区提供空中防卫的是苏联空军飞行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在一次对日本空军的空战中英勇牺牲，更把汉口的抗战气氛推向了高潮。

史沫特莱在这种激动人心的环境中变得更加精力充沛，她要充分地发挥一个非党的记者和政治活动家的作用。她作为八路军英勇抗战的见证人，一到汉口，就在许多进步团体的安排下，到处演讲，宣传八路军的战绩：

1月14日，她向汉口《新华日报》记者发表公开谈话；

1月23日，她应汉口青年记者协会的邀请，向中外记者介绍在八路军中采访的见闻，呼吁向前线提供援助；

1月28日，在中国妇女团体联合会为纪念淞沪抗战六周年举行的茶会上，用平型关大捷和阳明堡战斗的战例，证明中国抗战必胜，要求国民党政府吸取八路军的经验，实行全面抗战。

她还带着军用地图和八路军缴获的日本军刀和军大衣，在汉口德明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在美国海军基督教青年会和英国扬子江巡逻舰队的旗舰上，向中外记者和美英等国官兵作过演讲。

当年听过史沫特莱演讲的中国记者曹聚仁，1962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中回忆说：

她的报告，并不夸张八路军的兵力，或批评国共任何方面的短处。她只是描写八路军士兵的生活，反日抗战的精神。她结尾的话是，描写一个红小鬼，只有 15 岁，他在俯视冰天雪地的战场，横吹短笛，一片“起来……”歌声随之而起……

风陵渡悲惨的一幕，经常在汉口街头重演。

有一次，史沫特莱在长江边上见到三个重伤员，一个躺在地上，头部草地裹着绷带，绷带上沁出血迹，已经昏迷不醒，另外两个是腿上扎着绷带，拄着双拐，艰难地站着。史沫特莱不由得心里发痛，上前问道：

“你们需要帮助吗？”

“我们是在向日军发动的一次进攻中受伤的，这个弟兄的伤口已经化脓。我们要找医院。”

“前线没有医疗队吗？”

“没有，啥也没有，我们一挂彩，就撤下来了。”

史沫特莱马上叫来三辆黄包车，一个轻伤员扶着昏迷的重伤员共乘一辆，自己和另一位伤员各乘一辆，把伤兵送到医院去。她掏出钱来，要付车费，车夫无论如何也不肯收，拉上车掉头就跑了。这件事在汉口的车夫中一传十，十传百，都被这个他们不认识的蓝眼睛的外国女人的行为感动了。没几天，就有一大批黄包车夫自愿无偿运送伤兵。

过了几天，史沫特莱到医院去看那三个伤兵。那个昏迷不醒的重伤员已经死了。

“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了什么吗？”史沫特莱辛酸地问道。

“他姓吴，他一直昏迷不醒。”那个腿上受伤的老兵说，“先生，您救了我们，您真好，您贵姓？”

“我们会再见面的，”史沫特莱说，“祝你们早日康复。”

史沫特莱来到中国红十字会总部，找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大夫。林大夫是一位有才干的医学专家，他出生于新加坡，是一个基督教徒。他曾在苏格兰上中学，说一口苏格兰口音的流利英语。史沫特莱向林大夫介绍了八路军急需医药供应的情况，提出为八路军募捐改善医药供应的要求，林大夫非常同情。史沫特莱考虑到全国抗日军队同样需要医疗援助，她建议将受过教育和经过一定业务训练的青年招募到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林大夫表示同意。接着，在中国学生救国会召集的妇女指导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团体的联席会议上，史沫特莱号召青年们踊跃参加中国红十字医疗队，到军队中去做救护工作。她说：“这不仅仅是人道的问题，救护员增多可以提高士兵的勇气，增强士兵的斗志。而且知识青年到了军队，还可以增进士兵的知识。”她的动员得到了广大爱国知识青年的热烈响应，大家纷纷报名参加红十字会医疗队。他们之中有些人后来到了皖南新四军中，成为新四军战地救护的核心力量。

林可胜大夫为前线的医疗救护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直到史沫特莱离开汉口以后，林大夫仍然继续致力于改善军队医疗供应的工作，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43 年前后，他建立了一个医疗供应系统，在战地分设了 100 多个医疗单位，拥有 200 多辆救护车。在汉口他创办了一个医疗服务培训学校，后来转移到贵阳，在战地保存了五个分校，训练了 1.3 万多名医务人员。

史沫特莱为了争取国际力量对中国抗日的支援，与美国大使馆和英国大

使馆取得了联系。过去，史沫特莱在纽约和柏林投身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英国大使馆曾给史沫特莱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现在不同了，史沫特莱具有了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的特殊身份，西方外交家都愿意跟她往来，利用她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中介人。英国大使克拉克·克尔爵士是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外交家，他对史沫特莱提出的募捐要求很感兴趣，愿意帮忙。没过多久，他们就成了好朋友。克拉克·克尔一直是史沫特莱的事业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史沫特莱后来回到美国以后，他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史沫特莱在汉口住了十个月，她把大部分精力用于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宣传八路军的英勇事迹以及整个中国抗日军队所处的困境。她写了很多文章，发表在《曼彻斯特卫报》和《密勒氏评论报》上。这一系列报道，充分表现了这位记者和作家的勇气和才华。她的战地报道的质量赢得了国际的承认。1938年夏天，她正式被聘为《曼彻斯特卫报》的驻外记者。同时，她的新著《中国在反击》也即将出版。

史沫特莱的作品所反映的中国抗日军队的英勇奋战和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引起了世界各国反法西斯力量的关注。在美国，成立了以罗斯福总统的母亲萨拉·罗斯福为名誉会长的中国救援委员会，她通过宋庆龄把医疗用品送到八路军和游击队手中。

史沫特莱在汉口住在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教堂里，这里是当时汉口进步力量代表人物的聚会场所，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共产党人和许多中外进步人士，都来过这里。鲁茨主教和他的女儿弗兰西丝给史沫特莱安排了一个宽敞明亮而又安静的房间，让她静心写作。可是史沫特莱心里牵挂着缺医少药的前线士兵，怎么也坐不安稳；想起风陵渡上和汉口街头那一幕幕凄惨的景象，她常常禁不住流下眼泪。弗兰西丝对她说：汉口有钱的人很多，我们可以举行一个晚会，请他们给前方将士捐款。在一个周末的晚上，由鲁茨主教出面，请来了许多中外朋友。弗兰西丝弹奏了几首欢快的美国乐曲，客人们即兴表演，史沫特莱以激昂嘹亮的嗓音，唱了一首《最后关头》。接着，她向大家讲述了八路军和中国抗日将士的英勇斗争，请大家捐助，朋友们纷纷解囊。几天以后，史沫特莱来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把10300元捐款，交到当时正在汉口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手中。以后，又给各条战线的抗日士兵送去1000双手套、线袜和布鞋，还有1万元和300磅药品。

史沫特莱的募捐是成功的，她简直是无所畏惧，甚至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和行政院长孔祥熙都被她征服了。

在一次午餐会上，史沫特莱见到了宋子文。她单刀直入，问财政部长是否了解中国士兵的医疗救助实况，然后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中国士兵只能从饷金中得到极少的医药补助费；而在国民党的军队里，这点微薄的补助费还经常被长官们私吞。红十字委员们所得到的国外捐赠，又必须遵循国际捐赠者提出的条件，只救助难民，不向战斗者提供医药救护，中国士兵无法从中得到一点好处。前方士兵每分钟都在流血、死亡，忍受着伤痛的折磨。这一切，财政部长不会不知道。

史沫特莱侃侃而谈，毫无顾忌。宋子文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从来没有人敢于冲着他直言不讳。现在，他始而吃惊，继而羞愧，一个外国人如此热衷于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唤醒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未泯的良知，他捐出了一个大大数目：法币1万元。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邀请她的老同学孔祥熙共进晚餐。史沫特莱出席

作陪。她大胆地向孔祥熙募捐，大获成功。斯特朗在她编写的史沫特莱的传记中有一段生动的叙述：

在一次精致的宴会和泛泛的谈话中，史沫特莱突然打断了孔博士的话，要求他为在他的家乡山西同日本人作战的农民游击队捐一大笔款。安娜·路易斯窘得僵住了，她知道正像史沫特莱知道的一样，孔是共产党人的死敌。不出斯特朗所料，孔勃然大怒，他不允许为共产党八路军募捐。他说，他们应该满足于正规的军饷，不应要求额外的捐助。三个人都知道，孔的回答是不公平的，八路军的人数已是蒋介石支付军饷人数的两倍。史沫特莱不想引起争论，她辩解说，孔博士，我不是为八路军要求什么，他们当然对军饷是满意的。孔博士，我现在是为正在为保卫你的财产同日本人作战的山西农民游击队求援。史沫特莱拿着一张给山西游击队的巨额支票离开了宴会。斯特朗深感她与她的同住者（斯特朗也曾住在鲁茨主教的教堂里）之间的差异。她明白自己自幼受到的中产阶级的良好教育永远不会让她敢于提出这类要求。但史沫特莱是从来不承认不可能的。

斯特朗对史沫特莱的评价是中肯的，她确实不承认不可能，因为对她来说，中国的伤兵，饥饿的农民，过度劳累的苦力，都使她想起自己的苦难的父母兄弟。他们的苦难折磨着她，使她的心不能平静，她要用自己永不停息的奔波操劳去减轻他们的痛苦。所以，在汉口这几个月，她总是全身心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有时为了某件事办糟了而苦恼得不能自拔；一旦成功，又突然恢复活力，像一只打足了气的皮球，在房间里蹦蹦跳跳，唱着家乡的牛仔民歌：“那勇敢的小伙子把秋千荡，他飞在空中真漂亮……”

在汉口期间，史沫特莱定期从汉口坐救护车到长沙去，把救护车和医疗器械送到长沙。风尘仆仆，非常劳累，但还要在长沙进行募捐活动。当时给她当翻译的刘良模，在1950年写的《史沫特莱，中国人民之友》一书中回忆了她在长沙出席一次大规模的募捐活动的情况：

史沫特莱先是用平静的语调讲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情况和他们所取得的胜利，然后她热情澎湃，提高了嗓音，整个身体的姿势都改变了，她陈述了中国伤兵的困境和他们的紧急需求。最后她精疲力尽，突然坐了下来。会场里长时间鸦雀无声，之后人群骚动起来，大家开始踊跃捐款，募集到很大的一笔款子。这是长沙最成功的一次募捐。

1938年10月，印度医疗队到达汉口，史沫特莱负责迎接他们，设法把他们送到延安。那时候朱德已经回到延安。朱德亲切地迎接了印度朋友，为他们在王家峪安排了住处。

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五位印度医生都在自己的姓氏中加了一个“华”字。柯棣华、爱德华、巴苏华……他们对抗日根据地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他们想，印度和中国是两个命运相同的国家，可是为什么民族解放斗争的方式却不相同呢？他们问朱德。朱德笑了说，我们最初也走过弯路，是敌人的凶残和人民的鲜血使我们觉醒了，我们才搞起了武装斗争，用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我们的思想武器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 and 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认识了革命的前途，掌握了革命斗争的方法，才有了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人民一旦掌握了马列主义，他们的智慧和勇敢就无法估量。

印度朋友深受感动，他们立即奔赴战场，和八路军一起出生入死，进行

战地救护工作。柯棣华大夫在华北前线工作了五年，和一位中国女同志结了婚，生了一个男孩。1942年12月9日不幸牺牲。柯棣华大夫跟白求恩大夫一样，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1937年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宣言时，他在印度孟买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他毅然放弃了进入英国皇家医学会的考试，申请到中国服务，最后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延安各界举行的柯棣华大夫追悼会上，朱德同志宣读了祭文。朱德同志还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柯棣华大夫》的文章。柯棣华大夫安葬在河北唐县，墓碑上是朱德的题词：“生长在恒河之滨，战斗在晋察冀，国际主义医士之光，辉耀中印两大民族。”

印度医疗队的来华，是史沫特莱为中国抗日斗争作的一大贡献。她用自己的心血和操劳，把她所热爱的这两个大民族的解放斗争联系到了一起。

当时汉口的文化生活很活跃，著名作家老舍、史沫特莱在上海就认识的茅盾、诗人和学者郭沫若都在这里，年轻的周立波和卡尔逊一起从战区回来了。史沫特莱为汉口新出版的杂志写文章，跟中国作家一起聚会、交谈。史沫特莱对当时的中国革命文学所提出的见解是很精辟的。在《中国在反击》中，她写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的真正故事只能由中国工人和农民自己来讲述，但是今天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虽然我的同伴（指青年作家周立波和徐铨）是中国人，但我不相信他们能写出中国人民斗争的真实故事。他们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我一样，也远离人民大众的生活，他们中的徐铨首先对“风格”感兴趣。当你询问他某本书时，他首先告诉你的是这本书的风格，然后你才能从那里探出这本书的一些内容。立波感兴趣的是内容，这是真的。但他现在过的生活太艰苦了，常常太疲倦了，不能利用他的经验。我想，今后这样的生活将使他变得更加坚强。

1938年10月中旬，史沫特莱随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撤退到长沙。离开汉口前夕，周恩来同志在珞珈山上的寓所里会见了她。

时值深秋，满山火红的枫叶和苍松翠柏，显出旺盛的生命力。周恩来同志说：“我们中国有句名言，‘疾风知劲草’。您对中国革命的支援，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惟其如此，我们永远难以忘记。”

10月27日，汉口沦陷后的第三天上午，史沫特莱匆匆赶到八路军长沙办事处，询问周恩来的消息。办事处的同志说，周恩来同志是坚持到汉口沦陷的前一天才离开的。同时告诉她，新四军已经在皖南敌后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史沫特莱准备运送一批医药和医疗设备到那里去。办事处的同志同她一起就行动的路线和联系的方式进行了细致的安排。

10月29日，一辆载运药品的救护车驶出长沙，史沫特莱就坐在这辆车上到达皖南新四军根据地。从此，她在那里一边参加战地医疗工作，一边向世界报道新四军的战斗情况，直至1939年11月。

在汉口的十个月里，史沫特莱确实像朱德所预言的那样，作为一个非党的记者和作家，做了很多工作。后来她回忆这段日子，感到过得非常满意。她写道：

汉口的日子在我心里是罕有的，不寻常的。我迷恋汉口的魔力。我在中国这十年的生涯中，它是个美好的地方……从那以后，我反复思考：我是回到西方世界去，还是留在这里？恐怕我是必须留在中国了。

第十章 “外国妈妈”

1938年10月，汉口沦陷的前几天，史沫特莱乘坐一辆运送医疗用品的救护车到了长沙。长沙不是她打算长久停留的地方。史沫特莱必须决定她下一步将到哪里去。

有三个地点可供选择：第一，到重庆去；第二，经过香港回美国；第三，到华中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区根据地去。

第一条路很快就被否定了。重庆地处西南山区，远离战场，在那里很难从事给前线输送医疗物资的工作，当战地记者更是没有机会，而且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史沫特莱在那里肯定会受到蒋介石政府的种种刁难，行动将会受到限制，那里的政治气氛将会是令人窒息的。

第二条路她也不能走。她不愿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离开中国。从她与美国朋友的通信中知道，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抗日支持是很有节制的，因为美国的方针始终是避免以强硬的手段直接刺激日本，直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全面展开以后，美国仍然向日本大量输出钢铁和石油。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受到美国公众舆论的强烈谴责，美国人民是支持中国抗日的。回美国去，向美国人民宣传中国人民抗日的英勇事迹，号召美国人民用更多的实际行动支持中国抗日，不能说完全无所作为，但那毕竟是太间接了。即使身在八路军之中，史沫特莱尚且责备自己是中国人民的苦难的旁观者，回美国去不更成了真正的旁观者吗？再说，她父母早已去世，和弟妹们的关系也不那么亲密，缺乏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交流，况且他们都各自成家，独立生活了。史沫特莱在美国没有家，没牵没挂，她早就把自己生命的根移植到中国来了，中国就是她的家。1937年她在山西五台山朱德总司令的八路军总部度过的四个月，是她生活中最充实、最愉快，也是最有成就的时期，她尝试了写战地报道并且获得了成功。往后，她还计划和林可胜大夫联络，为新四军建立一个长期供应药品的运送网。

因此，决定走第三条路就是很自然的了。

周恩来同志也赞成史沫特莱的决定，就把她介绍给新四军的指挥员叶挺和项英，并让长沙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为她安排行程。

新四军原是由活动在从安庆到上海郊区长江下游山区的南方游击队改编成的。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到了这年秋季，新四军已有1.2万多名穿军装的战士。新四军成立以后，即分两路进入华中敌后，一路在江南，另一路在江北。江南部队当年6月进入京沪铁路两旁，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解放区。江北部队5月进入安徽省巢湖、无为、定远一带，建立了江北解放区。这就是华中抗日根据地。11月，史沫特莱到达的时候，新四军总部设在皖南芜湖以南的云岭。

史沫特莱跟一批游击队员和学生一起乘坐竹筏来到云岭，迎接她的有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新四军军医处负责人沈其震。

史沫特莱是新四军的贵宾，叶挺军长安排她住在军部教导总队，生活上给予特殊的照顾。按规定她可以以马代步，但她偏要和战士们一样，去什么地方都是靠两脚步行；按规定她应该吃小灶，但她总是和战士们一块儿吃大锅饭。她对战士们说：“我到这里以前，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廖磊请我吃饭，一桌上等酒席，全是山珍海味。但那是人民的血汗换来的，我吃不下去，新四军的大锅青菜饭，我吃起来心里舒服。”史沫特莱身体不好，有严重的胃

病，偶尔在老乡家里煮两个鸡蛋，也是自己掏钱。

沈其震陪同史沫特莱访问了长江以南新四军三个支队所属的 20 多个卫生队。

一个漆黑的夜晚，史沫特莱在一群战士的护送下去访问一所野战医院，步行了一夜，到医院时已是第二天黎明了。史沫特莱站在村前的土坡上，看到的是几家低矮的农家草房。

“这就是野战医院？”

“是的，这就是医院。”院长粟秀真解释说，“因为游击战争的特殊环境，医院要经常转移，所有设备都分散在民房里，病房也就是几个农家小院。”

“好吧，请领我到病房去。”

史沫特莱由院长陪同走进病房。她一眼就看到一个年轻护士正用竹筷子在一个粗瓷碗里夹起棉花给伤员换药。

“住手！”史沫特莱猛冲上前大声训斥：“你怎么能用这种东西？伤员会受到细菌感染，甚至死亡！你知道吗，如果他没有死于敌人的枪弹，而是死于你们的不负责任，我将请求朱德将军给你们以军法制裁！”

护士吓得脸都白了，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倒是那位伤员明白了史沫特莱的意思：“不，不，史沫特莱女士，您错怪她了，我们的护士很负责任。”他伸手指了指火炉上冒着腾腾热气的蒸笼。史沫特莱走过去揭开盖子，看到里面放着瓷碗和竹筷子，正在进行高温消毒。

“啊，对不起，姑娘，我错怪你了。”史沫特莱抱歉地搂着护士的肩膀说：“请继续工作吧。”

护士脸上绽开了天真的笑容。

史沫特莱看到这里的医疗条件差得叫人难以想象，药棉和绷带都是自制的，药品是医护人员从山上采集的草药，医疗器械非常缺乏。她激动地说：“只是到了这里，我才相信，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了奇迹！”

史沫特莱给《曼彻斯特卫报》和《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系列文章，详细反映了新四军的处境和对医药的需求，还写信给她的一些老朋友，如英国大使克拉克·克尔爵士、香港政府医务总监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美国分会。史沫特莱还巧妙地开辟了一条秘密的通讯渠道。1934 年她从上海短期回国在圣迪戈州立大学作过一次演讲，州立大学的教授哈利·斯坦梅茨成了她的热心听众，斯坦梅茨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在他家里，史沫特莱认识了他的父亲老哈利·H·斯坦梅茨。老斯坦梅茨是个医生，也是一位无线电收发报业余爱好者。史沫特莱回到中国后，开始通过斯坦梅茨父子向美国发送新闻和其他信息。她首先把需要发送的资料送给上海的一位美国医生米勒，他再交给一位银行家朋友，由这位朋友把资料寄到马尼拉，再从马尼拉由无线电收发报业余爱好者向在圣迪戈的斯坦梅茨的电台发报。根据哈利·斯坦梅茨在 1976 年的回忆，史沫特莱从 1938 年到 1939 年末，利用这条线路成功地为新四军从圣迪戈地区取得了经济援助。

访问了野战医院以后，史沫特莱就再也不肯住在军部了，她认为这样的优待会使她脱离群众。她是个作家，应该和战士生活在一起。她要求住在医院里，和护士们一起工作。

在医院里，史沫特莱把她的全部爱心和精力都献给了伤员。秋末冬初，皖南的天气已经相当寒冷，史沫特莱天不亮就起床，跑到山间田野，采来大束大束色彩鲜艳的野花，带着露珠和冰凌，带着大自然的生命气息。她把这

些野花分插到每个病房里她亲手用竹节做成的花瓶里。伤员们一睁开眼睛，就看到史沫特莱捧着花儿轻轻推门进来，脸上带着慈蔼的笑容。

“早上好，史沫特莱同志！”

同志，这是史沫特莱多么爱听的称呼啊，医院里大家都这么叫她。她说：“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是我忠于中国。也许你们会感到奇怪吧？是的，让我告诉你们：我到过很多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不知是什么缘故，在这里，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的一员，我仿佛已经生根在这块土地上了。”

是的，如果说当年她来到中国时，还只是一个个人奋斗者，革命人道主义者，那么，经过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洗礼，现在她已经是一个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国际主义战士，一个非党的共产党人了。她为什么不能享受“同志”这个既严肃又充满温情的称呼呢！

史沫特莱以火一般的热情关怀着周围的同志。她知道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镜我同志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吃什么吐什么，营养严重缺乏，瘦得不成形，心里十分着急。她打听到鹿茸精可以治好这种病，过了不久，她竟出人意外地弄来了这种连想都不敢想得到的贵重药品。朱部长注射了鹿茸精，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后来才知道，是史沫特莱冒充传教士，历尽艰险亲自到南京买来的。

新四军政治部有个马夫，曾经参加过封建会道门组织“大刀会”，后来自动投奔了新四军，他的绰号就叫“大刀会”。“大刀会”长相奇特，头大嘴大脚大，人却矮得出奇。他非常能干，泥水、木工、编竹器，上山抓松鼠，下河捉甲鱼，全都在行，就是最怕学文化，说是一见了“黑蚂蚁”（文字）就全身痒不可耐。史沫特莱知道了“大刀会”的故事，很感兴趣，她给“大刀会”拍了一张照片，写了一篇生动感人的故事，登在报上。人们把报纸读给“大刀会”听了，他很受感动，从此不再害怕“黑蚂蚁”了。

史沫特莱热爱生活，她的周围常常围绕着歌声和笑声。她爱唱歌，学会了唱《游击队之歌》，当她用那种特别的异国腔调唱起“我们都是神枪手……”的时候，同志们都高兴得拍掌大笑。天气转暖，史沫特莱就带头下河游泳了。皖南山区里的小河，清澈见底，她是个游泳好手，仰泳、蛙泳都很熟练，还会那种大家没见过的蝶泳。有一次，史沫特莱仰面平躺在水面上，注视着蓝湛湛的天空，忽然好像是吓了一跳似的爬上岸来，飞快地撑开一把油布伞，躲在伞后面一动不动，原来副军长项英和两个战士从山坡小路上走过来了。他们从油布伞旁边走过，看到了藏头露尾的史沫特莱。两个战士首先笑出声来：“哈，你这老太婆！”正在游泳的战士们也都跟着哈哈大笑了。“老太婆”，这是同志们跟史沫特莱开玩笑时的称呼。这个称呼太随便，也不符合外国人的习惯，但史沫特莱听了非但不生气，还非常高兴，她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1939年，新四军和游击队已经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巩固的人民政权，成了日本人和蒋介石的一块共同的心病。日本法西斯不断地对抗日根据地狂轰滥炸，围剿扫荡。蒋介石正中下怀，巴不得借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的手，实现自己消灭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罪恶愿望。新四军的处境非常危险。史沫特莱不考虑个人安危，她身穿新四军军装，打着绑腿，脚下是一双麻绳编成的草鞋，军帽下面金黄色头发剪得像男人的一样短，一眼看去，她和新四军战士没有什么区别。沈其震领导下的医生护

士多来自上海和香港，空袭把他们吓得够呛。但史沫特莱好像不知道炮弹不长眼睛似的，一遇到空袭，就冲出去抢救伤员，敌机一扫射，她就扑在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员。在前线救护所里经常可以看到史沫特莱的身影，她运用在西安教会医院里学来的救护知识，给伤员洗涤、上药、包扎伤口。

按照国共两党签订的统一战线协议，国民党政府必须给新四军提供武器，而新四军只能从政府那里得到武器，不能自己制造。蒋介石提防着共产党增强军事力量，只在 1938 年按编制送来过武器，以后几乎没有补充过。为了给广大的游击队供应武器，新四军决定发展自己的兵工厂。有一次，史沫特莱参观了一座秘密兵工厂。工厂的负责人十分自豪地带领她参观，把自制的设备一件一件地给她介绍和解释。史沫特莱要求试验一下产品。她拿了一枝手枪和三发子弹到厂外，靶子挂在一棵树上，她熟练地装上子弹，抡起枪对准靶子开了火，三发三中。工厂负责人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没想到这位摇笔杆子的女记者竟是个神枪手！史沫特莱得意地笑着说：

“你们不知道，在我的家乡，就是蛮荒的美国西部，骑马打枪是很普通的本领；我还能骑在奔驰的马上射中目标呢。”

告别的时候，史沫特莱说：“我曾在美国和欧洲旅行，参观过许多地方的工厂，但我必须承认，从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工厂。这是举世无双的。”

1939 年秋天，在陈毅的领导下，新四军的一些主要部队开始渡过长江进入安徽省北部。史沫特莱跟随其中一支部队渡江。她在《中国的战歌》中详细描写了她在这次行军中的体验：

9 月 13 日，我们在—座高山上的破庙里作渡江前的最后一次休息。临睡前，我们登上最高峰，俯视十英里外闪闪发亮的大江。我们看到仿佛是一艘巡洋舰的黑色的家伙在溯江而上。我们可以看见西边被日本人占领的荻港上空升起一股黑烟。新四军教导总队教育长冯达飞指着山下平原上离江边大约五英里远的两个小镇说：“那是敌人的两个据点。今天夜晚，我们就要从它们中间穿过……”

浩荡的长江一步步接近。我们来到了为抵挡汛期洪水而用土筑的堤坝的坝顶上。两边都是黑沉沉的礁湖——疟蚊的孳生场所。这时，一个“叛徒”出现了：发红的半边月亮像气球一样从我们背后的山头升起，把橙色的光投给白色的堤堰和黑沉沉的礁湖。我可以看见我面前长长的队伍的一部分。我们低声咒骂着，开始加快步伐，甚至跑了起来。我们的挑夫喘着粗气有节奏地小跑着……

在岸边上了一条帆船，我们许多人都已精疲力竭。两名女护士的疟疾已发作了，几个小时，她们都把危险置之度外，平躺在舱面上，闭上眼睛，像死一样沉沉睡去。船尾的大橹开始咿呀作响，我们离开了岸边。不久，我们就航行在扬子江宽阔的胸脯上。江上笼罩着银白色的雾幛。一条奔腾的大江展现在我们眼前，像一片海洋。这里的宽度，按直线计算是五英里，但是从我们出航的渡口到我们将要登陆的村庄，实际上有 70 华里（约 23 英里）。

我们急切地凝视着黑乎乎的对岸和我们后面逐渐失去形影的房舍。那半个月亮已经升上中天，在水面上投下一条银色的长练。一片片浮云从月亮底下飘过；风，强劲而清爽，把船上用破布连缀成的大帆鼓得十分饱满，我们不禁欢呼起来。我们用眼睛向迷雾中探测，提防着敌人的兵舰；我们的耳朵也紧张地搜寻着是否有射击的声响……

北岸上的树林看得越来越清楚，树林那边是房屋。我们隐约看见那边江岸上背着步枪的哨兵模糊的身影。船一靠岸，我们就越过船舷跳下去，兴奋地奔向人群。全村的人都出

来了，在等候我们。一个身穿白色短褂长裤的男人走过来自我介绍，说是区长。

我们走进村子，在一块被朦胧的月光照得发白的宽阔平坦的打谷场上坐下来休息。十分钟后，第二艘船靠岸了。我们的队长冯达飞夸奖我们遵守纪律，说我们的表现比他预期的要好得多。

渡江成功，史沫特莱像个受表扬的小战士一样兴高采烈。她住在一栋简陋的农舍里。艰苦的战地生活和极端劳累的工作使史沫特莱的健康每况愈下，胃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她强忍着胃部的疼痛去走访战地医院，每天晚上坐在光线微弱的油灯下，一只手捂着胃部，一只手握笔疾书，往往要熬到东方发白，才躺下来稍微休息一会儿。她已经 47 岁，军旅生活在她晒成棕色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但那一双蓝灰色的眼睛依然充满着自信，洋溢着刚毅的神采。这段时间她最有影响的文章是参观金家寨前线医院后写给中国红十字会的长篇报告，她认为这是她看到过的最好的战地医院，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抗战的希望。

1939 年 12 月，史沫特莱转移到鄂豫边区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同行的是著名的《渔光曲》的词作者女作家安娥同志。挺进纵队的总部设在屹立在湖北省中北部的大洪山峰顶上的一座寺院里。寺院大门两边是一副对仗工整的楹联：“江东寥阔无双院，楚北天空第一峰。”这虽是前人对寺院的赞语，但借用以反映新四军挺进纵队所向无敌的气势，也是十分贴切的。

挺进纵队的指挥员李先念、朱理治、陈少敏和陶铸一一迎上前去，与史沫特莱和安娥握手，表示热烈的欢迎。

第二天，挺进纵队的全体指战员集会，欢迎史沫特莱和安娥。

“同志们，我们今天在这里集合，是为了欢迎两位杰出的客人。”纵队党委书记兼政委朱理治说，“第一位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她是著名的美国作家和记者，是我们伟大的朋友……”热烈的掌声还没有平息，史沫特莱急忙插话：“不，不，我不伟大，是中国共产党伟大，中国人民伟大。我不过是作为记者，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正义战争，真实地而不是夸大或贬低地传达给了世界人民而已。”

朱理治把安娥介绍给大家，大家热烈鼓掌，要她唱《渔光曲》。可是这位歌词作者不善唱歌，只好用浓重的上海口音唱了一小段京剧。

大洪山脉与随县、安陆、钟祥三县连成一片，山岭起伏，树多林密，有广阔的游击战争的回旋余地。东南俯瞰鄂中平原，扼制富水河和汉宜、宋应公路，对盘据武汉的日本侵略军形成钳制态势。李先念和陈少敏向史沫特莱介绍，新四军在鄂豫边区开展游击战，可以对武汉守敌形成战略包围，阻敌西进，防止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政府“以战迫降”，最终赶走侵略者，光复武汉，夺回失地。

“是的，”史沫特莱说：“在这里，一切奇迹都可能发生，我似乎觉得，中国的大地在颤抖，它将埋葬一切魔鬼。”

在豫鄂挺进纵队，史沫特莱很快就跟战士和根据地群众成了好朋友。她热爱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大家也热爱她。每天晚上，她的住处都集中着许许多多的人，有战士、有农民，更多的是全国各地投奔革命根据地的年轻知识分子，其中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当时 20 多岁的吴强，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新四军的文艺宣传工作。史沫特莱在上海时在鲁迅的感染下形成的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关心，使她对战地文艺十分感兴趣。

有一天晚上，史沫特莱看了一个国民党军队演出团体演的一幕短剧，剧中有一个情节，表现一个在中国出生和受教育的日本军官对中国抗日的同情。演出结束后，大家请史沫特莱上台讲几句话。史沫特莱对日本军官的情节很有意见，她坦率地说：

“表演是无可挑剔的，但是我反对把一个日本参谋官表现成中国人民的朋友。如果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为什么还要留在日本军队里？为什么还要上前线打仗？”

她刚说完，剧本的作者上台了，他说，他写的是真人真事，在安庆的战斗中，他确实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日本军官。接着，十多位观众争着上台发言。史沫特莱觉得这些亲身经历过战斗生活的战士、学生和老百姓都讲得很有水平，剧作者也表现愿意考虑他们的意见。有一位观众说，在任何一出戏里都不应该让敌人得到好处，不能有游击队失利的情节，要把敌人通通杀掉。剧作者不得不反驳了：“那是真实的吗？如果敌人总是死在舞台上，还有什么必要继续打仗？应该用事实真相唤起民众！”

看了这出戏，史沫特莱一直在想：日本军队里是否真的有反战的军官和士兵，自己发表的意见是否过于武断了？这个问题，她很快就找到了答案。

在一间临时用农村小学校改成的野战医院里，一排排用砖石和木板搭成的病床上，躺满了新四军的伤员。当他们知道有一个重伤的日本兵也躺在这里的时候，低沉的呻吟声立即变成了高亢的怒吼。几个伤势较轻的战士冲到日本兵床前，要打死这个在战场上杀害过自己的战友的日本人。

“对，快揍这东洋鬼子，揍死他！”伤员们的愤怒难以抑制，吼声越来越大。

这时候，一个头上扎着绷带的新四军军官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等一等，这家伙确实是一个可恨的法西斯强盗。但是，你们先听我说几句，我现在就把他的日记念给你们听。”这位军官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在日本留过学。他拿出一本沾满泥土和血迹的本子，声音低沉地念了起来：

“……堑壕里渗满了水，我昏沉地睡着了。我又梦见了美奈子。我究竟为了什么要被那一张红纸（指征兵通知书）召到中国来卖命？我要回不了家，年老的妈妈、孩子和那两亩水田，就全拜托你了……”

“我走的时候，淳子紧抱着我的腿，大声哭叫着，爸爸，你不能死，我不能没有爸爸呀！”

“叫儿子长大了安分种地，别当兵，千万，千万……”

“……村子里只有老人和孩子。我们挨家挨户地搜查，在一户农家我看见一个老太婆和她的孙子，两个人正躲在那里瑟瑟发抖。我没有料到，当我打着手势告诉老太婆，我也有这么大的孩子时，她松了一口气，给我倒了杯热茶……”

一屋子的人都沉默了，这个被迫到中国来打中国人的日本兵，竟然和新四军的大多数战士一样，是受苦的庄稼人，他本来可以好好在家里种地，是那些把他驱赶到中国来的人，把这个劳动者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敌人。

这个日本兵终于死去了，但他很幸运，在弥留时刻享受到了人道主义的照料。他被埋葬在医院后面的山上。

史沫特莱当时也在医院里，她默默地看着这一幕，深受感动。她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有不杀放下武器的敌人和伤兵的纪律。她记得有一次朱总司令曾因为战士枪杀日本伤兵而大发脾气，亲自订了“缴枪不杀”的纪律。当

时史沫特莱对这条纪律理解不透，现在，她才真正感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博大胸怀。正因为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这个斗争才具有化敌为友的伟大力量。

不久又送来了五个被俘的日本伤兵，其中一个非常年轻，只有十六七岁，后来知道他名叫伊藤武志。他浑身血肉模糊，衣服全都被血凝住了。史沫特莱想给他把衣服剥下来，小鬼子痛得直打滚。史沫特莱叫人弄来一盆温水，把伊藤整个人浸在盆里，轻轻地把衣服一片片地撕下来，然后用被单裹上，把他抱到床上，史沫特莱觉得自己是一个母亲，在给孩子洗澡。这完全是一个可怜的、不该对侵略战争负责的孩子。伊藤睁开眼睛，感动的泪水顺着脸颊流淌着。后来伊藤的伤好了，他就留在新四军里，帮助新四军对日军作反战宣传，教战士们学习简单的日语。他逢人便说史沫特莱像是他的母亲：“我当时就像躺在母亲怀里一样；就是亲生母亲，也不一定会这样细心地护理我呀！”

另外四名日本俘虏也治好了伤，接受了新四军的再教育，留下来为新四军工作。他们都只有20岁上下，最年轻的伊藤是个渔民，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职员，两个是工厂里的工人。史沫特莱给他们五个人拍了一张照片：他们坐在一张圆桌的周围，头发剪得很短，穿着新四军的棉布衬衣，脸上露出坦荡的笑容。史沫特莱看到在美国出版的一份支持中国抗日的杂志《今日中国》，担任编辑顾问的是一位侨居美国的日本进步女作家，叫石垣绫子。史沫特莱就让五个日本俘虏给石垣绫子写信，寄照片。五个人在信中写道：“请原谅我们唐突地给在美国的你写信。虽说我们是俘虏，但我们正自由地和新四军战士生活在一起，度过紧张的每一天。我们每天的工作是学习如何向日军作反战宣传和教新四军战士学习日语。我们得知同是日本人的你正在美国从事着反战活动，备感亲切。祝你身体健康，顽强奋斗。我们也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干。”

史沫特莱救护和改造日本俘虏的事迹很快在根据地军民中流传开来。她由衷地为这件工作的成功而高兴，因为这是她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联系起来的一次尝试。她也想起了不久前看的那出引起争论的短剧，其中的情节确实有一定的真实性。

到了1940年3月，史沫特莱的健康情况更加恶化，不仅胃病日益严重，胆囊也出现了病变，非做手术不可了。李先念劝她离开战区到重庆去，可以在那里恢复健康，担负起向全世界报道华中地区的抗日形势的任务。史沫特莱知道她不得不走了，她实在舍不得离开新四军，在即将告别的时候，她的千丝万缕的感情牵挂集中到一个朝夕相伴的十岁左右的“红小鬼”身上，她希望能够带走这个孩子。

孩子名叫沈国华，是一个充当史沫特莱的勤务兵的小鬼。史沫特莱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全部母性的温柔和爱意的寄托。她把他抱在两膝之间，为他钉好上衣的纽扣，为他捉拿衣服上的虱子。小鬼对她也无限依恋，称她“我的妈妈”。他向那些从未见过外国人的小镇居民自豪地介绍他的外国妈妈：“她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她为我们救死扶伤。在丁家镇，她发现了一个伤兵，她喂他吃东西，给他洗澡，甚至帮他解手。”“你们看看她那只缠着绷带的手，是她给伤兵洗澡，端起一锅开水时，烫成这个样子的。”“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你们谁要是有病，她准给治好。”

游击队被日军追赶得到处转移的时候，小国华紧紧跟着史沫特莱，寸步

不离。有一次，黑夜里行军，小国华把史沫特莱跟丢了。他一边哭着，一边四处找寻。这是多么美好、多么真挚感人的母子深情。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写了一章，描写“我的中国儿子”。战后，海明威选编战时优秀短篇小说集《在最后胜利之后》，特别欣赏史沫特莱的这一章“我的中国儿子”，把它收入他编的集子中。

史沫特莱向李先念提出要收养国华，李先念叫她说说理由。其实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她多么爱这个孩子，她多么需要有一个亲人。但她打算把理由说得有根有据。她就说，这孩子读书特别聪明，有一种科学秉赋，具体说吧，他会在夜间凭星斗辨别方向，会观察刮风下雪的预兆，还懂得虱子的习性。一个靠在门边的战士听了笑起来，说，国华会做的事每个农村孩子都会做，而关于虱子的学问，他相信自己比国华渊博很多，史沫特莱是不是把他也收养了？说得大家都笑了。最后，李先念说，好吧，你可以收养这个孩子，只要你愿意，他自己也愿意。

可是，小国华不同意跟史沫特莱走，不是他不爱他的外国妈妈，是他舍不得离开新四军，他要留在队伍里打日本鬼子。他对史沫特莱说：“我愿意跟你走，但要等到抗战胜利以后。”

史沫特莱伤心地离开了新四军，离开了她的中国儿子，向西南方向长途跋涉到了宜昌，然后乘船逆长江而上，到了重庆。

重庆地处长江和嘉陵江会合处的山丘之中，风景十分优美，但城市建筑很凌乱，许多房屋都是用竹子和泥土筑成的。这样的房子在城南的丘陵地上连成了一片。重庆是西南地区工业和贸易的中心。冬季，重庆浓雾弥漫，遮天蔽日，是躲避日本空军轰炸的理想条件。可是天气一暖，大雾消散，万里晴空，日本法西斯就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起来，江河上常常可以看到顺流漂下的尸体。

在国民党政府严密的思想钳制之下，重庆的政治气氛很沉闷，史沫特莱几乎找不到可以交往的中国朋友。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邹韬奋，在史沫特莱到来之前就飞到香港避难去了。

史沫特莱在重庆孤单寂寞地度过了三个月。6月，林可胜医生从贵阳的医药培训中心来到重庆，史沫特莱的健康情况使他大吃一惊，他坚持史沫特莱必须跟他一起到贵阳，休养一段时间，再转到香港去动手术。两个人乘坐一辆老式救护车，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路颠簸到了贵阳。在贵阳，史沫特莱又闲不住了，她在都匀关的军医院里当林医生的助手，晚上熬夜写作。都匀关医院经常遭到日军的轰炸，伤员们的伤还没有好，又在轰炸中再次受伤。有一次林医生捡来一块炸弹碎片，对史沫特莱说：“我真想用这些弹片制造一批特殊的勋章，授给那些出售钢铁给日本的美国厂商。”作为一个美国人的史沫特莱听了只有沉默不语。

8月26日，史沫特莱在桂林登上一架邮政飞机飞往香港。香港是英国的直辖殖民地，因此，可以说史沫特莱是第一次踏上了英国的土地。从早年史沫特莱开始致力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起，她的一举一动就受到英国政府的密切注意。这次她一下飞机，就被港英政府扣留起来。第二天就进行了审讯，穿长袍戴假发的法官追问她来香港的目的，担心她煽动在香港的印度人叛乱，还指控她是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史沫特莱勇敢地为自己辩护，加上她的朋友、英国大使克拉克·克尔爵士和香港医务总监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的帮助，史沫特莱才没有被港英政府驱逐出境。

史沫特莱被送进玛丽皇后医院作胆囊检查，不久就做了手术。在她手术后疗养恢复期间，中国大陆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

1940年，德国法西斯在欧洲的侵略势力发展到了顶点。4月，占领了丹麦，5月，进攻英吉利海峡，6月，攻陷巴黎，法国投降了，8月入侵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德意日三国建立了联盟。日本眼见德国横行欧洲，企图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便和德意遥相呼应，进攻苏联。为此，日本加紧了国民党政府的诱降。蒋介石认为形势对他有利，可以在日本的配合下消灭共产党。同时，蒋介石把共产党的顾全大局视为软弱可欺，于是，迫不及待地吧反共阴谋付诸行动。

1940年10月，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致电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一律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当即向全国人民揭露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阴谋。但为了避免统一战线的破裂，仍然同意让新四军的一部分开赴长江以北。当新四军军部和所属一个支队约一万人在1941年1月4日开始向北移动的时候，中途遭到早已埋伏的八万多国民党军队的突然包围袭击。全体指战员英勇战斗了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除1000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分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阵亡。国民党随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这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

躺在病床上的史沫特莱知道了皖南事变的消息，非常震惊，更为自己爱莫能助而难过。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封锁消息，向全世界传播他们的一面之词，污蔑新四军发动叛变。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急于揭露事件的真相，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当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正在重庆，这个任务就由她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起来。几经周折，她的报道终于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斯特朗回纽约时经过香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没有去看望史沫特莱。史沫特莱自认为是最了解新四军的外国记者，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但她竟在新四军遇到如此重大的挫折时无所作为，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久久地笼罩在她的心头。

还有不少事情使史沫特莱心情压抑，心理上失去平衡。她得知林可胜医生在贵阳因为曾与她亲密合作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她的好友，年轻的女作家萧红的死更使她伤心。萧红1940年逃难到香港，患着严重的肺结核，史沫特莱和茅盾夫妇帮助她住进了玛丽皇后医院，没有多久她就去世了。萧红死时只有28岁。

史沫特莱确信自己留在中国已经无事可做了，而且健康一直未能恢复，她只好决定回美国去。1941年5月，她登上了开往加利福尼亚的一艘挪威货船。船上只有几位乘客，其中三位连希特勒是谁都不知道的美籍修女。史沫特莱孤单地面对着茫茫大海，走向那不可知的未来。

第十一章 中国问题专家

1940年前后，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踏遍了大半个欧洲，准备入侵苏联。在亚洲，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力量酝酿着远东危机，加紧进行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用三个手段来对付中国，迅速实现消灭中国的武装力量，占领整个中国广大土地的目的，以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与德国法西斯遥相配合，打击苏联。这三个手段，首先是集中力量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其二，加紧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诱降，并利用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与日寇的军事进攻配合，消灭真正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其三，扶持汉奸傀儡政权，1940年11月，东京宣布承认汪精卫的伪政权为“中国真正的政府”。为了称霸世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缔结了军事同盟。与此同时斯大林和罗斯福也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支持中国的抗战，让中国牵制日本，是阻止日本扩张的最佳途径。美国和苏联都意识到，一旦中国发生内战，日本军队就会迅速打败中国，同时向东南亚大举进犯。他们急于想办法弥合中国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在此以前，斯大林认为把战略援助物资交给国民党军队更能达到牵制日本军事力量的目的，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抗日游击队有点不屑一顾的味道；蒋介石接受了苏联的援助，对进攻抗日根据地有所顾忌，更不敢触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根据地延安。美国政府在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以后，给了中国政府1亿美元的贷款；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贷款一到手，蒋介石国民党就发动了旨在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皖南事变。

虽然罗斯福政府里很少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值得给予援助，但既然要向美国公民宣传中国的统一战线已经弥合，就须要修饰共产党人的形象，因此也就需要一批熟悉中国共产党人又不是美国共产党员的权威人士出来向美国人客观地介绍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在美国，能够起这样的作用的人并不多，新闻记者中被蒋介石冠以“外国反蒋集团”美誉的只有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史沫特莱，还有一位在史沫特莱之后到中国去一边当英语教师，一边当专栏记者，争取成为“艾格尼丝第二”的30多岁的女记者佩蒂·格雷厄姆；军人方面，只有埃文斯·卡尔逊、约瑟夫·史迪威和弗兰克·多恩，总数不过20多人，而其中最熟悉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抗日军队的战斗生活有过切身体验的当然是史沫特莱了。因此，史沫特莱这个时候回到美国，应该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41年5月下旬，史沫特莱回到了洛杉矶。从她1920年底离开纽约去德国柏林算起，除了1934年短暂回国以外，她离开美国已经21年了。其中的12年，是和中国人民一起度过的，现在除了对中国革命的深切了解和对中国人民深厚的感情的体验大大地丰富了她的内心世界以外，她依然一无所有，身无分文。她回到美国，首先要解决的依然是基本生活问题。健康问题更使她感到困扰，在中国解放区的长期军旅生活，使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胆囊病虽然经过了治疗，但严重的胃病，未愈的背伤和损坏得差不多了的牙齿仍然使她苦恼。但是，在史沫特莱身上却看不出病人的孱弱的样子。49岁的饱经艰苦磨练的她，个子高高的，身架子很粗壮，脸庞线条清晰，双眼皮下大大的蓝灰色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眼光既柔和又亲切，笑的时候，眼角显出细密的皱纹。脸部线条体现出坚强的意志，充满着生命的活力。环境与意志力量相互作用形成人的性格，对史沫特莱来说，确实是这样。

在中国的时候，史沫特莱曾经和她的前夫厄恩斯特·布伦丁和他的太太埃莉诺通信，请他们给找个住的地方。他们同意她到家里暂住。史沫特莱一到洛杉矶，就径直到了市郊蒙塔别罗镇的布伦丁家。

史沫特莱和厄恩斯特离婚 25 年了，但一直保持着友谊。史沫特莱这次要在厄恩斯特和埃莉诺面前当个好客人，她干家务活，给主人和孩子们讲中国游击队的战斗故事。她为人坦率，笑声爽朗，说话抑扬顿挫，毫不矫饰，更不装腔作势，但有时候也会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任性，发脾气，使埃莉诺觉得难受。

史沫特莱在美国成了一位为中国奋斗的宣传者，她自信自己代表着中国的进步力量，代表着延安和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那样的领导人。她认为自己对中国的形势是有分析的，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而不是像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那样成为一名指定的发言人。她要促进美国支持中国抗日，与中国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事实上，她已经成为一位中国问题的权威人士，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

史沫特莱回国只有一个星期，就被邀请到波莫纳大学教师俱乐部去作演讲。那天下午，厄恩斯特和埃莉诺开车送她去。在俱乐部的演讲台上，她热情洋溢地讲了三个多钟头，她的演说内容客观，措词尖锐，充满感染力。她说：

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民主的力量，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战，他们认为任何（与日本的）和谈均属卖国。但是他们并非中国惟一的进步力量，他们的军队也并非惟一的战斗部队。而我以前确曾认为如此，我支持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纲领——将封建的中国变为初步民主的中国。

她预言美国不久将被迫和日本直接交锋。她敦促美国政府停止向日本供应战争物资。最后，她激动地呼吁美国政府给予正在英勇战斗的中国人民以更大的支持和援助。

听众热烈鼓掌，情绪激昂。史沫特莱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史沫特莱已经有过无数次的演讲经历，但对美国的学术界演讲，这还是第一次。演讲之前，她一直很紧张，害怕自己讲不好，现在获得了成功，史沫特莱兴奋得有点忘形了。

由于紧张，她不让厄恩斯特和埃莉诺听她的演讲，只是请他们在汽车里等着。他们开车送她回家。深夜，在一条偏僻的路上汽车因为缺油抛了锚。史沫特莱的情绪依然在极度兴奋中，她发火了，说厄恩斯特是笨蛋，居然让汽车没了油。她要他马上想办法去叫一部出租汽车来，以免破坏她今晚的胜利情绪。厄恩斯特没有理会她的颐指气使，走下汽车，和埃莉诺一起步行去找汽油。埃莉诺一直不明白厄恩斯特为什么当初要离开史沫特莱而又长期跟她保持这么亲密的朋友关系，现在她明白了，艾格尼丝的性格使他和她之间的关系，只能停留在朋友的水平上。艾格尼丝个性太突出，她的热情会使她身边的人连呼吸都感到困难；她的魅力却能够使了解她的人都成为她的好朋友，包括埃莉诺自己，这个豁达大度温顺善良的女人。

史沫特莱越来越热衷于演说，在远离中国战场以后，她对中国的眷恋也越来越深切了，她要把所有的讲坛都变成宣传中国，呼吁美国政府人民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阵地，甚至包括教会的圣坛。史沫特莱是个无神论者，从未

皈依过任何宗教，但一旦受到邀请，她也会站到牧师布道的圣坛上，讲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英勇事迹，讲述他们怎样同时对日寇和蒋介石军队两个敌人艰苦作战。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她穿上黑色的法衣，站在高高的圣坛上，以关于八路军的话题代替牧师的说教。她有点害羞地对她的朋友说：“我知道我穿上法衣一定很滑稽，但是我讲得非常认真。”

还有一次更精彩的演讲是在 1943 年，当时史沫特莱已经离开洛杉矶来到纽约，会见了长期旅居美国的石垣绫子。史沫特莱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曾让她救护过的留下来为新四军工作的五名日本战俘写信给在美国的一位反战刊物的女编辑，她就是石垣绫子。现在这两位国籍不同、肤色相异的妇女见了面，发现彼此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很快就成了亲密的朋友。石垣绫子为史沫特莱的热情、才华和坚强的意志所倾倒，是她的演说最热心的听众。她在一本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史沫特莱和林语堂的一次辩论的过程：

我常去听艾格尼丝的演讲……第二次是在城市大厅的讨论会上，对手是著名的中国作家林语堂。1934 年以来林博士一直住在美国。事隔多年，他重返中国，成了一名站在蒋帮一边的反共人士，最近刚刚回到美国。继优秀作品《吾土与吾民》之后，他陆续地写了一些畅销书……

城市大厅讨论会是通过全美广播网播放的大规模讨论会，总是以“时事问题”为题，由持不同主张的“时事人物”进行面对面的大辩论，所以非常受欢迎。站在宽敞的舞台上的艾格尼丝把手背在身后，在话筒周围走来走去，挺着胸膛，挥舞着双手，拿着话筒好像是要倾到听众中去一样热烈讲演。当她抨击封锁解放区、不打日军而专打共产党军队的蒋介石一伙时，她的语言像炮弹似地射向林博士。

我们坐得比较靠前，以有点担心的心情紧紧地盯着她那激烈的表情，好像毛发都一根根地倒竖起来。她全身热血沸腾，怒斥林博士。他想以拿手的幽默诙谐来抵挡艾格尼丝刺向他的尖刀，但他的语言是那样的软弱无力，仅能听到声音而已。他这个小个子，脸色苍白，呆立不动，而艾格尼丝却变成了一团燃烧的火球，几乎要把对手烧死。当林将孤立的共产党和得到美国优良武器支援的重庆加以比较时，她跳起来喊道：

“请吧，请你们随便去捞武器援助吧，哪怕多一辆坦克我也表示欢迎。共产党军队就是在夺取了重庆军队的现代化装备以后，同日军和重庆军队两个敌人作战的，共产党方面已经有言在先，那就是今后也将从敌人手里取得武器供应。”

听众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声援艾格尼丝。

史沫特莱与林语堂的这次辩论，把被美国人民视为英雄的蒋介石的政权的镀金层剥落了，美国人开始知道蒋介石脱离人民，处于黑暗和危机之中。

1941 年 6 月 22 日，希特勒德国不宣而战，突然进攻苏联。战争在不利于苏联军队的条件下开始。德军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就占领了苏联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土，包括顿巴斯矿业中心在内的乌克兰的大部分，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全部，围困列宁格勒，威胁首都莫斯科。在亚洲，日本法西斯急忙配合，1941 年 11 月 29 日，日本总理声称英美必须从亚洲退出去。12 月日本时间 8 日凌晨 3 时 25 分，美国东部时间 7 日下午 1 点，日本同样是不宣而战，袭击了珍珠港一带的美国海军基地，击毁了好几艘美国的主力舰。于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美国和日本正式直接交战，史沫特莱在波莫纳大学演讲时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在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仅仅几个小时，美国政府和人民已经融合成一

股巨大的迎战的洪流，这股洪流把美国人心那种战争可能不会在美日之间发生的侥幸心理冲刷得干干净净。城市里原有的宁静气氛无影无踪，完全被一种极度兴奋的情绪所代替。街道上一下子装上了无数的扩音器，反复播放着号召士兵们迅速归队的通知：“ 1941年9月，史沫特莱组织了一个由政界、宗教界、商界、学术界和新闻界参加的洛杉矶援华委员会，经常在委员会的赞助下到各处演讲。这段时间她的生活来源，靠的是演讲所得的微薄报酬和出版商为《中国的战歌》预付的稿酬。她打算暂时结束演讲，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继续写完《中国的战歌》和构思新的作品，她离开布伦丁家以后一直住在斯坦梅茨为她找的好莱坞瑟尔玛街的临时住处。她的一位朋友格拉迪斯·考德威尔在加利福尼亚的奥加衣紧靠圣巴巴拉东边的丛山中有一间夏季度假小屋，她愿意把这间小屋提供给史沫特莱住下来安心写书。史沫特莱高兴极了。可是，就在这时候，太平洋战争发生了，突然改变了史沫特莱的生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几天，史沫特莱在她的日记中简单而潦草地记下了她的行动：

12月7日，日本袭击了珍珠港，全国为之震惊。整个城市一片漆黑。我参加了街道巡逻。谣言说有人看见50架日本飞机飞经旧金山市上空。

12月8日，在洛杉矶市政厅集会上发言，讲解中国的形势。

12月10日，在当地外贸协会上发言两小时斥责商人们给日本提供了武器装备。提到日本人已袭击香港和在菲律宾登陆。

12月16日，华纳兄弟电影制片公司前来接洽把《中国的战歌》拍成电影的事。

12月29日，代表“为自由而战”委员会在广播电台讲话。

大半生不平凡的经历使史沫特莱思维敏锐，洞察力极强，其基础是对亚洲被压迫人民的深刻的了解和对西方国家政治的深入研究。为什么日本能够如此迅速地在东南亚发展自己的势力？史沫特莱有自己精辟的见解，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文明的核心里有一个正在露出来的溃疡。这个溃疡就是我们自认为白种人优越，命定要统治有色人种。日本人正将这一信念打得粉碎，并将它淹没在我们自己的血泊里。他们呼吁所征服的亚洲人民抓住这一历史时机，把白种人赶出去。

事实上，缅甸人正在积极地帮助日本人，为的是要从白人的统治下解脱出来，他们被白种人统治得够了，因此对肤色相同的日本存在幻想，认为他们有可能比白种人要好一些，多次被英国人监禁过的孟加拉民族主义者钱德拉·博斯也打算求助于日本人，因此孟加拉必将是继缅甸之后倒下去的另一张多米诺骨牌。当然，大多数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懂得，要是把英国的枷锁换成日本的枷锁，他们必将一无所获。

在美国与日本正式开战的情况下，史沫特莱仍然没有忘记中国，她坚决主张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中国看作一个平等的盟友，给予全力的支援。她的演说越来越受欢迎，她名声大振，充满信心地相信自己的观点能够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

直到1942年2月，局势稍稍平静下来，史沫特莱才到奥加衣的山间小屋

里住下来，安心地继续从事写作。

奥加衣位于洛杉矶以东的一片丘陵之上，是一个由疏疏落落的、各具特色的夏季小屋组成的小镇。史沫特莱的小屋非常雅致，坐落在一片广阔的山谷地的西面，屋后是长着密密的塔松的不高的群山，屋前是一片广阔的坡地。坡地的坡度平缓地逐渐向东倾斜，在坡地的最低处，是一条不很宽的乡间公路，公路以东流淌着一条清澈的小河，过了小河，再往东走，地势又逐渐升高，又可以登上东面的群山了。沿着公路往南，群山逐渐收拢，坡地越来越狭窄，公路在山间蜿蜒，小河的流水也变得湍急了。到了这里就可以看到山间的小盆地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葡萄园。山里阳光充足，成熟的葡萄散发着清新气味。史沫特莱站在小屋前的台阶上，遥望着铺满绿油油的青草、点缀着各种颜色的烂漫山花的谷地，体验到一种激战之后获得休息时的轻松和舒畅。她情不自禁地把眼前的景色和她少年时代生活的中西部作比较，这里没有中西部那种贫瘠粗犷、黄土弥漫的景象，这里太平洋柔润的风轻轻吹拂，一切都使人感到宁静安适。

邻居泰勒一家很快就成了史沫特莱的好朋友，这一家的主人是约翰·泰勒和他的妻子艾诺，还有个小女儿，艾诺的母亲埃尔维拉也跟他们住在一起。埃尔维拉是个按摩师，史沫特莱在伏案写作之余，经常来找埃尔维拉按摩，以消除背部的疼痛。约翰是个教师，夫妻俩都只有20多岁，他们像孩子似的好奇地听史沫特莱讲中国游击队的故事。艾诺后来回忆说，她和艾格尼丝的友谊是她有生以来最富于激情的友谊。艾诺是个年轻的家庭主妇，史沫特莱劝她每天读读《国会记录》，关心国家的事情，不要“一头扎进尿布盆子里”，变得生活枯燥，语言无味。她还跟艾诺谈起自己的两次婚姻经历和曾经有过的不止一位情人。过去的婚姻生活使她感到困扰，使她产生了“婚姻是一切罪恶之源”的过激的观点，她认为造成妇女种种不幸的根源是现存的婚姻制度。她是不能在一种固有的秩序中生活的，这种固有的秩序使她感到自己是受到压迫。但是现在她明白了，性放纵只是一种很消极的办法。在延安的时候，她认为延安的女干部过的是极端的清教徒式的生活，于是她用自己的办法对这种生活进行冲击，而现在，她反对的是另一种极端。她预言，在未来的更加合理的社会里，一定会有一种健康的婚姻制度，以保障建立在真正的爱情的基础之上的两性关系。

年轻的约翰和艾诺对史沫特莱的观点持保留态度。直到史沫特莱离开了奥加衣，他们的讨论仍在继续。1943年1月27日史沫特莱在纽约给艾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年轻时过着的是怎样令人憎恶的生活啊！我怎么就没有遇见过一个我可以为之骄傲的、可以让我宣称‘我和他睡过觉’的男人！我只能爬到某个角落里，独自羞愧地去沉思这些事。萧伯纳说得对，性生活是人类感情之中最短暂、最不可靠的了，只有当它和最深沉的友谊、热情联系在一起，才能使人容忍。

泰勒夫妇认为史沫特莱很像卡桑德拉，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中的那位女先知。太阳神阿波罗爱上了她，给了她预测未来的能力，但她拒绝了他的爱，阿波罗一怒之下，让世人不相信她的预言，作为对她的惩罚，于是她就成了这样的一个人：永远能预知即将来临的灾难，却没有能力去改变它。史沫特莱就是像卡桑德拉这样的预言家。

在奥加衣，许多老朋友都来看望史沫特莱，最使她激动的是索伯格·布伦丁的来访。史沫特莱只是1934年回纽约的时候见过索伯格一面，以后就再没有相聚过。索伯格已经和哈伯曼离了婚，嫁给了一位东欧的知识分子，住在纽约州的一个农场里。现在她坐火车到加州来探望弟弟厄恩斯特，和厄恩斯特全家开车到奥加衣来看望她过去的弟媳妇艾格尼丝。

奥加衣的和谐的气氛非常有利于史沫特莱的写作。《中国的战歌》一章一节地从她的打字机下缓缓地流出。华纳兄弟电影制片公司的一位导演看了初稿，对这部作品很感兴趣，表示愿意把它改编为电影。纽约的克诺夫出版公司已经答应出版这本书，只要作最后的润色，书就可以面世。史沫特莱对自己的成就感到很满意。1942年10月上旬，她离开奥加衣，皮箱里装着即将完成的手稿和仅有的400元钱，前往纽约。

在从加利福尼亚到纽约的火车上，跟史沫特莱同一个车厢的有士兵、有农民、有白人也有黑人，他们是最具有美国风格的普通人。他们一路上无拘无束地谈天、争论、互相取笑，高唱着牛仔歌曲和各自家乡的民歌。史沫特莱也跟他们一起放声歌唱起来，觉得又回到了久别的家乡，跟家乡的庄稼汉和矿工在一起。她很久没有过这样愉快的经历了，她觉得正是这些人代表了美国的历史和美国的乐观精神，他们使史沫特莱有了信心。

一到纽约，史沫特莱面临着的就是她经常遭到的经济窘迫的问题。她在城北公园和河畔路之间找了一所二三流的公寓，每周租金40元，只有一个房间，厨房和淋浴器在房间的一头，床在另一头。她必须把她的一系列文章拿到报刊上去发表，换取稿费维持生活。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把这些文章卖掉。

为了在纽约作为一个作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得到社会的承认，史沫特莱经常参加出版界俱乐部的各种聚会。出版商和业主们穿着讲究，装束入时，而史沫特莱随随便便地穿着一套半旧的灰色西装，白衬衣的领子露在上衣领子外面，披着一件普普通通的雪花呢大衣，谁也不去注意她，不把她当一回事。有一次一个报道远东的记者走过来，问了她一句很不像话的话：“对我说老实话，你和英国驻中国大使克拉克·克尔是情侣么？”史沫特莱好像从教堂的捐款盘子里偷了一便士被人抓住似的，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但她装作无所谓的样子：“我想也许我忘记了，但是我真的很清楚我确实没有过。”后来克诺夫夫人把史沫特莱介绍给《生活——时代》和《幸福》杂志的出版者业主亨利·卢斯。亨利·卢斯是个传教士的儿子，出生在中国，他生活中最大的愿望是要把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卢斯赞美蒋介石，认为他是一个传奇的英雄，中国有史以来最能干的统治者，他不允许有人批评蒋介石，最主要的是蒋介石皈依了基督教，是个虔诚的信徒。

亨利·卢斯代表着美国大企业家的观点，这些企业家甚至对日本抱有幻想，史沫特莱在给艾诺的信中这样写道：

很多大企业和军事人员认为应该和日本讲和……（因为）他们说中国可能会变成共产党国家，然后和苏联一起“威胁”世界。他们把日本当做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而且说战争开始前，日本是美国最好的顾客。有一点他们忘记了：决定一切的是日本，而如果日本战胜，美国商人将不得不爬行到日本军靴前面去乞求能得到出售一点值不了多少钱的小商品的权利。不管怎么说，世界正处在很糟糕的地步。而美国是最缺乏准备的国家，不会从将出现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前景去思考问题。

事实上，史沫特莱当时的观点的核心是认为美国战时政策的关键是必须使政府和美国中产阶级接受中国的统一战线，这就涉及到对美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三方面的认识的问题。应该说，史沫特莱对罗斯福政府是有信心的；而对国民党的反动腐朽的认识是充分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因为实现统一战线的最大障碍正是国民党的这种反动性和腐朽性；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军队，史沫特莱是毫无保留地支持，衷心地加以赞美。史沫特莱认为这样的观点已经算是保持低姿态的，她不想现在就去宣传关于战后的社会主义世界的问题，虽然她相信这一定会成为现实。可惜这种观点，当时美国仍然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左的方面，也就是美国共产党，认为她对美国资产阶级政府过于宽容，右的势力则认为她批判蒋介石过于激烈，对中国劳苦大众——他们甚至用“黄祸”这个字眼——的抗日力量估计过高。因此史沫特莱的政治处境是为左右两方所拒，处在比较孤立的地位。

卢斯很想弄清楚史沫特莱的政治见解。史沫特莱在给艾诺的信中幽默地形容这些既想了解她又不愿接触她的政治观点的人们的神态。其中一位是亲法西斯的《文摘》杂志的总编辑帕尔默：“他不时让我想起在利比亚的英国士兵。那些士兵不往沙漠里拨动探测地雷的棍子是不往前进的。所以帕尔默也是手里拿着棍子很小心地到处拨弄着走到我面前来的，否则他怕触雷，怕把他炸掉。”

就在史沫特莱与出版商们就是否应该批判蒋介石或者批判的程度应该如何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轰动美国的大事：1943年3月，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来到了美国。她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游说美国国会增加对华援助。美国官方把宋美龄当作中国抗日力量的代表，给予了热烈的欢迎。她应邀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说时，议员们全体起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美国议会如此厚待一位外国客人是很罕见的。她声泪俱下地诉说着日本法西斯的暴行，中国民众的悲惨遭遇，呼吁美国向中国提供救援款项。宋美龄的演讲感动了许多普通的美国人，她此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蒋介石很快就将到手的美国救援款项用于进攻抗日根据地，消灭共产党的抗日军队。普通美国人对此了解得很少，还真的以为美国的救援款项对中国的抗日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宋美龄的穷奢极欲不顾国难当头，疯狂地满足个人私欲的行为，在美国却人人皆知。宋美龄回国时，购买了一座山一般的在中国买不到的奢侈品，其中有用最高级的毛皮制造的六件不同款式的大衣，镶宝石的各种手表，一辈子都用不完的化妆品、香水，穿不完的内衣。为了运送这批物品，美国专门派了一架运输机，经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运到重庆。飞越喜马拉雅山是空中的难关，是为了给中国运送战略物资而专门开辟的一条航线，许多美国飞行员为此献出了生命。宋美龄这批物资到印度转机的时候，从一个碰开的箱子里滚出许多化妆品来。美国飞行员大为惊讶，索性把所有箱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毛皮大衣、钻石手表，各种精致物品散落一地。士兵们愤怒已极，不停地用脚踩踏这些要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运输的奢侈品。当美国中产阶级还在顾虑着要不要批评蒋介石的时候，美国士兵已经用自己朴素的行动狠狠地否定了蒋介石。

史沫特莱知道了这件事，大笑着欢呼道：“痛快！痛快！”随即写文章对宋美龄的美国之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史沫特莱的文章发表在1943年11月3日的《民族》杂志上，是一篇火气很盛的文章。在宋美龄离开美国前，《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位姓崔的作

者的文章,对宋美龄吹捧得无以复加,称蒋夫人是“每一名中国伤兵的母亲”,她“从来没有为现代纽约的奢华和表面的光彩所俘虏”,她生活简朴,穿着像“一个单纯、谦虚的中国妻子,与那些跟中国的高贵传统十分不相称的时髦、轻薄的新鲜玩意儿绝缘。”史沫特莱可找到一个靶子了,她针锋相对,用嬉笑怒骂的口吻,幽默的笔调,把宋美龄狠狠地讽刺了一顿。她写道:

崔先生恐怕把那几个宋氏姐妹弄错了,他的描述可以适用于孙中山夫人,但从来不能适用于蒋夫人。翡翠和金刚钻,水獭和黑貂皮大衣,丝绸和缎子并不是简朴和普通的生活,是和中国的士兵及普通人的艰苦生活完全不协调的。

宋美龄恼羞成怒,通过给她写传记的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对史沫特莱发动攻击,说,将永远不允许史沫特莱再到中国去。

史沫特莱坚决拒绝别人删改她的文章,也不肯迎合出版商的口味不去批判蒋介石,她坚信,必须让读者知道事实的真相。她的文章依然是那样具有不容置疑的真实性,而且观点尖锐,措词锋利,个性色彩非常浓厚。史沫特莱的文章一篇篇地给退了回来,反复修改,编辑们仍不满意,害怕史沫特莱的文章会使美国读者震惊。有个刊物的编辑干脆叫史沫特莱迎合层次低级读者的口味。

“告诉我们日本人怎样强奸的。我们喜欢听强奸。”那个编辑对史沫特莱说。于是史沫特莱除了写别的之外,也写了强奸。写她在中国战区所知道的:有一次大约 15 个日本兵结伙去强奸一个妇女,直到那个妇女被折磨致死。还有的妇女在被侮辱以后发了疯,有的日本兵残忍地把被强奸的妇女杀死。史沫特莱没有像有些美国人喜欢的那样把强奸写得很过瘾,她在文章中愤怒地揭露了日军的兽行。这是中国人民的血泪仇,不能让某些庸俗无知的凉血者用来寻开心。

史沫特莱多年来政治上的天真幼稚逐渐减退了,她学会了怎样去认识政治辞令背后的现实,视野越来越开阔了。她的成熟就像一系列同心圆逐渐扩张开来那样,但在那圆心里,她还是原来的她。

在纽约,史沫特莱最尊敬的朋友是 J.B. 鲍威尔,他乘坐一艘瑞典船从香港回到美国。在香港,他被日本人俘虏过,受到残酷的折磨,双脚残废了。史沫特莱在医院里陪伴他度过 1943 年元旦,细心地照料他。在香港,他跟史沫特莱一样是新闻记者,他没来得及在香港沦陷之前离开。日本人把他列入了政治敌人名单。这名单里也有史沫特莱,要是她没离开香港,等待着她的命运和鲍威尔的命运是一样的。鲍威尔的身体非常虚弱,但他要在史沫特莱的协助下写一本书,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暴行。

史沫特莱还结识了她仰慕已久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家刘易斯·甘尼特。甘尼特了解到史沫特莱对戏剧很感兴趣,建议她以在中国的经历写一个剧本,史沫特莱很高兴地答应了。

史沫特莱在经济条件极其艰苦、精神压力极其沉重的条件下继续完成《中国的战歌》的写作。1943 年 1 月 4 日,手稿终于完成,她把书交给克诺夫出版社,出版社给了她确切的答复,5 月份就可以出版了。

第十二章 撰写《朱德传》

史沫特莱在纽约卖文为生的打算未能实现，演说的微薄收入成了她生活的惟一来源。经济上重新陷入困境，身心也处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中国的战歌》虽然已经修改润色完成，但下一步的创作计划却无从实现。她必须设法改变生活的环境。

索伯格·布伦丁在纽约以北的纽派尔兹有一个家庭农场，索伯格叫史沫特莱住到那里去。史沫特莱很高兴地同意了。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史沫特莱，本来就是大自然的女儿，她对农业劳动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眷恋之情。一到纽派尔兹，她就放手在田野上大干起来。看到果树在她的培养下开花、结果，小鸡在她的照料下孵化出壳，她感到无限喜悦。她每天的主要工作除了照管果树，还要把成千只鸡蛋分类，包装起来。正当这位过去的弟媳妇干得挺欢的时候，索伯格却认为她自己已经干够了，经常跑到纽约去逛大街，史沫特莱把全部农活都包揽了起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史沫特莱只去过一次纽约，是应邀到军队电台作短波广播，讲中国抗日军队怎样与日本法西斯军队艰苦作战。广播结束后，军队演奏中国抗日军队进行曲。然后她到格林尼治村看了露天的当代抽象艺术展览。抽象艺术作品使她困惑不解，她说，我不属于这个艺术世界，我仅仅是个农业劳动者。回到纽派尔兹，她又热心地干起了农活。她在农场里一共干了四个月，到七月初，她开始考虑离开纽派尔兹，找一人能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来从事新的创作的地方。她在纽约曾应她的好朋友评论家甘尼特的要求写一个剧本，她已经有了初步的构思，打算写一位中国官员在抗日战争中面临各种政治抉择的剧本。

在纽约北面的萨拉托加斯普林斯郊外纽约温泉附近，汽车约走三四个小时路程的地方，有一个名雅都的山庄，是已经去世大约50年的一个富豪的大宅邸，现在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成了公共组织的财产。由基金会资助，邀请文学、美术、音乐界的名流到山庄去免费度假、创作，成为有名的创作、休养基地。史沫特莱的老朋友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劝史沫特莱向基金会提出申请，出版家克诺夫也从中帮忙，史沫特莱被接受了。1943年7月，她高兴地搬到雅都山庄住下。

8月，史沫特莱在给艾诺·泰勒的信中是这样描写雅都山庄的。

这里有说不尽的美……这片领地里有一片大湖，为其上的森林投下的阴影所遮盖。大厦前面，在一棵高大的挪威云杉的树影里，有一座宏伟的喷水池……大厦的建筑具有一种奇特的混合风格，但其主体和罗马尼亚皇宫的格调一致。我们每人在大厦里都有一个房间，有些人的卧室还附有工作间。松林里还有很多小木屋，散在各处。有些人占有这些木屋，我就有一间谷仓，改装成工作间了。

史沫特莱住的这幢两层的小木屋，位于庄园里一个比较偏僻的角落，因为长期没人居住，房子周围尽是荒草石砾。史沫特莱找来一把铁锹，把房子周围的土翻松，除去杂草，铲去石砾，又找来肥沃的泥土换上，然后撒上各种各样的花籽。过了不久，屋子四周就成了一个大花圃。工作空闲的时候，她就给花浇水、除草。花开了，闪闪发光的露珠在花瓣的柔柔的绒毛上滚来滚去。在距离小木屋稍远的地方，她还开辟了一小块菜地，种上黄瓜和西红

柿。她喜欢摆弄土地，种蔬菜很在行。在延安的时候，她就在自己住的窑洞前面的一小块黄土地上，收获了不少美味的西红柿，使八路军干部的家属们又羡慕又佩服。史沫特莱生活喜欢整洁，她不能容忍屋子里的东西乱堆乱放，书桌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连窗帘也取下来洗净熨平。在楼上书房正面的墙上，端端正正地挂着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像。毛泽东光泽的脸上，一双慈祥的眼睛，眼神亲切、机敏而自信，表现出他坚强的意志；朱德脸膛黧黑，平易近人，像个农村老大爷，宽宽的鼻头，一笑起来就得更宽了，他的神情稳重而有幽默感；周恩来与朱德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型的美男子，独特的浓眉下，一双大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

史沫特莱坐在书房里，默默地凝视着这三位伟大人物的照片，在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战斗生活一幕幕地重现在脑海中，她动笔写那个初步构思好了的以中国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剧本。

雅都山庄的生活既严肃又轻松愉快，和史沫特莱一起住在那儿的还有 12 位作家、艺术家。和史沫特莱最要好的是两位黑人，女诗人玛格丽特·沃克和剧作家朗斯顿·休斯。沃克是第一位受邀请入住雅都山庄的黑人女作家，她感到许多白人作家好像有意避开她，而史沫特莱毫无种族偏见，和她亲密相处。休斯是史沫特莱的老朋友，过去他们在苏联和中国都见过面。他的一出历史题材的大型剧作曾在麦迪逊花园剧场以 250 名演员的巨大阵容露天演出，这是一部反映黑人种族史的大型歌舞剧。史沫特莱正在为自己的剧本写得不够满意而苦恼，特别羡慕休斯的才华。最使史沫特莱激动的是她在这里又见到了过去的好朋友，丹麦女作家卡琳·米凯利斯，她的祖国已经陷入纳粹的铁蹄之下，她是作为难民逃出来的。负责雅都山庄的日常管理工作的是基金会主任伊丽莎白·埃姆斯夫人。战时美国物资匮乏，她尽了最大的努力使雅都山庄的住客们生活得舒适满意，并且严格保证从清晨到下午四时享有绝对的安静。在这段时间里，作家艺术家们各自躲到自己喜欢的地方，从事文艺创作。午餐很简单，匆匆吃过就各自离开；晚餐比较丰盛，气氛也热闹，大家可以边吃边谈，一直到很晚才打着手电筒回住处。

最有意思的是定期举行的鸡尾酒会。由每位住客轮流作主人。有一次轮到史沫特莱开鸡尾酒会，她把气氛搞得非常热烈，大家喝了许多马丁尼酒，都醉醺醺的。酒会进行到一半，广播里传来了墨索里尼下台的消息，于是大家又喝了几杯。史沫特莱给艾诺的信中生动地描写了这次酒会的情景：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彻底的酩酊大醉了！我想这次我那庸俗的本性发作了。这酒会实在是尽情放肆的场合。由于我们白天只吃了一点点午饭，酒会是下午五点半举行的，只喝了那么一点酒就足以上到耳根了……酒会举行到一半，广播里传来墨索里尼下台的消息。这使每个人又多喝了一两杯鸡尾酒。对于墨索里尼和新上任的总理，我是不让自己那么兴奋的……我看不出由一个流氓取代另一个流氓能有多少意义。

史沫特莱在雅都还接待了中国来访者，女作家赛珍珠向她介绍了当时在美国的中国女演员王莹。王莹使史沫特莱想起了在延安给她当翻译的吴莉莉，她同时又是一个很好的话剧演员，想起了延安的戏剧界朋友和新四军的游击队剧团。她把王莹当作写剧本的主要顾问。她认为要把剧本写得有真情实感，要探讨很多问题。她向王莹提出了这些问题：两个已婚的中国知识分子之间要是产生了爱情，他们将会怎样表达？如果一位年轻的中国军官被一

名外国妇女所吸引，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他们的爱情能有希望吗？史沫特莱请王莹和她的未婚夫谢和赓一起探讨这些问题。后来王莹在几封信里详细地给予了答复，对史沫特莱的构思很有帮助。但史沫特莱总觉得自己缺乏写好一个剧本的文学素养，她决定停下笔来，跟剧作家伦纳德·埃利希合作，等他从美军通讯队退役后继续写。

1943年9月《中国的战歌》终于出版了，在纽约的书店里销路很好。正式出版那天，电台两次播放了访问史沫特莱的节目。朋友们为她举行小型宴会。《纽约时报》、《论坛报》、《新闻周报》最初的书评都是极为肯定的。史沫特莱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但是，对史沫特莱书中的观点有异议的人还是不少的。最有代表性的是史沫特莱的一位在上海时期认识的朋友、女记者格雷斯·库克。她是一位力求把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和母亲的职责结合起来的有志气的妇女，她认为史沫特莱过分强调了妇女必须为社会做贡献的一面，对想当一个普通的妻子和母亲的妇女表示了“透骨的轻蔑”。她写道：

我该对辛西娅（格雷斯的女儿）说些什么呢，艾格尼丝？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领袖人物，但你为我们这些普通妇女设计了什么活动方案？你憎恶自己儿时没受到成人照顾，你对孩子们抱有很深的温情。该让国家抚育他们吗？即使那样也会有类似你“从来没有予以赞同”的性关系问题的。我们该用什么来取代婚姻以繁衍世界人口呢？或者说用不着，那么，又何以费事来拯救世界呢？

史沫特莱理解格雷斯·库克，认为她提出的问题具有关键性。她回答道：

格雷斯，你带着讽刺说为人之妻不可能把孩子扔下，像我那样跑到八路军那里去……但是，军队里有很多已婚妇女，在战火地带里我见到无数妻子和母亲，她们在尽母亲的职责时，也是在打破妨碍女性本身发展的镣铐……

对于新一代的人来说，会有一天克尽母性的职责被认为是值得保护的工作——但是总的来说，那也只不过是公民义务里的一项工作而已。

1943年10月，史沫特莱在纽约附近的大学作巡回演说，首先在斯基德莫尔大学，她形象地描绘中国人民怎样与力量悬殊的日本人作斗争，怎样英勇牺牲，她要求听众去检验美国的对华政策里是否有种族主义。大学的校报《斯基德莫尔新闻》评论道：“根据经验，我们可以告诉你们，她（的演说）比一场富于刺激性的电影还要令人感到震颤，比本地出产的沃顿啤酒还要令人陶醉。”12月史沫特莱又开始了第二次巡回演说，这次是到南方的乔治亚州。

史沫特莱在南方，看到南方黑人处境十分悲惨，他们的人格处处受到污辱，这激起了史沫特莱的怒火。有一次史沫特莱去乘公共汽车，汽车靠站时，大雨倾盆，司机喝令站上的十多个黑人后退，让两名漂亮的白种妇女先上车。两人上车后，司机朝她们看了一眼，从她们的肤色和头发的颜色看出了她们血管里有黑色人种的血。司机一拍大腿，笑着对白人乘客嚷道：“这不是闹笑话吗？我以为她们是白的，原来她们也是黑鬼！”那两名妇女和车上所有的有色人种乘客都气得愣住了，史沫特莱也气愣了。几个白人乘客放肆地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候一个坐着的北方白人士兵指着身边的空座，让一名黑人

士兵挨着自己坐下。黑人士兵坐下了。司机狂怒起来，猛地刹住车，对黑人士兵大喝一声：“黑鬼，站起来！”那黑人士兵站了起来，白人士兵骂了一句：“真见鬼！”随即也站了起来。司机气得拳头发痒，可是没敢动手，因为那白人是个穿军服的；如果是个平民，那真要闹得不可开交了。史沫特莱看着这一幕，怒火中烧，她真想去扇那司机两个耳光，甚至把他杀死。她想，也许耶稣基督看了可以忍受，但是我却不能。可是她什么也没干，因为白人曾经警告过她，在美国南方，这种场面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一个白人万一要有什么抗议行为的话，最终只能使黑人遭更大的罪。史沫特莱为不能有所表示而憎恨自己，觉得自己成了一名人类的叛徒。

史沫特莱在南方一所黑人大学里演讲，一位白人妇女留她住宿，她谈到这所大学里的黑人时说：“这里的黑人挺好，一点也不闹事，行为端正。”言外之意，是说黑人一般总是要“闹事”的，而且行为也“不端正”。

回到雅都山庄以后，史沫特莱不再保持沉默了，她满腔义愤，她感到南方黑人需要她的帮助，就像她一贯为之贡献力量的外国民族解放运动需要她一样。路易斯安那州一位妇女发起为“有色人种”开办图书馆。史沫特莱和纽约、洛杉矶的在图书馆工作的朋友联系，给她寄去许多书籍，并在报刊上发出呼吁，发表文章，有一篇文章刊登在《洛杉矶论坛报》上，标题为《白人作家对南方偏见的义愤》，文章结尾说：“我们不能把人当作狗来对待，而又期待他们具有人的行为。”

史沫特莱反对种族主义的言行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乔治亚州的众议院议员约翰·S·吉布森把史沫特莱的活动和自己的异议记录到“众议院记录”里，把史沫特莱的言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建议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他给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中这样说：“以前我提请众议院注意有那么一个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对南方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她是好几本表现共产党光荣和伟大事业的书的作者……她是《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的作者，该书以炫耀的语言描写红军怎样在革命中和非白人一起去打败白种人。她描写了共产主义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这位议员把中国革命理解为“非白人打败白种人”。在美国，特别是在美国南方，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联邦调查局接受了吉布森的建议。

1944年9月，联邦调查局把跟踪史沫特莱的任务交给了雅都山庄的总管伊丽莎白·埃姆斯夫人，要她提供她可能替史沫特莱打印的各种演讲或通信的副本，并随时报告史沫特莱的行动。埃姆斯夫人是史沫特莱的好朋友，她有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完成到何种程度，就不得而知了。

1944年夏天，雅都山庄很安静，原来住在这里的许多人都已经离开了，大楼已经关闭，只有三四楼小木屋里住着人。史沫特莱开始写作《伟大的道路》。她要把这部作品写成一部伟大的史诗，她要倾注全部心血和热情，为朱德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红军之父雕塑一座生动的雕像，要写一部活的中国红军发展史。总之，她用一句典型的中国语言来说，要写成一部“史家之绝唱”。她首先描写了红军的诞生和成长。她写道：

许多农民死里逃生，带着血红的眼睛精疲力尽地投奔朱德。有些人为自己的儿女兄弟的死亡而痛哭，有些人用充满仇恨的声音说道：“我要拼命！”朱德眯起眼睛仔细听了他们的遭遇，转过头来对旁边年轻的指挥员说道：“发枪给他们，一边行军一边训练。”像任何真理一样朴素，红军就是这样产生、壮大的，这也就是工农红军不可战胜的基本原因。

接着她描写了朱德的形象：

身高大约五英尺八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微微隆起，颊骨也很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很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

史沫特莱以她非凡的记者的笔触从各个方面——军事家、党的鼓动家、红军的缔造者——描述朱德的功绩，描写他怎样指挥战斗，怎样分化瓦解敌人，怎样和战士、群众亲密相处，谈笑风生，写他怎样在古田会议上发言，透辟地分析判断局势。总之，要写出一个完整的革命领袖的形象。她不是把朱德将军作为一个偶像来描写，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他的性格、爱好、语言习惯等方面展示他的内在气质，这种内在气质必须和他特有的热情、幽默忠厚、质朴奇妙地溶合在一起。

写着，写着，史沫特莱又好像回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好像又和八路军战士在一起行军，一起吃着大锅煮的青菜饭，和朱德将军一起坐在延安的窑洞里彻夜长谈，就着一盏小油灯飞快地作着记录。她是多么希望用自己的笔让全世界的人认识朱德，认识中国革命军队和革命人民啊！写着写着，她觉出了这项最有意义的工作同时又是多么困难，材料不足，艺术形式上也觉得很难把握。她要始终严格遵守纪实文学的真实性原则，决不加以违背事实的想象和虚构。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她不仅要掌握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还要从事大量的研究工作，目的是要使书中所写的一切都符合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情况，甚至连书中涉及的每一个历史事件的日期都要准确无误。史沫特莱还要尽力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有些古板的学者认为，“在历史学的领域内，美学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史沫特莱不赞成这种看法。她认为历史是科学的，传记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写传记，既要有真实而科学的历史背景，又要有实地采访得来的生活资料，这两者的紧密结合就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也就是西方称为“新新闻体”的手法。她呕心沥血，写得越来越费劲。她给艾诺的信中描写了当时的心情：“作家总是感到要写的东西很棘手——一个对自己作品满意的作家，是大家应谨防的人。我真希望自己不曾出生于人世为好。”

史沫特莱决定写信向朱德求助。她等了几个月，终于收到了朱德的回信。朱德在信中向史沫特莱告之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进展的消息，延安的八路军处境虽然仍然很艰苦，但已经收复了1941年、1942年被日军侵占的土地。陕甘宁边区农业和纺织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边区人民的生活也过得比史沫特莱在那儿的时候好了一些。随后，他在信中说：

我很感激地了解到，你想花费一些精力写我的生平。应当说，我的生平仅仅反映了中国农民和士兵生活的非常少的部分。是否值得你花时间，我表示怀疑。由于你那样坚持并已着手写作，我也只能应你所求。随函附上尚未发表的刘白羽先生所写的《朱德》的部分草稿、《长征》故事两卷以及我从抗日战争到目前为止的部分写作。倘需其他材料，我将乐于照办。

史沫特莱拆开朱德寄来的大包裹，里面除了资料和手稿以外，还有用宣纸搓成纸条装订在一起的，朱德亲手用毛笔写成的小传，她还惊喜地发现了嵌着朱德和毛泽东肖像的小别针，一块丝织的披肩，这是延安妇女手织的。史沫特莱把两个小别针用天鹅绒托着，摆放在壁炉架上，细心地欣赏着那块精致的丝织披肩，一会儿把它披在肩上，一会儿把它握在手里。和延安人民朝夕相处的日子仿佛又出现在眼前，史沫特莱心里涌起了无尽的怀念。

朱德对史沫特莱讲过，他童年时代生活的村子周围全是楠木林，他从小就是在楠木林里长大的。史沫特莱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到南方演说的时候就向朋友要了一小束楠木枝，小心翼翼地把它带回雅都，用一个花瓶插上，摆在壁炉架上，旁边摆着朱德从延安寄来的礼物。在这样一种具有浓浓的中国气息的环境中，她文思泉涌，继续写作《伟大的道路》。

她非常惜时，夜以继日的伏案写作，一刻也闲不住。丁玲曾经说过：“史沫特莱是一位很勤奋的作家，悠闲同她无缘。”但是只要遇到有意义的、她认为必须去管的事情，她又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她曾放下写作去四处募捐，以便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委员会来救助中国的文化工作者。另外，她还不断地与她的忘年好友，年轻的艾诺·泰勒通信，鼓励她要找个工，不要只当家庭妇女。后来艾诺在一间工厂里当了工人，写信告诉她说，厂里的女工拒绝参加工会。史沫特莱很生气地回信道：

如果没有工会，她们就只能挣到一条狗都挣得到的工资，如果她们生活不错，那是因为曾有那么工会人员的战斗，受了几十年的苦才成为现实的。你们那里的女工应该去看看德国工人，或者是中国工人。他们是不能有任何类型的独立工会的。每天工作总是长达16小时。1925—1927年间，当革命给工人带来成立工会的权利时，曾有一个短时期他们每天工作10小时。有几个强大的工会获得了8小时工作的权利。反动力量摧毁工会后……又恢复老样子，工人只能赚取刚够生活、还能继续为雇主活下去并为他工作的那么一点工资……

在史沫特莱的影响下，艾诺成了一位工会积极分子。

1945年夏季的一天，雅都山庄的草地在太阳的照耀下散发出芬芳的气息，和煦的风轻轻吹拂着。史沫特莱早早起了床，头上裹着头巾，腰里系着围裙，看上去像个农村的家庭主妇。她用力地擦拭着小木屋楼上楼下的窗子，把褥子搬到房前的草地上晾晒，房后边系着的铁丝上晾着几条毛毯。

史沫特莱花了三天的时间把屋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作了一次大扫除，她干得风风火火，兴高采烈，因为她要迎接一位尊贵的客人——参加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十人代表团中仅有的一位共产党代表董必武。

大会结束以后，董必武在美国旅行访问了三个月，8月份到雅都会见史沫特莱。

为了迎接远方来客，史沫特莱每天都十分忙碌，她大汗淋漓地骑着自行车到斯普林斯镇和萨拉托加的其他市镇一家一家地在食品商店里寻找、选购备餐的材料。一切准备就绪，史沫特莱静静地、虔诚地等待着董必武的到来。

8月的一个晴朗的日子，董必武来到了雅都山庄，作为陪客的还有史沫特莱的日本好友女作家石垣绫子和荣太郎夫妇。

董必武生于1886年，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共产党员，1913年因反对袁世凯而逃亡日本，曾与孙中山先生一起从事革命活动。他是经历了历史性的二

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史沫特莱第一次见到董必武是在西安事变的时候，他作为谈判代表随周恩来飞来西安。1937年她在延安时，董必武也在那里，两人上一次见面是在1940年史沫特莱经过重庆时。他是一位斗士，又是一位诗人。他年近60，稳重大方，脸上浮现着温和的微笑，是给年轻人讲有趣的战斗故事的“董老”。史沫特莱觉得他有点像中国画中的人物，具有古风盎然的神韵，是一位使人一看就觉得亲切的宽厚长者。

董必武到来的那一天，史沫特莱花了半天时间为他做了一道用鸡肉做的中国菜。史沫特莱会做中国菜，这还是在上海学的。她做菜像做一件极为严肃的大事一样，专心致志，一丝不苟，她站在一口大锅面前，往锅里添加调料，再用汤匙尝试味道，享受着亲手做出可口菜肴的乐趣。可是这一天她偏偏感到有点遗憾：“今天做的稍微有点焦，真糟糕！”

董必武极有兴味地品尝了史沫特莱做的中国菜，赞不绝口：一个外国人能做到这样，真是太了不起了，这该是一个对中国生活方式多么熟悉的外国人呀！

史沫特莱请董必武讲红军长征，他讲了一段关于红军翻越长年积雪的夹金山的故事。

……要是你途中坐下来休息，就会死在那里。我们在途中发觉有人横卧路旁，抓住他的脚一看，那人早已冻死了。那里是一万六千英尺的高山，空气稀薄，气温骤降的时候，冻得人直想吐，手、嘴唇也都冻成了紫色……

讲过长征的故事以后，董必武又用流畅的笔体书写了一首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的诗，赠给殷勤的主人。董必武说：“19世纪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一场农民的战斗，中国农民就像攀登陡峭悬崖的猿猴一样，即使受伤跌落下来，还要爬起来继续向上攀登。今天我们的革命斗争也是一样。”

董必武在雅都山庄逗留了三天，准备离去的那天下午，大家坐在沿松林山丘蔓延的草地上，董必武的年轻秘书红着脸给大家唱了一首描写离情别意的中国民歌。他唱完以后，史沫特莱站起来，唱了一首她喜爱的美国民歌《啊，我的祖国》。

史沫特莱从小爱唱歌，她的歌声轻柔而富有感情。在延安的时候，她是以能歌善舞闻名的。也许是继承了她那爱唱歌跳舞的父亲的秉赋，一首歌只要听上一遍，她就能唱出来。在雅都山庄，当晚霞映红了山峦和松林的时候，她总爱独自一人来到摆着风琴的房间，浅弹低唱，直到太阳落了山，才回到自己的屋子里。现在中美两个民族的优美民歌旋律在荡漾，这格调迥异的乐韵，诉说人类共同的愿望：和平、安宁、爱情和幸福。

董必武离开以后的8月6日早晨，石垣绫子和荣太郎夫妇在雅都做客，史沫特莱和他们夫妇在早餐桌旁，漫不经心地翻看着《纽约时报》，猛然看见报纸在头版用了半版的篇幅登载了广岛上空升起的巨大蘑菇云的照片，餐厅的广播播出杜鲁门总统的声明，说在广岛投下的是原子弹。几个人顿时大吃一惊，谁也说不出话来。过了许久，埃姆斯夫人搂着绫子的肩膀，俯在她身上轻声说道：“你的心情我理解，我作为一个美国人也为投掷原子弹而深感羞愧，我没脸见你们这些日本人了。”埃姆斯夫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寡妇，结婚才三个月丈夫就战死在沙场上。

美国人对投掷原子弹的反应是各种各样的。善意的人们和正义感的宗教人士出于人道主义立场谴责投掷原子弹；抱有美国至上主义爱国精神的人们高兴地说：“这下可解决大问题了，可以不用再牺牲将士的生命去结束战争了。”还有一些左派人士，认为投掷原子弹是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虽然造成悲剧，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史沫特莱对美国投掷原子弹置日本普通人民于地狱的烈焰中的做法感到震惊。她知道，爱因斯坦等科学家曾向杜鲁门总统发出过反对使用原子弹的呼吁。罗斯福总统要是活着的话，他是会尊重科学家们的意见的。但自从罗斯福总统4月12日猝然逝世以后，新上任的杜鲁门总统的政府迅速向右转，反共倾向越来越明显，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是为了达到战后美国掌握世界霸权的目的的一个手段。实际上，当时日本的两个盟友意大利和德国都已经战败投降。在东方，中国的抗日武装力量已经收复了1941年1942年沦陷的大片土地，日本投降是大势所趋，即使不使用这种新式的杀人武器，日本的战败也只是个早晚的问题。美国之所以投掷原子弹，是为了向全世界表明，自己在对日作战中付出最多，对打败日本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国。不仅如此，美国还要从时间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苏联打败德国以后在亚洲参战的天数越少，就越难于对战后日本的管理进行干预，对日本的占领就具有更浓厚的美国色彩。总之，美国投掷原子弹让日本尽早投降，是为了在战后的世界中与苏联抗衡。

8月15日，日本终于投降了，这一天美国人民彻夜狂欢。为防备空袭而挂上的厚厚的黑色窗帘被扯掉了，明亮的电灯照亮了美国的城市和乡村。人们流着泪，欢呼着：噩梦一般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第十三章 “我爱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意日成了战败国，英国和法国也元气大伤。只有美国是发了战争财的。据统计，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总产值，以 1929 年为 100，1946 年，美国为 153%，英国为 118%，法国为 63%，意大利为 72%，西德为 35%，日本为 51%。苏联的国民经济虽然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但在战后的 1946 年，苏联的工业产值达到 466%，与 1929 年相比，增加四倍以上。在政治上，美苏两大阵营更加壁垒分明。因此，中国倒向哪一边，当然成了美国朝野所共同关心的大事。战后的中国，究竟应该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一个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下的半殖民地，一个美国的附庸？这是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史沫特莱在新闻出版界的众多老朋友，在这个问题面前也迅速分化成观点截然不同的两派。

这种分化的产生，应该回溯到 1944 年 10 月，也就是罗斯福总统把中、印、缅战场统帅约瑟夫·W·史迪威召回美国的时候。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紧接着又入侵英、美、荷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和东印度群岛，引发了太平洋战争，美、英随即正式对日宣战。1942 年 1 月，史迪威将军奉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派遣来到中国，担任中国和东南亚战区的陆军司令官，兼任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率领国民党军队进入缅甸作战。国民党军队纪律松懈，使战争屡遭失败。史迪威说：“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是好的，连排长还可以，营长就差了，师长团长没有一个人好人。”而对蒋总司令本人，史迪威的评价是：“我不想和一个卑劣的小人一起打仗！”相反，在敌后英勇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人数并不多，装备也并不精良，却抵御了大量日军的猖狂进攻，在阻止日军南下的战斗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这是史迪威来华指挥作战两年多以来所看到的铁的事实。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改造国民党军队的建议，蒋介石不支持；紧急要求蒋介石把他用于封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 20 万精兵调到西南前线打日本，蒋介石又断然拒绝。史迪威对蒋介石提出调兵的要求，是有他不得不提的理由的，因为自从 1942 年以来，陈纳德的“飞虎队”一直在桂林一带作战，到了 1943 年 9 月，日本人已经威胁着陈纳德在桂林的主要空军基地。蒋介石拒绝增援，史迪威只好下令摧毁基地然后撤退。

1944 年 7 月，在史迪威的要求下，美国派遣了以戴维·D·包瑞德上校为组长的美国观察组到延安，朱德总司令亲切地接待了他们，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派人领着他们到各处参观访问。史迪威听了观察组的汇报，大受鼓舞。和罗斯福总统通电话时，他提出两点要求：美国应该考虑不支持蒋介石而让另一个人来作中国战区总司令；美国必须平等地对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部队，他才能有效地指挥整个战区作战。史迪威过于明显的倾向性使蒋介石万分恼火。9 月 28 日，他给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必须召回史迪威，否则他就要辞去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职务，连中国政府首脑也不当了。

罗斯福总统为了顾全大局，终于决定召回史迪威，另派大使级政府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到蒋介石那里去。赫尔利在思想上是同情蒋介石政府的，相信他能够较好地与蒋介石合作。罗斯福这样做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那一年正是总统选举年，他不想让共和党人以在支持蒋介石政府的问题上动摇作

借口攻击他。他也关注到另一种可能性，蒋政府如果垮台，中国的力量将会由于内战而消耗殆尽，战后会出现权力的真空。他仍然希望一个强大、团结的中国在远东保持战后稳定的局面，他要中国在下一年将要在旧金山成立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里起一个大国的作用。因此，罗斯福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倔强的乔”（史迪威的名字约瑟夫的昵称）召回美国。

史迪威离开中国之前，给在延安的朱德总司令写了一封信。他写道：“由于我已被解除在中国战区的职务，我谨向您，共产党武装部队的首脑，为我们今后不能在对日作战中合作表示深深的遗憾。您在对我们共同敌人作战中发展了卓越的部队，我曾期望与您联合作战，但现在此事已成泡影。祝您战斗顺利并取得更大的胜利……”

史迪威回国后，即被撤去战区司令官的职务，但他仍然是一个军人，对自己在中国战区的所见所闻不得不保持沉默，为此他深感抑郁，可以谈心里话的朋友只有在中国时认识的史沫特莱。史迪威到雅都山庄去探望史沫特莱，他们谈了很久，关于中国，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史沫特莱后来写了关于史迪威的文章，但刊物都拒绝发表。史迪威对史沫特莱说，他决定在1946年11月辞职，写一本关于中国形势的书。可是这个时间还没有来到，1946年10月12日，史迪威在加利福尼亚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美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三星上将。

关于史迪威被撤职，美国各界的争论非常热烈，传播媒介在这场争论中也明显地分化了。保守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镜报》赞扬罗斯福的决定。激进的《纽约时报》、《新共和》和《下午报》则公开谴责这个决定。最有趣的是《时代》杂志的反应，这个刊物在11月13日头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引用了该报重庆记者站负责人白修德的来电，是批评蒋介石，支持史迪威的；但同一篇文章的中部语气突然转变，变成赞扬蒋介石，欢迎史迪威被撤职的决定了。《时代》杂志的出版者亨利·卢斯是蒋介石的热心支持者，国际新闻主编惠特克·钱伯斯和亨利·卢斯的观点是一致的。最后，白修德被迫辞职了。

大战结束前夕，在美国，冷战的气氛已经越来越浓，德国一投降，苏联就开始被看作新的敌人，而中国共产党则被认为是苏联的傀儡。于是在美国就有那么一些人鼓吹支持蒋介石政府，使它成为共产主义在亚洲传播的强大阻力。史沫特莱的一些原来支持中国抗日的老朋友，也纷纷站到了支持蒋介石的一边，这使她感到很伤心。她在汉口时的女友、记者弗雷达·厄特利和项美丽都转向了反共立场。项美丽是宋子文的好友，又是宋美龄的传记的作者。在汉口的时候，她是一个行为出格、引人注目的漂亮女人，她的标志是一只宠物猴子，每逢外出，猴子都蹲在她的肩上。据她自己说，这是为了让她不喜欢的男人不敢走近她。她在1944年春出版的一本书《我看中国》中歪曲史沫特莱的观点，说她在传播一种误解，似乎“中国的游击队是中国惟一在打仗的士兵”。弗雷达·厄特利也在她写的书中发表了尖锐的反共言论。

最使史沫特莱感到意外的是J·B·鲍威尔。他在香港时曾陷于日本人手中，受尽酷刑折磨，成了残废，回到纽约后得到史沫特莱无微不至的照料，原来是一位正义感很强的进步新闻工作者，现在也成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急先锋。他在与别人合写的一篇文章中声称国民党“享有各地极广泛的大多数中国人的衷心拥护”，并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全是“根据克里姆林宫的命令行事的”。鲍威尔的背叛，使史沫特莱感到自己是被出卖了。她

写信给艾诺·泰勒说：

好了，芝加哥大学的圆桌会议散了。但是鲍威尔和我之间真正的斗争是在广播的前一个晚上和早晨。他现在好像有个强大的法西斯组织在资助他，我怀疑是全国制造业协会。他在商会和商业界人士俱乐部里演说，反对苏联，反对所有反对中国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人们。他们好像已经很有办法去怂恿他了，所以他现在是以一个野蛮的反动家伙的姿态出现，鼓动对苏联开战，除非苏联向美国的金融资本家弯腰下跪。

前一个晚上我们和三位芝加哥大学的人员讨论了四个小时之久，鲍威尔和我发生了冲突。他指责我

说，新四军杀害了两名美国传教士，以“庆祝苏联的一个全国性节日”，而且史沫特莱是在场的，并且参与了杀害。你知道，我吃惊得脑子发麻，就别说开口讲话了。麦克纳尔教授对付他，用事实使他缄口不言了。我最后问鲍威尔，他已经和我相识多年，是否真的相信这样的暴行故事。他说，他相信关于这件事，“你知道的比你愿意承认的要多”。然后我回答说：“就在你的上帝面前，而且以你的上帝的名义，你是在撒谎。”他沉默不语了。最后，麦克纳尔在地板上踱来踱去，说：“你们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

没有人知道鲍威尔为什么往反动方面摆动过去。以前他辞退过一名写文章恶毒攻击我的人，现在他自己恶毒地加罪于我了……由于鲍威尔的变化和他那恶意的中伤，我前天晚上整夜睡不着。总之，我们不再是朋友，而是敌人了。

这几位老朋友的政治立场向右转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史沫特莱感受到了一种孤军奋战的悲哀，她不由得怀疑他们是否接受了国民党的津贴而甘心为他们作政治宣传。

史沫特莱此时身在大洋彼岸，但时刻关注着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倾注着无限的热情。她了解美国，了解国民党，更了解中国共产党，因此她对国际形势的观点是精辟的，表达的方式是勇敢而直言不讳的，这完全符合史沫特莱的性格。

对德战争结束以后，她看出在亚洲对日本还有一个艰苦的战斗过程，战场主要是在中国。在这场未结束的战争中，究竟谁是美国真正的同盟者？史沫特莱认为，正如不少进步的美国观察家所看到的那样，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更能有效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是美国在战争中最可靠的同盟者。毫无疑问，美国应该支持共产党，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是错误的。国民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把主要兵力用于封锁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把战争的失败归咎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国民党是美国靠不住的盟友。史沫特莱在1944年10月30日发表在《下午报》上的一篇题为《史迪威成为蒋的失败的替罪羊》的文章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并尖锐地指出：“史迪威的撤职并非蒋的胜利，而是日本人的胜利。”

说到战后的中国，史沫特莱的论敌们有两个表面上有区别而本质上一致的观点：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就是极权主义，战后中国一旦共产党执政，就会成为一个威胁着美国的利益的极权主义国家；另一些人认为，共产党当权的中国将会成为苏联的傀儡，打破两大阵营力量的均势，造成对美国的威胁。因此这些人称赞1945年8月斯大林和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认为这个条约将会“抽掉共产党的支柱”。

关于“极权主义”，史沫特莱在给一位编辑朋友的信中说：

那个政府不会像你的《时代》杂志文章所说的“极权”共产主义，因为那不是、从来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纲领或目标。如果我们企图摧毁一个（共产党）政府，以便把中国变成像英国手中的希腊和意大利那样的傀儡政权的话，那么可能会带来几十年的苦难和流血，而我们最后却只能落得令人憎恨的帝国主义者的下场。

史沫特莱以“极权”问题为主题在芝加哥作了“中国的民主斗争”的演说。听众的反应热烈得出乎史沫特莱的意料之外。只有一个人提了含有敌意的问题，是一个穿着很讲究的大学生提出的。他提醒史沫特莱说，中共可能只是在鼓吹民主，但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就是极权的。这是当时在美国很有代表性的一种反动观点。史沫特莱问这个提问题的年轻人：

“你学过马克思主义吗？”

“没学过。”他说。

“我也没有，没学过很多，只懂得一点点。”史沫特莱说：“在这一点上，我是个美国人，恐怕是这样的，而这是个弱点。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受马克思主义原理所启发的。我读了一点马克思和他的后人的著作，但没读透彻。可是从我所读到的，我知道人类社会是带有特定的、各国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色彩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扎根于他们国家的土壤里，他们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的方法。他们确实是致力于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跟随苏联或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他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和需要影响着他们所想、所做的，将来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为中国和美国的反动分子所迫，制造出一种极权主义的制度，那就不是他们的过错了……但是以我对他们的了解看，他们宁愿不要这样。他们相信说服的力量。他们甚至能够说服地主和他们自己一起朝着比较进步的政治形式前进。我亲眼看见他们在战争时期是这样做的。我常常比他们还要‘左’，因为我不能相信不用武力封建地主就会投降而解除加在农民身上的束缚。

“当我们美国人说我们怕极权主义，我心存怀疑。因为如果真的怕，我们就不会去支持蒋介石的极权统治了……我们的政府支持着今天的国民党极权统治，而谈论着遥远的未来的中共的‘极权主义’，这样做是不诚实的。”

史沫特莱讲完，热烈的掌声把屋子都震动了。

关于“苏联傀儡”，史沫特莱在为联合国 1945—1946 年冬摘编出版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各种不同见解”所写的文章里说，中共没有苏联的支持也会继续努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1945 年 8 月 14 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同盟条约（指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是为了避免另一场世界战争。保守的美国报刊宣称这条约“抽掉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柱”。人们可以问，是什么支柱？多年来莫斯科只承认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只和它打交道。中国共产党惟一能依靠的支柱就是中国人民，它代表着他们的利益。由于人民的需要并未改变，共产党和游击队部队也就不会因签订中苏条约而化为乌有。

史沫特莱在中国生活了 12 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生活过，也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生活过，她自信自己的观点是不带偏见的。她亲眼看到中国的穷人在共产党领导下比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日子过得更好，她坚信会有一个崭新的民主的中国，那时候穷人会生活得更好，她也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她绝对不认为共产主义和民主是势不两立的。她还有一个坚

定的信念：即一位土生土长的、领导着一个民族的解放运动的共产党会对苏联保持独立，决不会成为任何势力的傀儡。史沫特莱很赞成“民族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力量的顶峰。她旗帜鲜明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支持中国共产党。

1945年12月，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三个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前来中国。马歇尔此行以调处中国内战为名，以援助国民党加紧准备内战为实。他制定了一个方案，内容包括帮助蒋介石运兵到东北和华北各地准备打内战，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继续驻扎在秦皇岛、青岛等港口，向解放军挑衅，为国民党军队打先锋。

史沫特莱对美国把军队停留在别国的领土上，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为此，她和波士顿大学的副教授亚瑟·小施莱辛格展开了一次激烈的辩论：

小施莱辛格：你粉饰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一切，比如他们在安平攻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关于那次事件，他们撒谎，而你为他们粉饰。

史沫特莱：美国海军陆战队无权到安平或中国任何其他地方去……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动机是为了和平，那我们就无权去运输军火。如果美国领土上有外国军队，我也要打伏击，能杀死多少就杀死多少。

小施莱辛格：共产党人否认曾予以攻击，他们说谎。世界上还有实情嘛。

史沫特莱：你是在讲一个小的实情，而且把它放在主要的实情之上。那实情就是陆战队无权待在那里；那就是中国的领土属于中国人民，那就是我们在那儿支持一个法西斯政权。

自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重庆谈判破裂以后，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史沫特莱清楚地看到，在美国有那么一股反动势力正在准备进行一场宣传战，其目的就是保证美国政府全力支持蒋介石。他们把一个保守的美国资本家亚瑟·科尔伯格派到中国去为国民党政府准备这场舆论攻势。史沫特莱在给《民族》杂志的一封信中指出：

今天有不少美国人正为那独裁政权作宣传，这些美国人被认为是“中国之友”，虽然他们对中国并不怎么了解。科尔伯格去年（1945年）下半年到中国去了三个月，竟然成为中国军队的荣誉将军，现在已经是纽约国民党官方宣传总部的高级顾问了。

国民党政府也和美国的这股反动宣传攻势紧密配合，开始向美国反动分子提供一种规定好了的“国民党宣传路线”，往美国派自己的代言人，以谎言欺骗美国公众。史沫特莱发现这是一个阴谋，她认为美国应该对整个中国的内战灾难负很大一部分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至此为止，我能看到的是，除了中国人民的群众运动以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消我们政府的反动的对华政策。我希望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不要对我们这个国家的政策抱有幻想。我们的进步人士将继续尽我们的力量去战斗，但要想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无能为力的了。（中国的）学生运动让我们反动圈子里的人吓了一跳，不幸的是这运动又沉寂下去了。我希望（中国）共产党有能精通美国情况和美国反动宣传的人士。

有了美国政府的撑腰，国民党政权越来越法西斯化。全国知名的诗人、

文学教授闻一多在昆明街头遭到国民党特务枪杀，与西方进步记者密切共事的杰出新闻工作者羊枣（杨潮）遭到逮捕，继而被杀害。史沫特莱为此征集抗议签名，发表在《纽约时报》上。1946年的中国形势使她想起了1933年的上海，当时民权运动领导人杨铨遭到暗杀，鲁迅曾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战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使史沫特莱更加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民意所归。

面对美国新的反华政策，史沫特莱的一些朋友变成了敌人，而始终站在维护中国人民利益立场上的亲密朋友，除了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还有埃文斯·卡尔逊，当然，还有明白真相的广大美国人民，其中包括一贯支持史沫特莱观点的《新共和》、《民族》杂志和《下午报》的主编和编辑们。

在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中，对史沫特莱最有力支持的是她的好朋友埃文斯·卡尔逊。他们还记得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山西前线八路军总部篮球场上的初次见面和在汉口的重逢。卡尔逊当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上尉军官，第一个访问八路军的美国军人。他在八路军中学习游击战争的战术，了解指导八路军行动的准则，从中认识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也成了史沫特莱的好朋友。

卡尔逊运用他学到的游击战术，训练出一营优秀的海军陆战队战士。从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他的突击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斗中取得了美军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首次胜利，只牺牲了16人，却摧毁了日本的大量军事设施，消灭了800多名日军。但是他的上司却坦率地对他说，他们害怕他那些非正统的战术构思。1943年5月他被“踢上楼”，升任突击团执行长官，目的可能是取消他直接指挥自己训练出来的突击营的权力。卡尔逊是美国塔拉瓦和塞班岛战役的主要战略制定者之一。在塞班岛战役中，他为了把一名伤员从火线上撤下来，手臂受了重伤。为此，他1945年从海军陆战队退伍，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家乡。

卡尔逊和史沫特莱一样认为中国共产党会比国民党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的民主希望，他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受到赫斯特系出版物的攻击，于是他组织了一个名叫“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的机构，当了这个机构的第一任主席，出版《远东之光》月刊，开展战后对华政策的公开辩论。卡尔逊认为，国民党许诺给中国人民以民主，只是一句无法兑现的空话，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民主。他的“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另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爱泼斯坦。他们组织公众集会，积极在国会外游说，争取国会停止支持国民党，转而支持真正民主的中国。卡尔逊成了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没有人知道史沫特莱一直在悄悄地爱着卡尔逊。卡尔逊从加利福尼亚写信给史沫特莱，对她在《下午报》上的一篇文章“把聚光灯转向中国内部的真实情况”大加称赞以后，小心翼翼地告诉史沫特莱，他又结婚了，年轻的妻子是一位很好的伴侣。为了减轻史沫特莱这个感情丰富的女人的痛苦，卡尔逊又写道：“我很想让你们俩互相认识，艾格尼丝，她是你的真诚的赞赏者。”

史沫特莱怅然若失，久久不能恢复平静。

1947年5月，史迪威去世以后八个月，史沫特莱又遭到了一次更沉重的打击：亲爱的朋友，只有51岁的埃文斯·卡尔逊突然离开了人世。他是死在

自己的战斗岗位上的，当时他正和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和迈克尔·斯特雷特讨论美国对蒋介石的政策，突然心脏病发作，撒手而去了。史沫特莱怀着极大的悲痛参加了在阿灵顿国家公园为卡尔逊举行的军队葬礼。次年1月远东政策委员会为卡尔逊举行的追悼会上，史沫特莱流着泪，说：卡尔逊是以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为自己的生活目标的。

一群住在纽约的中国朋友，经常把他们对中国形势和美国政策的看法告诉史沫特莱。其中有一位杰出的中国妇女：女演员王莹、历史学家黄绍湘和新闻记者杨刚。

王莹曾在雅都为史沫特莱提供创作剧本的背景资料，为此她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跟踪追查，50年代初被美国移民局逮捕，驱逐出境。她回国后在戏剧界工作，曾对当时文学作品和戏剧作品的公式化提出过中肯的批评。因为这些批评，也因为40年代在美国的生活，王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恶毒迫害，死于狱中。

黄绍湘是一位研究美国历史的学者，她曾经为史沫特莱当翻译。50年代回国后，编写《美国通史简编》，是有关美国历史的最有权威的著作。文化大革命中，她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曾因为过去在美国的经历受到严厉的批判。

杨刚是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被国民党杀害的羊枣的妹妹。30年代她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参加学生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上海当《大公报》的文学编辑。1945年杨刚来到美国，获得拉德克利夫奖学金，攻读文学，并为中国报刊撰写有关美国生活的专栏文章。杨刚和史沫特莱在纽约和波士顿经常见面，两人性格十分相似，一样的刚毅热情，一样关心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发展动向，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1948年杨刚回国，立即在《大公报》发表了她在美国时写的文章：《给顾祝同将军的公开信》，控诉国民党统治者杀害她的哥哥，国际时事评论家羊枣。解放初期，杨刚写过一些纪念史沫特莱的文章。50年代，她当了《人民日报》的副总编，是中国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之一。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不幸逝世。

在纽约，史沫特莱的中国战友还有陈翰笙和老舍。

陈翰笙是一位共产党员，是史沫特莱在上海时期的老朋友。当时他曾帮助史沫特莱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况，带她到无锡农村作实地经济考察。1932年国民党特务搜捕陈翰笙，史沫特莱把他和他的妻子顾淑型藏匿在自己的住处，给他们化了装，把他们偷偷地送出上海。陈翰笙说，史沫特莱救了他的命；史沫特莱说，陈翰笙是她认识中国的第一个引路人。从1945年到1950年，陈翰笙夫妇一直留在纽约，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教授，被任命为中共在美国的代表，同时还在不断地写作。他们夫妇和史沫特莱来往密切，曾经到雅都山庄去探望过她。

史沫特莱和老舍是1938年在汉口认识的。1946年闻一多被杀害以后，老舍来到了美国，他是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而来的。他的小说《骆驼祥子》在美国正走红，成了畅销书。史沫特莱与埃姆斯夫人安排他到雅都山庄暂住。这段日子史沫特莱非常愉快，她庆幸老舍在国内没有遭到监禁或暗杀。而且老舍的来访对她写《朱德传》大有帮助，她可以向他详细地了解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形式，了解朱德的生活和成长的历史背景。

老舍住在雅都这段日子，史沫特莱每次应邀出外演说，老舍都陪同前往。1946年9月16日和10月15日，老舍也发表了演说，气氛非常热烈。史沫特莱生动地记述了老舍演说的情景：

老舍进城去讲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听众中有个商人模样的人提了个问题，询问中国人对待美国银行家和商人的态度。老舍说：“我们不喜欢你们，也不要你们呆在那里。你们支持中国的反动派，他们也支持你们。你们只有一种兴趣——剥削中国人民。”

一个年轻的曾在昆明呆过的美国兵站起来抱怨中国人对他们的态度，他们问美国人什么时候离开中国回家去。那年轻人认为中国人这种样子是很小气的。

老舍回答说，云南省的每个鸡蛋在战时都要送到美军那里去，农村的牲畜也被赶去宰掉。

年轻人说：“我们是付了钱的。”

“但是老百姓没有鸡，没有鸡蛋，根本没有肉吃。”老舍说，“你不能吃美国钞票嘛。”

“啊！”那年轻人惊叫道，“你的意思是，你是从农民的观点看问题的。”

“对啦。”老舍说，“即使你付了钱，我们的人民还是不得不过没有东西吃的日子。最近从中国回来的一个人对我说，他们要我们滚出去，就像我们也会让外国人从我们国家滚出去一样。咱们的人行为很不好——搞黑市买卖，搞女人，看不起所有的中国人。而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里，我都看见过苦力装卸我们的飞机，他们吃不饱，又瘦，他们无法像美国人干那么多活。再说陈纳德吧，我就在他的空军里呆过，据说在昆明的每一家饭馆和酒店里，在云南的每一种工业里，都有他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他和史迪威的矛盾那么大。”

另一名从陈纳德空军来的人也这么说，那年轻的士兵不作声了。

罗斯福去世以后，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他把反苏反共的前总统胡佛召进白宫，担任联邦调查局主任。胡佛上任以后，马上把史沫特莱列入调查对象名单。1944年10月，胡佛向纽约奥尔巴尼分局送去以下备忘录：

敬启者，请将居住在纽约州萨拉托加温泉地的雅都山庄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列入固定审查监视人员名单，并将此人与外界通信及电话内容，外界与她联系的通信及电话内容，以及一切和她有关的通信及电话谈话内容送来总部。

目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被认为用英语为苏联作宣传的主要人员之一。她被认为是有关远东共产党活动的权威人士。由于美国军队特别是海军的军事行动正靠近亚洲大陆和日本本土，这些区域的共产党活动情报对于本局将越来越重要。

这个备忘录下达以后，联邦调查局加强了对史沫特莱的调查。由于雅都的埃姆斯夫人没有很好地完成监视任务，联邦调查局的人找到了雅都公司的一位秘书，担负起监视史沫特莱的职责。调查的最终目的是要证明史沫特莱是共产党员，或者是苏联特务，最好是能证明她身兼二者。这是调查的预期结论，联邦调查局的人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不管事实如何，都要想方设法证实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从此，史沫特莱的每一次演说都有调查局的人混在听众之中进行监听。只要看到有人在用速记符号飞快地一字不漏地作记录，就可以知道此人不是一般的听众。从史沫特莱的演说中当然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她同情共产党的证据，于是她被贴上了“声名狼藉的研究远东问题的专家”的标签。

史沫特莱的著作和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理所当然地成为调查局人员注意的目标，遗憾的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认真地读过这些书和文章。他们只在别人写的书评中寻章摘句，甚至运用一个更加简单的公式：只要是在他们假定

的共产党的刊物上发表史沫特莱的文章，那么文章中的观点肯定就代表了美国共产党的观点，甚至和苏联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如此推论，最后得出史沫特莱是美国共产党员和苏联特务的结论。

其实，史沫特莱独立于美国共产党之外，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至于苏联，史沫特莱 1933 年在苏联生活过大半年，从心里佩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但对斯大林 30 年代的“大清洗”的做法抱有不同的看法。埃德加·斯诺苏联之行归来以后，曾把查托在列宁格勒被捕、1940 年死于集中营的确切消息告诉了她。查托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人，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真挚的爱情。史沫特莱永远觉得，她和查托共同生活的日子对她的一生有着重大的影响。查托无辜遇害，在她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但是，史沫特莱对苏联共产党的看法并不包含个人恩怨的成分，她的看法是很冷静同时又是很复杂的。

“红帽子”扣上以后，联邦调查局对史沫特莱的监视就升级了。奥尔巴尼分局在 1946 年 6 月 2 日首次对她进行了 24 小时的人身跟踪。他们从雅都跟踪到纽约，一直监视到 6 月 3 日半夜，只发现她曾经和斯基德莫尔大学的三个学生坐在一起。调查局的人于是兵分几路，分别对史沫特莱和这三个大学生进行盯梢。

雅都那位女秘书是联邦调查局派到史沫特莱身边的特务。这是一个 30 多岁的寡妇，说是为了排遣孀居寂寞，才到这个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工作。她很有钱，薪水分文不取。埃姆斯夫人把这个能干的助手当成了宝贝。雅都的住客很快就发现她行动诡秘，她偷听别人的谈话，偷偷检查史沫特莱的来往信件，窃听她的电话，还挑拨史沫特莱和埃姆斯夫人之间的关系。她带来两条毛茸茸的大牧羊犬，把山庄的花园踩得乱七八糟。史沫特莱散步的时候，这两只畜牲就呲牙裂嘴、哼哼哧哧地在后面跟着，像追捕犯人似的。联邦调查局还派来了一个 40 多岁的男特务，装成一个作家，一个史沫特莱的崇拜者，企图用卑劣的性诱惑手段使史沫特莱就范。在树林中，他紧随前后，甜言蜜语，甚至动手搂抱。史沫特莱忍无可忍，愤怒地给了他重重的一个耳光。

这时候又有不知道什么人造谣说，“史沫特莱的中国丈夫”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近被南京政府逮捕处死了。史沫特莱一笑置之，她幽默地说：“红帽子已经戴得太多了，再往后就该进集中营了。咱们的国会就像德国的纳粹主义分子刚掌权的时候那个样子。”她照样我行我素，该说的直言不讳，该写的笔下毫不留情。

这段日子里最使史沫特莱悲痛的是妹妹的死。默特尔病了很长时间，史沫特莱一直盼着妹妹病好了到纽约来看她的剧本上演。可是她赶不及了，她患的是癌症。去世的时候，不断地呼唤着姐姐的名字。埃姆斯夫人的患精神病的妹妹也在不久前死去了。两个不幸的姐妹在一起相对垂泪，默默地哭泣。

第十四章 欣悦的英灵

1948年3月，史沫特莱离开了雅都山庄。

2月底，在萨拉托加温泉地的斯基德莫尔大学公开举行了一次广播辩论会，辩论双方是纽约州东北小区共产党组织者哈罗德·克莱茵和白俄难民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会后，史沫特莱在雅都北农庄自己的住处为克莱茵举行了鸡尾酒会，一些斯基德莫尔大学的学生也参加了。有人向联邦调查局告密，说史沫特莱“企图使大学生们皈依共产主义学说”，当时市民听到夸大的谣传，十分害怕，一些大学生的家长向校方施加压力，校方人员向史沫特莱提出抗议。伊丽莎白·埃姆斯夫人的“恐赤病”发作了，她害怕牵连到自己，害怕自己也被怀疑是赤化分子，惊慌失措起来，感到要约束一下史沫特莱的言行了。史沫特莱出于正义感和自己的自尊，坚持说，她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信仰，没有必要作解释；也没有必要因自己请了怎样的客人而向任何人道歉。埃姆斯夫人为了维护雅都公司的名声，警告史沫特莱，要么以后言行谨慎一些，要么马上离开此地。史沫特莱满腔怒火，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实质上是一幕发生在严酷的反共思想钳制下的美国的人际关系悲剧。埃姆斯夫人之所以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牺牲与史沫特莱的友谊，是由于联邦调查局安排在雅都山庄的那两个特务出面干预。埃姆斯夫人的做法固然有点过火，但也不能对她个人作过多的责难，这完全应该归罪于美国当时恶浊的政治空气。

而这种政治空气的形成是由来已久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力量还没有给予足够的估计，不相信共产党有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自己的新政权的力量。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只是争取在中国建立一个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以防止中国全面“赤化”。而两年以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使美国不安的变化，经过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有决定意义的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的总兵力从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70万人；人民解放军却从120万人增加到近200万人，改变了双方力量悬殊的形势，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全国性的进攻。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大规模围歼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解放大城市。首先攻克了张家口，天津守敌拒绝接受和平解放的建议，解放军仅用了两天时间就解放了这座华北第一大的工商业城市，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了。

蒋家王朝的最后崩溃已经不可避免，美国政府的决策人为此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害怕一旦新中国成立，并成为强大的苏联的盟友，社会主义阵营就会成为一股足以主宰世界的强大力量，这对美国是绝对不利的。至此，美国政府只好抛弃了关于联合政府的想法，公开扶持蒋介石独裁政权，公开干涉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它向蒋介石政府大量输送武器，支持蒋介石政府作最后的挣扎。在国内，则加紧对进步人士的种种不择手段的诬陷和迫害。国会拟定了蒙特—尼克松法案，规定凡是被指为共产党的组织都必须进行登记，在登记表上标上黑星。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资料，这样的“黑星组织”有70多个。只要与这些组织沾上一点关系，就被认为是共产党，或者共产党的同伙；只要有这类朋友，就会被加上罪名，处于危险境地。一时告密者蠢蠢欲

动，受害者有口难辩，人们终日战战兢兢，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被列入赤色分子名单。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气氛中，开放、正直、心直口快的美国人变得小心翼翼，疑虑重重；有头脑的人也只好潜心闭嘴，避而不讲真话；无知的人心安理得；坏心肠的人找机会就给竞争对手扣上一顶红帽子。联邦调查局属下各机构都设有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他们像“抓虱子似的”抓“赤色分子”，像践踏蚁群那样践踏人们的自由。据说，被收入调查局微缩胶卷的调查资料，堆满了华盛顿的六层大楼。主持这一系列“猎赤”工作的是臭名昭著的参议员麦卡锡，他和他所操纵的极右报纸《反击》成了制造白色恐怖的专家。著名的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和中国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博士都在这场弥漫全国的反共浪潮中遭到迫害。

1949年9月，在皮克斯基尔避暑地的莱克兰湖畔，保罗·罗伯逊举行了演唱会。他是一名逃亡黑奴的儿子，世界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他的歌声浑厚深沉，是不可多得的黑天鹅绒般的嗓音。他讴歌对和平自由的向往，歌唱黑人的解放，因此他被赶出了第一流的演出场所。罗伯逊走上街头，到工人群众中去演唱，把演出收入捐献给民权维护会。莱克兰湖畔的演唱会开始以前，三K党冲进会场，把折叠椅堆起来放火焚烧，黑夜中烈焰冲天。三K党向听众掷石块，狂叫要把人们统统杀死。事件自始至终，连个警察的影子也找不到，这在鼓吹人权和民主的美国真是不可思议。此后，“皮克斯基尔事件”就成了美国法西斯恐怖的代名词。欧文·拉铁摩尔被《反击》指名为“赤色分子”，他愤而与麦卡锡对质。这些事件反映了当时美国的“猎赤”行动是多么不择手段。

当时一份报纸刊登了一幅漫画：一个小偷正爬在窗子上，打算溜进屋里行窃，巡警来了，小偷喊道：“我不是共产分子，你们抓错人了！”

史沫特莱就是在这样一种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中被迫离开雅都山庄的。

史沫特莱离开雅都以后，来到索伯格·布伦丁在纽派尔兹的农场，这是她过去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两个星期以后，她得到好友约瑟芬·贝内特和她的丈夫布鲁克斯的邀请，到哈德孙河西岸的斯尼登兰丁村安下了家。

斯尼登兰丁村是一个艺术家别墅区，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村子荫蔽在帕里萨兹镇附近的一片树林里，距纽约曼哈顿只有一小时的火车路程。史沫特莱住的房子是布鲁克斯的一幢小小的乡村寓所，距离哈德孙河约300英尺，坐在阳台上，可以看到在树林中流过的河流。房前是一片辽阔的草地，河对岸是绵亘不断的高大森林，一直延伸到纽约市郊。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史沫特莱心情舒畅，热爱农业劳动的大地的女儿，满怀喜悦地荷锄下地。她开辟了一个大菜园子，种下了各种各样的蔬菜，有西红柿、茄子、柿子椒、花椰菜、胡萝卜、生菜、豆角，还有新西兰菠菜、芥菜和南瓜。种菜是一种享受，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她品尝着自己种出来的各种蔬菜，心情就别提有多愉快了。她给艾诺·泰勒写信说：“我的身体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好，溃疡病也消失了。”

史沫特莱收获了蔬菜，就定期供应给周围的人家。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带的人种菜大都失败，只有史沫特莱的菜园子总是葱绿葱绿的。有一次，一群退伍军人在附近野餐，史沫特莱摘了几筐菜送去，卖了35美元。她尝到了一个真正的农妇的喜悦。

在舒心的田园中，史沫特莱并没有忘记政治，压力越大，她越无所畏惧，她要证明自己是不怕威胁、压服不了的。她仍然不断在公开场合讲话，发表

文章，强烈反对规定被指为“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登记的蒙特—尼克松法案。

1948年4月4日，在纽约举行的一次主题为“美国兵撤离中国”的群众大会上，史沫特莱措词尖锐地指责美国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毫不畏惧地批评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政府。当时在讲台上的还有保罗·罗伯逊——他演唱的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史沫特莱最爱听的一首歌——和蒋介石的老对手冯玉祥。史沫特莱和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支持冯玉祥，希望他在建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中起积极作用，以结束中国内战。冯玉祥寻求美国的支持没有结果，愤而转去莫斯科寻求支援，在渡过黑海的时候，不幸因轮船失火而丧生。也有人说，是故意纵火，要除掉冯玉祥这个反蒋的大人物。

不久，史沫特莱又面临着一场风暴。联邦调查局早就处心积虑地证实史沫特莱是苏联间谍，但苦于没有确切的证据。史沫特莱的政敌们摸准了调查局的意图，开始更猛烈地攻击她。首先发难的是科尔伯格。他跑到东京，和美国占领军总部谍报第二课的查尔斯·威洛比将军接触了一段时间。威洛比在1946年进驻日本不久就着手搜集佐尔格间谍案的资料，以便用于政治目的。理查德·佐尔格是有德国血统的俄罗斯人，1930年在上海曾与史沫特莱交往，1934年佐尔格离开上海，到日本为苏联从事间谍情报工作，在苏联卫国战争初期，曾为反法西斯战争作过重大的贡献。1941年佐尔格身份暴露，被日本逮捕，1944年被处决。应该说，佐尔格与之进行斗争的是美苏两国共同的敌人德、日法西斯，他是反法西斯人民的功臣。而现在调查局巧妙地抽去了问题的实质，只剩下了“苏联间谍”这个概念。在当时美苏对峙、冷战气氛浓烈的特定环境中，“苏联间谍”的存在，对美国的安全当然是个严重的威胁。可是佐尔格和他的同志们都已不在人世，活着而且被认为与佐尔格有关的人只有史沫特莱，联邦调查局把她列为调查对象，实属理所当然；而一旦罪名成立，联邦调查局的政治目的也就达到了。可惜联邦调查局一直未能找到一些最关键的证据，他们无法证实1934年以后史沫特莱和佐尔格还有什么联系，无法证实当时远在上海的史沫特莱怎样配合东京的佐尔格间谍组织的工作。他们掌握的最确切的材料只有一点，就是史沫特莱在上海曾介绍日本新闻记者尾崎秀实和佐尔格认识，而尾崎后来与佐尔格一起回到日本，成为佐尔格的助手，最后两人同时遇难了。只凭这一点，要确认史沫特莱的“苏联间谍”罪名，联邦调查局自己也感到实在是证据不足。

科尔伯格回到美国，就在他所控制的《实话》杂志上以一整篇社论抖出威洛比提供给他的仍属机密的材料，指控史沫特莱自1930年以来就是一个“无指定具体任务的苏联潜伏间谍”。极右杂志《反击》也发表文章，给联邦调查局施加压力，要求调查局出面支持科尔伯格的结论。可是胡佛认为缺乏证据，迟迟没有表态。1948年4月，胡佛收到了军部发来的、威洛比写的长达64页的关于佐尔格间谍网及史沫特莱的作用的详细报告，但是胡佛仍然认为看不到在远东的佐尔格和在美国国内的苏联间谍网之间有什么联系，害怕将来受到公众的质询时拿不出证据。胡佛心里着急，就责骂他的下级纽约奥尔巴尼分局，怪他们半心半意；奥尔巴尼分局则以史沫特莱已经迁出他们的辖区为理由加以抗拒。

胡佛和他的下属机关长时间的扯皮使军方终于忍耐不住了，1949年2月8日，合众国际社记者告诉联邦调查局，军方将要散发一份3.3万字的有关苏联间谍网的报告，而史沫特莱是其中的一名主要人物。2月10日，乔治·艾斯特上校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散发了这份报告。报告是根据远东麦克阿

瑟总部的威洛比的材料编写的，其中除了记述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战时间谍组织向苏联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以外，还提到佐尔格在日本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日大使馆新闻参赞，尾崎秀实是中国通。除此以外，就只有重复那些已经众所周知的 30 年代的事实，并没有证实那些原来未能证实的关键问题。虽然如此，军方的报告却断然宣告史沫特莱是苏联间谍。

在同一天，美国各家报纸都在头版新闻中把与佐尔格案件有关的史沫特莱作为充当“苏联间谍”的罪人大加谴责，还刊登了史沫特莱、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照片，把史沫特莱的照片摆在中央。

麦克阿瑟和威洛比为什么敢于在证据不充足的情况下公开向史沫特莱发起攻击？原来美国法律有“军方人员在执行公务中免受指控”的条文。也就是说，即使军人撒了谎，侵犯了对方的尊严，仍然可以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他们才敢于如此胆大妄为。

史沫特莱非常愤怒，她在见报的当天就在纽约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的律师 O·约翰·罗格坐在她身旁。罗格是罗斯福总统任内的司法部副部长，是一位全国知名的勇于为维护公民自由作辩护的律师。史沫特莱激愤地否认强加于她的罪名，说自己既不是“苏联间谍”，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特工人员。麦克阿瑟的做法有着不可告人的邪恶的政治目的。她说：

“我是无罪的。麦克阿瑟将军之所以敢于对我进行诬陷，是因为他有一项法律作保护，这项法律规定军方人员不能被控谎言罪。因此，麦克阿瑟将军其实是个小人和懦夫。我现在要对他说，请自动放弃法律的豁免权，然后我要控告你犯有诽谤罪！”

在史沫特莱的抗议和进步舆论的压力下，加上联邦调查局再也拿不出更加有力的证据，艾斯特只好承认，那个报告“有事实，但也有一些是看法”。2月18日，军方被迫公开道歉，收回对史沫特莱的指控。当日《纽约时报》报道：

今晚军方公开承认，发表关于在日本和中国的共产党间谍之具有“哲学性”的报告，是“不合时宜”的，军方没有证据去佐证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曾是间谍网成员的断言。艾斯特上校坚定地宣称，“证据不在我们手里时”就发表指控史沫特莱女士这样的人物的声明，实非军方的政策。他强调他并不是说没有关于史沫特莱女士的证据，只是说“发表报告时，证据不在我们手里”。艾斯特上校说：“证据不在手里而把人涂以柏油，贴上羽毛，加以惩罚，并非美国政府的政策。”

从这段报道中可以看出，军方的所谓道歉态度暧昧，措词闪烁，简直是在玩文字游戏。威洛比仍然不死心，他在第二年离了职，花了一年的时间去搜集证据以支持他的指控，结果出了一本极富煽动性的书，名叫《上海的阴谋》。并由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写了一份特别报告，一直闹到 1951 年，还是无法证明史沫特莱的间谍身份。

间谍案虽然看似划上了句号，但美国国内的极右势力仍然不让史沫特莱有片刻的安静。所谓“院（美国国务院）外援华（援蒋）派”的人物，包括科尔伯格，曾是史沫特莱的朋友的弗雷达·厄特利，意识到蒋介石的地位已经无望，他们开始提出一个新口号：谁把中国丢掉了？不是蒋介石，这场战争不是蒋介石输了，输了这场战争的是美国；而使美国打输的重要因素是在美国国内有像史沫特莱那样彻底的共产党人，他们影响了公众舆论，迫使国务

院削弱了使蒋介石继续掌权所必需的援助。于是霍华德报系的报纸都表示，是清算像史沫特莱那样的共产党人的时候了。

联邦调查局在送给中央情报局的报道中多次强调“据可靠的消息来源”，史沫特莱是个共产党员。所谓可靠来源只有一个，就是国际专栏撰稿人惠特克·钱伯斯。早在1945年，他就向联邦调查局证实史沫特莱是共产党员。可是到了1949年3月，他的口气改变了，说得比较谨慎：我没有材料说明她是共产党员，但我的印象是，她至少是共产党的同情者。

史沫特莱的“罪名”虽然未能确立，但这场风波却给她造成了难以估计的灾难。她很快就发现一些跟她有过交往的人开始疏远她，她的文章很不容易发表，纽约的文艺界对她也冷淡了。她计划在帕里萨兹镇附近一群退伍军人的集会上演讲，由于“恐赤病”的蔓延，有几个不明事理的本地人纠集了一群人在她演讲前一周就聚在一起表示抗议。演讲虽然照常进行，但气氛很紧张，听众的反应也没有过去那么热烈了。

史沫特莱心情沉重，健康也受到了影响。她写信给朋友说，她晚间不服安眠药就睡不着觉，心脏病也犯了，总是疲惫不堪，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年似的。由于史沫特莱的“罪名”，使为她提供住处的布鲁克斯夫妇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干扰，史沫特莱去留两难，处境十分困窘。斯尼登兰丁村附近的退伍军人美国军团里有一伙人散布谣言，说史沫特莱半夜里为停泊在哈德孙河上的苏联轮船发信号，说得绘声绘影，像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联邦调查局因此加紧了监视，史沫特莱出外时只得躲在布鲁克斯汽车尾部的行李箱里。她再也不可能在斯尼登兰丁村住下去了，为了不给朋友带来麻烦，她决定离开这个地方。

史沫特莱回到纽约，打算找房子住下来。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有很多供学生使用的比较便宜的宿舍，史沫特莱跑到那里，想找一间合适的房子。一报姓名，房东们都说：“啊，你就是那位间谍案的当事人呀，要是被联邦调查局盯上就麻烦了。这里不能住，到别处去吧！”有的说得比较委婉：“留女的住不方便，还是个作家，一天到晚猫在家里，电也耗费得多。”她无可奈何，只好搬到西二十三街一家旅店去住，一周25美元的房费，自己开伙做饭。

在这个旅店的小小的房间里，史沫特莱与外界很少联系，过着独自面壁的凄凉日子。幸而旅店距离石垣绫子家很近，石垣夫妇是在艰难的日子里始终忠诚地支持她的老朋友。除了他们，就是埃德加·斯诺了。斯诺与他的妻子尼姆·韦尔斯长期分居以后离了婚。最近斯诺在斯尼登兰丁村与年轻的女演员洛伊丝·惠勒举行了婚礼。当时史沫特莱还没有离开斯尼登兰丁，老朋友的婚事几乎是她一手操办的。这是她在这段压抑的日子里惟一的一件称心快事，现在，史沫特莱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她付了一个500美元的律师费，又给弟弟萨姆寄去了500美元。她知道弟弟也像死去的父亲那样，是个手里一有钱就往酒馆里跑的角色，但弟弟来信要钱，她总是不忍拒绝。为了节省开支，她经常去跟绫子夫妇一起吃饭，根据绫子的回忆，这年盛夏，她汗流浹背地来到绫子家，洗了个澡，穿上绫子的浴衣，坐下来一道吃饭。有时候她会从餐桌上留下一片肉，对绫子说：“这点让我带回去，行不？”绫子说：“你跟我客气什么！”就把肉放在冰箱里，她走时送给她，她爽快地提着走了。绫子看着史沫特莱的背影，伤心地叹了一口气，觉得她真是太可怜了。

史沫特莱把她的《朱德传》的书稿交给了克诺夫出版社。编辑要她作很

大的改动，他们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引用朱德的原话太多，不生动，要改成作者自己的语言；第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积极同情的表现太明显，要暗示中苏对立，使作品带有反苏反共的色彩。史沫特莱很恼火。她认为第一点属技巧问题，可以接受；第二点是不能接受的。在反共内容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妥协；至于反苏，史沫特莱对斯大林的严酷有自己的看法，但也肯定苏联的光明面，尤其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贡献，她是看得很清楚的，谁也别想要她在自己的作品中塞进反苏的内容。史沫特莱常说：“如果苏联没有在战争中牺牲的 2500 万人，我们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吗？”最后史沫特莱与克诺夫出版社决裂，在斯诺的帮助下把书稿修改完善，另找出版者。

在逆境中，史沫特莱更加怀念中国，怀念她的共产党员朋友。她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甚至在自己的祖国美国，她的心都得不到安宁；只有中国，那儿才是她的家，她生命的归宿，灵魂的家。近一年多以来，她不断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获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消息，每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她就举杯默祝，忘记了自己的一切烦恼，忘记了自己原来不是一个中国人。

史沫特莱决定回到中国去。她太爱中国了，她甚至害怕地想：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会不会不再需要她这个战地记者了？她一个人在旅馆里寂寞难耐，经常在绫子家里待到很晚。有一次，她忍不住自言自语地说：

“我是在中国的战斗中生活过来的，我的斗争目的已经达到，我在中国起的作用已经结束了。”

荣太郎责备她说：“你在说什么呀，艾格尼丝？革命后的中国更需要你的帮助，你对国际舆论的感召力是很大的。现在一切才刚刚开始，可是你却说……”

史沫特莱听了，怅然微笑。

1949 年 7 月，史沫特莱开始申请到中国去的护照，申请了几次都遭到拒绝，也不说明理由。最后，护照科的人告诉史沫特莱的律师罗格，因为她是共产党人，国防部指控她是间谍。史沫特莱找了很多人为她帮忙，当局终于发了善心发给她一份 1950 年 10 月到期的护照，只对去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有效。这时候已经是 1949 年 10 月末了。史沫特莱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其实这是为了迎合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需要，他们计划在 1950 年 10 月传讯史沫特莱，让她在大陪审团面前接受审问。

9 月末，在史沫特莱还没有领到护照以前，陈翰笙来到她的住处，送给史沫特莱 2000 美元，这是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政府送给史沫特莱的到中国去的旅费。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远在大洋彼岸的、共同战斗过的忠实的朋友。

史沫特莱兴奋地打电话给绫子，说是得了一笔特别的稿酬，要跟他们在一起好好地庆祝一下。不一会儿，她就提着大包小包和一个大蛋糕来到石垣家。绫子看到史沫特莱，简直惊呆了，她的神情是这样明朗，灰蓝色的大眼睛里盛满了欢乐和幸福，这些日子里她脸上那种驱不散的忧愁和迷惘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她用特别响亮的语调把中国人民给她送了这份大礼的实情告诉了绫子，要知道这些话在电话里是不能说的。然后她就到厨房里忙碌起来。自己做菜请客，这原是史沫特莱的一大爱好，她很久没有机会这样做了。

菜做好了，满满地摆了一桌，三个朋友举起杯来，干了第一杯杜松子酒。

中国人民需要她，中国共产党希望在革命胜利后欢迎的第一位外国朋友就是她，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度过了苦难岁月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将很

快摆脱目前这令人窒息的困境，到她向往的中国去，呼吸中国大地的新鲜空气，见到她日夜想念的朱德、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有许许多多共同战斗过的同志们，也许还有她钟爱的中国儿子小国华。他们将怎样称呼她，史沫特莱同志？她心里装不下这巨大的幸福，她想唱，她想跳；在绫子和荣太郎这两个好朋友面前，她为什么不可以尽情地又唱又跳呢？

几天以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绫子和荣太郎买了蛋糕和蜡烛，把史沫特莱叫了来，大家又一次举杯，为中国人民，也为史沫特莱的未来祝福。

在等待护照的日子里，史沫特莱和印度总理尼赫鲁见了一面。他们首次见面是1928年在柏林的时候，以后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1949年10月，尼赫鲁首次访问美国。史沫特莱两次写信到印度大使馆要求见他，都没有回音。她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自称是尼赫鲁的秘书的男人。史沫特莱怀疑他可能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因为据她所知，尼赫鲁的秘书是个女的。这男人说尼赫鲁绝对不会客。后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个熟悉史沫特莱的记者问起尼赫鲁为什么不见史沫特莱，他感到很意外，立即答应把史沫特莱请到宾馆，谈了一个多小时。史沫特莱希望尼赫鲁尽快承认新的中国政府，并且到北京去看一看，尼赫鲁表示同意。谈话圆满地结束了，但史沫特莱心里感到有点不是滋味，觉得这位老朋友有点高高在上的姿态，好像“屈尊”了似的。

这时候史沫特莱的护照发下来了，她决定先到英国，再想办法在1950年10月护照到期以前到中国去。

1949年11月15日，史沫特莱离开了美国。她乘坐一条法国船到勒阿弗尔，再从那里渡过海峡到英国。石垣夫妇没有到码头送别，这是史沫特莱反复嘱咐过的，因为他们没有美国公民权，联邦调查局要是盯上了他们，会遇到很多麻烦。送行的只有布鲁克斯夫妇、斯诺夫妇和陈翰笙夫妇。史沫特莱最后看了一眼生她养她的美国大地，登船而去。

在船上，史沫特莱面对着蔚蓝色的大海，心情豁然开朗。她坐的是最便宜的三等舱，船上没有人认识她。美国全国海员工会的头目，也就是那些专门指责别人是共产党的右派工会的领导人去伦敦开会，坐在头等舱里，他们也不认识史沫特莱，这使她感到特别轻松。她和船员们在一起，有说有笑。在船上举行的鸡尾酒会上，她端上一杯加水果的威士忌，到处找人聊天。由于和船员们关系融洽，她在船上的小卖部里买到了大量的食品：有十打精选的大鸡蛋、六磅切成薄片的腊肉、两三磅红茶，还有新鲜的柑桔、番茄酱和调味品。她从希尔达的信中知道，英国战后的经济长久没有恢复，一直实行食品配给制，每人每周只有两只鸡蛋，两片咸肉，水果只配给孕妇和儿童。她带来这些东西，一定能使朋友们高兴。

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和玛格丽特·斯洛斯在伦敦迎接史沫特莱，还有希尔达的丈夫克拉克博士。他们都是史沫特莱以前在香港时认识的老朋友。克拉克博士在香港沦陷前担任香港卫生总监，他们夫妇俩曾帮助史沫特莱给新四军运送过药品。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他们夫妇俩，还有玛格丽特，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被折磨了整整三年，盟军收复香港，才把他们救了出来。那时候，两位妇女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克拉克博士满头的黑发都白了，步履蹒跚，让人搀扶着走了出来。现在希尔达一家住在伦敦，克拉克在海外殖民地当总督，家里只有希尔达和13岁的女儿玛丽。玛丽在学校里寄宿，希尔达把一间有独立卫生间的房子给史沫特莱住，她准备在这里安安静静地修改

《朱德传》，等待机会到中国去。

在史沫特莱离开美国这段短短的时间里，联邦调查局加紧了活动，那位敢于与麦卡锡对质的欧文·拉铁摩尔教授终于被扣上了“俄国谍报机关头目”的红帽子。拉铁摩尔是东方问题专家，有不少关于中国和亚洲问题的著作，1941年曾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进驻中国，1942年回国后，任美国新闻处中国部主任、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他对蒋介石政府持明确的批判态度。联邦调查局拿拉铁摩尔开刀，显然是想对史沫特莱起杀鸡儆猴的威慑作用，是10月份史沫特莱护照到期回美国接受大陪审团审问的前奏。史沫特莱明白，美国是死也不能回去的了，惟一的希望是在1950年10月以前英国能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互派大使以后，史沫特莱就能够到中国去。

史沫特莱的希望没有落空，1950年1月6日，英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英大使是史沫特莱的老朋友郭沫若。史沫特莱日夜盼望，直到4月，中国大使的行程依然未定。由于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的影响，中英两国互派大使的计划未能实现，她盼望已久的郭沫若没有到来。希望变成了失望，史沫特莱感到前途渺茫。英国不能久留，而在她自己的祖国等待着她的是更加悲惨的命运，假如去中国的路也被堵死，世界上哪里还有她的安身之地？

3月，史沫特莱的健康情况开始严重地恶化了，胃部大量出血，几十年漂泊动荡的生活中形成的溃疡已经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地步。4月16日，在友人的反复劝说下，她不得不放下了《朱德传》的修订工作，住进了牛津大学医院的艾朗疗养院，准备做胃部三分之二切除的手术。

手术定于5月5日进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史沫特莱心里似乎有了不祥的预感，但她仍然想幽默地开个玩笑。她给布鲁克斯写信，说自己一辈子不相信上帝，上帝对她不感兴趣，不会把她召唤到身边；万一不幸，她惟一的遗憾就是再也不能和中国人民在一起。

史沫特莱给她的好朋友，直到最后都陪伴在她身边的玛格丽特·斯洛斯特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玛格丽特：

我并不希望死于眼前的手术，但是万一我去了，我愿意告诉你几件事，并请你帮我做一两件事。

我最后的遗嘱在我的律师约翰·罗格那里。我没有财产。我所拥有的全在我这里：1900美元的政府债券（在我的手提包里），以及一本托马斯·库克（一个著名的旅行社——译注）旅行支票，也在手提包里。我希望你用库克旅行支票，用这笔钱支付关于我的一切费用，直到最后费用……我不记得遗嘱里的说法，但是我想我要把1000美元的政府债券留给我的小侄女玛丽·史沫特莱。我的书所带来的全部收益，不管从哪里来的，全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按他的意思处理……就是说，为建设一个强大、自由的中国。

我也按照遗嘱的条文特别请求把我的遗体火化，骨灰送交朱德将军，以便在中国埋葬。你能帮我做到么？如果新的大使来此，骨灰可交他们去海运。我愿意葬礼尽可能地简单，按这些岛屿上最廉价的办法举行。我不相信应当在这些事情上浪费金钱。

我不是基督徒，因此不希望在我的遗体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绝对不要。我只有—种忠诚，一个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受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忠于中国正在

实现的革命。如果中国大使来到，只要在我的遗体前唱一首歌，我就要感谢不尽了：那就是中国的国歌：“起来……”。因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国。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国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

史沫特莱在交给她的律师约翰·罗格的一份遗嘱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自有生以来仅有一个挚念、一个信心，那就是为解放那些贫苦和受压迫者而努力工作。如果我死的话，我死的嘴唇仍要诅咒代表美国的法西斯主义的美国反动派。这些都是邪恶的势力……为了这个缘故，我请求你在我死后，也不要让这些坏人走近我的遗体……

史沫特莱的手术在5月5日下午进行，傍晚手术结束，她从麻醉状态中恢复过来，情况很稳定。朋友们正在为她闯过了这一关而高兴，5月6日，史沫特莱却突然离开了人世。她的身体没有经受起手术的考验。死亡证明书上写的死因是：急性心力衰竭、肺炎和胃部切除手术的后果。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去了。直到告别人世的最后日子，她仍然在工作，在为实现贫穷者和被压迫者的解放而奋力工作，在为实现中国人民的革命理想而奋力工作。她只有58岁，仍处在精力充沛的盛年，她离去得太早了。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去了。她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五部巨著，除了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之外，她的著作全是写中国的：1933年出版的《中国人的命运》，1934年出版的《中国红军在前进》，1938年出版的《中国在反击》，1943年出版的《中国的战歌》和在她死后的1955年出版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她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革命，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她给中国人民留下了远比五本著作丰富得多的精神遗产。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去了。直到生命的终结，她未能重归心灵的故乡，哪怕就在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死去呵！

在纽约的石垣绫子从广播中得知她亲爱的朋友艾格尼丝的死讯，眼前一片黑暗，仿佛陷入了无底的深渊，好久好久，才悲恸地哭出声来。在朋友们为史沫特莱举行的追悼会上，埃德加·斯诺说了又哭，哭了又说，声泪俱下，直至泣不成声。

1951年2月15日，英国进步人士组成的“人民代表团”远涉重洋，把史沫特莱的骨灰送到北京，交到朱德同志手里。史沫特莱的英灵终于又回到了中国。当她的骨灰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下葬的时候，乐队为她奏响了中国国歌：“起来……”在悲壮的乐曲声中，人们似乎看到史沫特莱热情的微笑，听到她亲切的声音：

“我到过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在那儿，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片土地上了……”

“有一天，我终归要回到中国去，倘若有一天我终能成为中国籍的公民，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她的土地……”

现在，她欣慰地、安详地躺在中国的怀抱里。在她的洁白的大理石墓碑上，用中文和英文镌刻着朱德同志的题词：

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
史沫特莱女士之墓